

○ 世界史精览 ○

欧罗巴之劫

——第一次世界大战



长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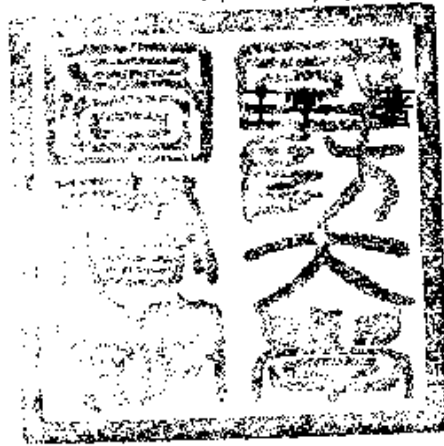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1977/2722

欧罗巴之劫

——第一次世界大战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世界史精览
欧罗巴之劫
王 宇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9.7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37 000

印数：1—5000册

I S B N 7—80604—220—2/K·16

定价：12.00 元 (全 32 册)388.00 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懂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桱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梓，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30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滑落深渊	(1)
风云激荡	(2)
“两匹马高价卖出!”	(17)
开启潘多拉盒	(22)
第二章 剑出鞘	(30)
临终遗嘱	(30)
生命的冲动	(36)
神秘的面纱	(42)
第三章 叶落凯旋	(47)
事出有因	(47)
布鲁塞尔回答“不”	(52)
土灰色的浪涛	(56)
决战马恩河	(69)
第四章 神话的诞生	(77)
后院起火	(78)
H	(88)
收之桑榆	(99)

执拗的塞尔维亚	(101)
第五章 鹿死谁手	(106)
东方巨人	(107)
科学的遗憾	(118)
不贞的妻子	(124)
塞尔维亚被抛弃了	(128)
第六章 柳暗花明	(132)
谁执牛耳	(132)
不朽的凡尔登	(143)
战斗大象	(148)
天平上的筹码	(155)
第七章 三栖怪兽 or 狡兔三窟	(159)
沉寂的北海	(160)
达达尼尔的滑铁卢	(170)
飞机不是玩具	(177)
第八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182)
同床异梦	(182)
战争与和平	(191)
第九章 山姆大叔来了	(199)
南方博士	(200)
这意味着战争	(207)
第十章 革命幽灵	(216)
黑暗1917	(216)

还我儿子	(225)
“今天整日无面色”	(228)
真理的暗道	(231)
他就是列宁	(239)
第十一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247)
丧钟为谁而鸣	(248)
鱼死网破	(256)
穷寇莫追	(265)
第十二章 世界属于谁	(274)
镜厅不平静	(275)
和约无和平	(286)
何处觅方舟	(298)

第一章 滑落深渊

世界大决战的日子已经破晓，人间四大瘟神，战争、饥荒、时疫和死亡，都会降临。

在那一度统领人类灵魂的《圣经》中，据说通晓一切，大彻大悟的耶和華最初并不希望给人类以智慧，而宁愿让他们生活在愚昧、混沌的无知中，创造了被称为“乐园”的家。但阴险、狡猾的蛇诱使纯朴的夏娃、亚当不顾上帝的忠告摘吃了智慧果，使他们顿时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第一次懂得灵魂上的苦恼。上帝一怒之下，把人类这对可怜的“罪大恶极”的祖先赶出了伊甸园。人类从此在尘世中品尝了永无止境的艰辛和痛苦，直至今天，仍然在这陌生的他乡苦苦挣扎。

也许上帝的仁慈就在这里，因为他知道智慧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等待人的将是

永恒的苦难。而作为人本身，对这点的理解并不很深，从而就失去了对待幸福和苦难应有的尺度。

1914~1918年在欧洲大陆源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人类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一场空前的大厮杀持续了4年零3个月又10天，战火蔓延整个欧洲大陆，祸及非洲和亚洲，30多个国家、超过13亿人被卷入这噬人毁物的大漩涡，7000多万人参加了军事行动，死亡1000万（相当于欧洲在1000年间历次战争死亡人口的总数），伤残2000万，直接用于战争的费用达2亿多美元……造成人类空前的大浩劫。这场灾难的出现，是有其深厚的经济政治根源和久远的历史渊源的。

风云激荡

人类在利用智慧发明了新科学、新技术的同时，随着视野的扩大、眼界的提高，打破了原有的生活体系和社会体系。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历几次激烈的革命后，17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取得合法地位，在几百年里成长壮大着，1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飞速发展独领风骚的巨人。多种生产资料成倍甚至几十倍的打滚、翻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形成。资本主义成熟了，垄断形成的多种矛盾愈发尖锐而不可调合。德国的小毛奇就曾经叫嚷：“要赚钱，要修铁路，要开矿。”这其实是各国的共同要求。为了发财、为了掠夺，它们拼命霸占殖民地。当然是先行者占尽了便宜，英占有殖民地 3350 万平方公里，沙俄抢得了 1740 万平方公里，法国攫取 1060 万平方公里，而后来的美、日、德则只有 30 多万到近 300 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于是就争夺，就开战。1898 年，美国从老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手中抢得古巴和菲律宾；1904 至 1905 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领土上作战，日胜俄败，日本夺取了辽东半岛和库页岛的南部。这种局部战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各种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搅得欧罗巴大陆动荡不已，德、法两个世仇更是剑拔弩张，磨刀霍霍。

17 世纪以后，分裂为许多小邦的德意志长期衰败，经常屈从于法国黎塞留和马萨林的政策之下，有时还会遭到法军的欺凌、瓜分。19 世纪 50 年代，俾斯麦成为一统德意志的执行人，

他利用拿破仑三世的弱点，在1870年前后，经过色当之役，制住了法兰西，把德意志变成强大而统一的帝国。他顺便还抢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惧怕受到莱茵河对岸的攻击的，不再是德国，而是法国了。

法国人视色当之败为奇耻大辱，更认为德国抢走阿尔萨斯—洛林是一种罪恶，他们耿耿于怀，报仇雪恨的心理日益高涨。尤其是军人，不管他是老禁卫军还是共和派，是耶稣会会士还是共济会员，使他们团结一心的，便是那阿尔萨斯奥秘。一位法国步兵上尉曾这样做：他把一连人分成几个人的秘密巡逻队，率领他们穿过树林，登上山顶，凝视远方和科耳马尔。他说：“经过这种私下的出巡归来之后，我们的队伍便与以前完全两样，全连都心潮激荡，哽咽无语。”统治者当然高举起“复仇主义”大旗，处心积虑恢复昔日的风采。为保有既得的经济利益，为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要建立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法兰西”。不过，这需要时间去恢复实力，去寻找对付德国人的伙伴。

虔诚的人们坚信：需要什么，到时就会送来什么。历史将一个巨大，当然并不一定强大的伙

伴——俄国送给了法国。

自从携手打败了拿破仑，俄罗斯与普鲁士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友好的，尤其是普法战争、巴黎被围的数月中，是俄国保持一种中立态度，并牵制奥地利，使之不与法国结盟，德国方如愿以偿地使法国蒙受巨大耻辱。当然，那前后俾斯麦亦投桃报李，使沙皇得到不少好处。这是一段两国如胶似漆、留下美好回忆的时期。1872年到1873年，德、俄、奥三国君主几次会见、密谈，更使这种交好扩大为三方的。三国之间签订了秘密军事协议，相互保证：一方受到欧洲某一国家的攻击时，另两方就予以援助。如遇到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则互相磋商解决。从而在1873年10月，形成合力巩固君主制度，以抵制高涨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危险，并防止法国或其他国家的扰乱行为，保持欧洲现状的“三帝联盟”。不过好花开不长，仅仅两三年的时间，联盟内部就出现裂痕了。

问题的症结是：俄国对于巴尔干怀有炽热的情感。它高举着“泛斯拉夫主义”的大旗，意欲乘“欧洲病夫”——土耳其“病势”沉重，法国革命唤醒了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人的民族意

识之机，努力向南，在黑海、在达达尼尔海峡，开拓自己的新疆域。

1877年4月，俄国发动了梦寐以求的对土耳其的第九次进攻。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沙皇的士兵前进到君士坦丁堡城外。1878年3月逼迫土耳其签订了圣斯泰法诺条约。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对俄国来说，糟糕的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反对这一条约，人们最不能接受的是创立一个大保加利亚独立国的规定。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绝不愿意比自己更强大的“怪胎”降生；英国怕会威胁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奥国为着切身利益，主要是深恐甩掉枷锁的斯拉夫人会在种族和宗教方面同俄国联合起来，成为对自己的严重威胁。

于是，德国出面召开会议，修改圣斯泰法诺条约。俾斯麦费尽心机，既剥夺俄国的一部分收入，又使自己的两位盟友各有所得。俄国感觉被出卖了，费了许多气力，打了那么多的仗，所得到的实在不相称。俄德的报界相互诋毁，三帝联盟之间出现刺耳的不和谐音，相互关系急剧恶化。

针对这种局面，为了防备东西来的危险，俾

斯麦与奥地利的同事、好友安德拉西，在1879年10月订立了一个主要针对俄、法的秘密军事同盟条约：一方受到攻击时，另一方将全力援助。不久，意大利因与法国争夺突尼斯失败，投靠德奥。1882年5月20日，德、奥、意在美丽的维也纳签订了肮脏的盟约，这个“三国同盟”是日后将欧洲拖入血泊的主要力量之一。

当然，俄德奥之间的联系也不是轻易就完结了，各方尚有心弥合裂痕。1881年6月，俾斯麦同俄国的沙布罗夫、奥国的施曾伊签订的一项非常秘密的协定，修复了三帝关系，1887年到1890年的德俄“再保证条约”使两国一度重归于好。

但是，和好就象回光返照，是不牢固的、短命的。德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着，向海外殖民扩张的野心膨胀着，对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自然地发生了兴趣。因而引起了俄国的警惕与敌意。俄国决心控制巴尔干，拼命鼓动大斯拉夫主义，使奥国大为光火。威廉二世迟早要在俄奥二者中选定一个为友，他当然选择了弱小些又同是日耳曼人的奥国。鉴于此，俄国人要想不孤立，要与德对抗，当然以向与德世仇又颇有些金钱

的法国靠拢为宜了。另外，俾斯麦的下台，“再保证条约”的停止续签，似乎更加快了俄法的接近。

早在1879年，德国因检疫原因，禁止俄国的牲畜输入，又实行粮食进口税，使俄国的粮食出口遭到严重挫折。1887年，或许是由于沙皇一纸禁止外侨在俄国西部购置地产的圣谕，柏林出现对俄债券的反宣传，卢布贬值了。于是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德国人的友好并不总是可依赖的。于是转向其他方面，寻求出路。这时的法国正在寻找投资对象，双方一拍即和。不长的时间里，法国即发行三项俄国公债，共24亿法郎。应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兄弟乌拉德米尔大公之请，法国给俄罗斯大兵制造了50万支新式的勒伯尔来福枪。更具有重大意义的则是“喀琅斯塔得盛会”。

1891年7月，法兰西热菲司令统领着共和国的海军舰队，造访了俄国喀琅斯塔得。这些军舰是应沙皇之邀而来的。沙皇和皇后亲自来到达法国的旗舰上，与水手们热情交谈。说他们对法军官们大献殷勤也不过分。本来共和之声马赛曲是严禁在公开场所演奏的，是时，这禁令也暂

时失效了。这是在向全世界显示两国的团结。

两国的认同，以及随后的欧洲历史的波浪推动俄法两只航船靠得越来越近。终于，在1893年12月，俄国批准了作为建立同盟的基础的军事协定，这标志法俄联盟正式建立。它是欧洲大陆上与“三国同盟”抗衡的一大军事集团。不过，欧洲不仅有大陆，还有海洋，有那拥有海上霸权的大不列颠人，在欧洲各集团均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约有数百年时间，英国奉行“光荣的孤立”的政策。它不和任何一个大陆国家结盟，只有当切身利益受到危害时，才介入欧洲的政治。历史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情况已大为不同了。英国在海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了。它想改变一下刚果的边界，立即招致德法抗议；各国经常利用英国在埃及的脆弱地位，做些威胁；1893年，因为暹罗的一些纠纷，几乎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它关于土耳其的建议也到处遭冷遇……孤立虽然光荣，但越来越不那么安全、不那么舒适了，英国的领袖们开始寻求盟友。

1898年1月，英最先向俄提出建议：结束多年来“熊与狮”的争斗。沙皇未予理睬。

1898年到1901年，张伯伦多次向德国施放联盟气球。柏林方面怀疑“不讲信义的伦敦”能有几分诚意。这时英德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利益互不相容。1896年初，英国同南非布尔人开战，吃了败仗，威廉二世向德兰士瓦总统发电，祝贺他的胜利；同时，德国拼命扩充海军实力，以期打破英国的海上霸权；德国加紧向土耳其渗透，对土输出一增再增。1898年，德皇出访土耳其，自诩为回教的保护人。1903年，德国取得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特权。这等于“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在英国的致命处扎上一刀，还严重损害了俄国在黑海和小亚细亚的巨大利益。此外土耳其的最大债权国——法国的利益也大受妨害。这一切使英国向德国的对立面靠拢。

1902年，爱德华七世登基。他做太子时曾经侨居巴黎，操一口流利的法语，在法国有不少朋友。1903年春，他以国王的身分，主动赴巴黎，为弥合两国的旧隙出了力。这以后，卢贝总统回访，两国外长谈判，终于在1904年4月8日签订了英法协定。法承认埃及属于英国，英同意法吞并摩洛哥，双方还调整了在暹罗、冈比亚

等地的一系列矛盾。这表明英国与法俄集团联手了。

1907年8月，俄英签署了协定，协调双方在波斯、阿富汗、中国西藏的矛盾，“三国协约”最终形成了。

两大集团的形成并未如当时人们的希望和后来某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造成一种均势，保障欧洲大陆的某种稳定，而是扩大了争夺的范围，加剧了争霸、较量，并使战争怪物在大陆早日降生。作为大战的前奏是一系列摩擦与危机以及在大国阴影笼罩下的地区性战争。

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其最重要的港口丹吉尔能掐住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直布罗陀海峡。19世纪末，摩洛哥名义上是在一个驻在非斯的苏丹统治之下的独立国家。它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矿藏早令列强垂涎欲滴。稍弱些的西班牙占有了休达，还希望得到加那利群岛对岸大西洋海岸某些港口的保护权。德要保护并扩张它日益增长的商业利益，攫取煤铁等资源。英国、意大利也有商业利益，也希望占有丹吉尔。法国为保证其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和前途，防止摩洛哥部族在

西北边境日复一日的骚扰，实现在北非建立殖民帝国的愿望，更是处心积虑把统治权伸展到摩洛哥。

1900年春，法国占领了摩的都亚特地区，引起一阵骚动。法允诺不反对意大利对的黎波里的意愿，换来意对法在丹吉尔行动自由的默认。1904年，英法协约，英承认法在这里的“特殊权益”。同年10月，法与西班牙签订协定，划定了两国在摩的势力范围。此后，法国加快控制摩洛哥的步骤，力图一步到位。1905年1月，法国提出协助摩洛哥对行政、军事、财政等进行全面改革，企图将其变成保护国。

德国不甘于坐视法国力量在地中海的扩大，它要采取行动进行干涉。1904年强硬派就要求借一德国公民根德在摩洛哥遭到劫掠并被杀害一事，派军舰往丹吉尔示威。因德皇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批准。

法国的改革计划提出后，德国开始有针对性的活动。1905年3月31日，在首相毕洛的安排下，威廉二世在从汉堡往科学岛途中，突然来到丹吉尔港访问。好大的风浪，靠岸都困难，鼓乐声和人们的叫嚷声几乎吓坏了德皇的坐骑，

然而他总算在东方情调中完成了这一访问。他伪善地宣称维护摩洛哥主权，强硬地表示“决心维护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德国还要求摩拒绝法的改革计划，提出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

对德国的挑战，法国内一部分人主张坚决对抗。以总理卢维尔为首的大部分内阁成员考虑到自己没有做好准备，英俄尚难于重力相助，主张暂时缓和下来。强硬的外长德尔卡塞辞职。1906年1月在西班牙召开了阿耳黑西拉斯会议，结果与德初衷相反。大多数与会者被拉到英法一边。改革不进行了，但法国权益并没有削弱。而且法与英、俄联系更巩固了，与西、意等关系也改善了。德无奈暂停动作。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一页算是掀过去了，两大集团对抗越来越尖锐了。

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了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哈米德二世的封建统治。奥俄乘机分割土耳其。9月，两国外交大臣举行会谈，达成协议。奥可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俄可进出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

会后，俄国四出游说，没有得到英法的首

肯。奥匈则急急忙忙付诸实践，10月就宣布正式将波、黑并入帝国。一无所获的俄国岂能甘心，立即提出抗议。早有心建立统一的南部斯拉夫国的塞尔维亚更是强烈反对奥匈对波、黑的吞并。俄国正好煽动利用这种情绪。11月，奥匈帝国部分动员，调兵塞尔维亚边境。双方对峙，箭拔弩张。

12月，德国公开声明无条件支持奥匈。1909年2月，亲德的土耳其政府以250万英镑的代价出卖了对波黑两省的主权。俄国要求以国际会议解决矛盾，德断然拒绝。俄深感势单力薄，又准备不足，不仅自己承认了既成事实，还压塞尔维亚放弃反奥举措。

风波一时平息了，俄对德奥的愤懑也强烈了，奥匈与塞尔维亚算结下了死扣，并导致了后来的萨拉热窝事件。

1911年春，摩洛哥出现武装暴动，法国派兵镇压，占领了非斯，成了完全的统治者。德国不能听任法独占摩国，德舰“美洲豹”号从南非回来，奉命于7月1日停泊阿加得。“豹的跳跃”使德法间充满了火药味。7月21日，英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发表演讲，表明对法国的支

持，绝不许德在摩洛哥建立立足点。面对联手的英法，德乖觉地降低了调子。11月，德法达成协议，最后，法得到摩洛哥，德得到法属刚果的一部分为补偿。

觑得法德在摩洛哥斗法的时机，意大利要实现对的黎波里的并吞。1911年9月，意大利借口意侨问题对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接着便对土开战。战争持续到第二年，处境危急的土耳其不得不在10月签订了《意土和约》，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割给了意大利。

这次战争使“病夫”土耳其愈发孱弱，推动反土力量结成联盟，造成巴尔干战争。

到20世纪初叶，土耳其贵族在巴尔干的统治已达5个世纪之久，各民族人民经过长期不懈斗争，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获得了独立或自治。不过，巴尔干地区在土耳其统治下的那部分民族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巴尔干各国都希望联合对付土耳其，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1912年8月，形成了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四国同盟。10月，开始对土战争。局势发展很快，11月，土耳其就失去了在欧洲的大部分土地，而被迫求和。

出于各自的利益所在，大国纷纷介入巴尔干问题，尤其是俄奥明争暗斗，不可开交。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尽可能多地扩大地盘，以其对抗奥地利。奥、意则坚决不许塞据有亚得里亚沿海。奥匈屯兵边境，对付塞国，还在加里西亚部署军队，防范俄国。威廉二世坚决支持奥匈。俄国虽也有一部分人鼓吹对奥作战，但其政府再次后退了，压制塞尔维亚做出让步。

1912年12月，同盟国对土和谈，同时，英、俄、法、德、奥、意六国在伦敦举行大使会议。其间，土耳其发生政变，和谈中断，巴尔干同盟再次对土用兵。到5月底，才签订和约。

巴尔干各国对土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对于这块大蛋糕如何分割的意见难于协调。6月29日，保加利亚在奥匈的挑唆下，向不久前的战友——塞希军队大打出手，燃起第二次巴尔干战火。一拳难敌众手，塞、希、罗、门甚至土耳其几路攻保。7月底，保战败求和，失去了刚得到的大部分好处。

两次巴尔干战争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格局，留下了许多难于解开的死结，此地各国矛盾重重，各大国亦深深卷入，只要这里迸出一个火

星，就可能引燃大国间的熊熊烈焰。萨拉热窝的枪声打破了欧洲大陆本已十分脆弱的某种平衡。

“两匹马高价卖出！”

1914年6月初的一天，三位青年乘船离开了贝尔格莱德，他们在同志的帮助下，进入波斯尼亚，20日左右到达萨拉热窝。他们由伊利齐——一个名为“不统一毋宁死”（通常称为“黑手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团体的重要成员安排住下。加夫利洛·普林西卜出生于波斯尼亚西部的格拉哈佛的山区，他读书很用功，但学习常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打断。1912年，他只有16岁时就接触了“黑手党”成员，并接受军事训练。

尼哲科·查卜林诺维奇很早就辍学了。他在工厂做排字工人，参加过罢工。1912年起与“黑手党”、与普林西卜有联系。他性情暴躁，多次与人发生争吵，他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

特里佛科·格拉培兹在这次行动中不那么重要。

他们都是塞尔维亚族人，都曾在贝尔格莱

德学习过，与“黑手党”过从不断。

两次巴尔干战争后，奥匈帝国内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的斯拉夫人更是把在巴尔干战争中获胜的塞尔维亚作为争取民族统一的核心。反奥青年的秘密组织遍布斯拉夫人集中的地区，并且与塞尔维亚有着广泛联系。摆脱奥匈帝国，建立“大塞尔维亚”的呼声响遍全国。这不能不使本已风雨飘摇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心惊胆战。为维护那摇摇欲坠的统治，它在筹划着摧毁塞尔维亚，另外，还企图收买、拉拢国内的斯拉夫上层人物。

弗兰兹·斐迪南 1863 年 12 月出生于奥地利哀斯特，1896 年被立为奥匈帝国王储。象一般情况一样，他从小被送进兵营接受军事训练，与军官关系密切。1906 年，他开始对军队发生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他的坚持下，军国主义代表人物康拉德·丰·盖曾道夫被任命为新的参谋总长。斐迪南一生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强奥军。他曾经说过：“知道假使我是皇帝，我会怎样做吗？我会把维克尔、培克、西加特、叔纳奇这些主要官员召来，对他们说：如果在一星期

之内我不能得到增添的新兵和军官的薪饷，我就把你们都送往地狱里去。”斐迪南对于国内各民族的强烈不满情绪非常敏感。他对克罗地亚人很有好感，企望将境内的斯拉夫民族组成一个“大克罗地亚”，作为一个单元，组成奥、匈、克三元的联邦国家。这无疑是阴险的挑拨克罗地亚人民对塞尔维亚人的“分而治之”的古老招数。这样一个王储自然成为塞尔维亚人的主要敌人。

1914年，斐迪南决定去波斯尼亚检阅第十五、十六集团军的演习，并到萨拉热窝巡视，以在这两个1908年新吞并的地区炫耀帝国的统治权力，抵消斯拉夫鼓动者的宣传，拢络那些对皇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敬畏心理的农民。而这次行动选在塞尔维亚的“维多夫丹”国耻日，不能不被视为一种示威、挑衅。于是，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决定给其以迎头痛击。谋划这次行动的是一些“黑手党”人及其信徒，他们不满政党的合法反抗形式，他们接受了赫尔岑、克鲁泡特金等俄国人关于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认为暗杀的恐怖行动可以终止政客们的温和行动，并摆脱奥国统治，为新的“南斯拉夫”民族

主义开辟道路。当时至少有7个人接受了这一任务，普林西卜等即为其中之人。

斐迪南王储准备正式视察萨市那天的清晨，普林西卜从伊利齐处取了一支白朗宁手枪，查卜林诺维奇拿到一颗炸弹，格拉培兹揣上一把手枪和一枚炸弹，然后他们分散到达预先确定的大公将经过的路线上适当的地点。

6月23日，斐迪南乘一辆普通的头等车，离开维也纳。他从亚得里亚海到萨拉热窝的途中，在各个车站上受到“热烈”的欢迎。6月26日下午，检阅了第一天的演习后，他和夫人到市里买点东西。张旗插花，遍陈肖象，不绝于耳的“万岁”声，对于这一切，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隔一日的早晨，王储给孩子们打电报，兴奋地告诉他们很顺利，有望于星期二再见。他哪里会想到，这是向在克伦梅兹的儿女们诀别呢。

当年的萨拉热窝蹇居在高山脚下的山谷中，几百年来，一直是波斯尼亚的首府。米尔珈卡河穿过市中心，几座桥梁连接两岸，伊斯兰清真寺，总督官邸与市政厅、大教堂分别座落在两岸。河边的码头一带，马路宽阔，是进出萨市的必经之路，“黑手党”的刺客们就散开布置在沿

河指定地点。

1914年6月28日，星期天，“维多夫丹”国耻日，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夏日。市长早有安排，沿街飘扬着旗帜，橱窗陈列着王储的标准象，大群的看客拥塞在街头。

弗兰兹·斐迪南一行上午10点到达萨拉热窝。他首先检阅了当地的军队，然后驱车前往市政厅，莅临正式的欢迎会。王储穿着礼服，佩戴金质勋章。坐在身边的大公夫人身着白礼服，头戴大帽子，兴致勃勃地听总督波梯雷克将军介绍市容。车队驶近肯麦稚桥时，查卜林诺维奇冷静地敲开炸弹的引信，抛向大公乘坐的汽车。司机看见了他的举动，急忙加速，炸弹落在车后部篷子上，弹落地下，炸坏了后面的车，炸伤一个随从军官。一阵慌乱后，车队快速开到市政厅。这颗炸弹完全扰乱了斐迪南的兴致。当市长致辞时，他粗暴地插话：“够了，够了，什么话！我来访问，而你们用炸弹来接待我。”欢迎仪式结束。

按照王储的意见，先去探问炸伤的那个军官。司机沿预定路线在拉丁桥处向右拐，总督波梯雷克嚷起来：“走错了，直接沿码头前去！”司

机忙刹车，后退。就是这不长的停顿给站在附近的普林西卜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他从容地举枪瞄准，击发两弹。一枪打中王储的脖子，立刻，殷红的血从嘴里流去。另一枪原本打算赏给总督，却射进王储夫人莎菲·卓德的腹腔。几分钟后，大约上午11时半，本来将驾起奥匈帝国这辆破车的“马”被死神领去了。当天，同伴向“黑手党”发电：“两匹马高价卖出！”

塞尔维亚人民群众对军国主义略施薄惩，却也勾起了战争狂人们的嗜血激情。

开启潘多拉盒

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非常平凡的是，对于一个虽然挺大并不很强的国家储君的暗杀，成为使本已沸沸扬扬的欧洲进入白热化战争的最后推动力。几个大国的决策人想要的战争终于快要拉开大幕了。

普林西卜打死了王储弗兰兹·斐迪南，奥匈帝国的某些人仿佛还有几分庆幸，认为这是清算塞尔维亚的天赐良机。很长时间以来，塞尔维亚人就在进行把所有不满现状的本民族人统

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的事业。它尽其所能鼓动土耳其和奥匈境内的国人。通过巴尔干战争，它已经解放了伊斯坦布尔属下的塞尔维亚人，下一步当然是从哈布斯堡王朝手中拯救民族兄弟。奥匈虽已“陈旧过时”，但它也不会坐以待毙，等着邻邦从它身上一块块割去塞族的臣民。何况它认为塞国时下还弱小，自己还有能力对付它，如任其坐大，会失去面子，还会加速自己的崩溃。所以，对于在贝尔格莱德策划的“罪行”必须迎头回击。因此，陆军总参谋长康拉德敦促柏耳喜托特尽早批准对塞作战动员。一些维也纳人士也一再表示，“现今是奥国与塞尔维亚作最后清算的时候”。外交大臣柏耳喜托特就是持有这种观点的有力人物，他明白为贯彻他的政策，首先必须得到柏林方面的全力支持。于是柏耳喜托特派遣何约斯伯爵专程赴柏林一趟。何约斯随身带着一份由匈牙利首相斯蒂凡·蒂查伯爵在6月前拟定的态度平缓的长篇备忘录。另外，还有一封柏耳喜托特写的有奥皇签名的措词灵活、带有两面性的信，试探一下德皇是否同意把责任全部加在塞尔维亚身上。

德皇威廉二世与奥匈王储的个人关系相当

不错。弗兰兹·斐迪南坚持娶一个出身于已衰微的捷克世家的女子莎菲·卓德小姐为妻，遭到以他父亲老奥皇为首的几乎所有家人的反对。婚后，王储的妻子在维也纳备受轻视和折磨，被当做地位远为低下的伯爵小姐而不是王储夫人对待。为了不使爱妻难堪，王储和女伯爵不再参加宫廷的宴会了。而德皇对她豁达大度，将伯爵小姐晋升为霍亨堡公爵。当王储夫妇造访柏林时，她受到了一个王储夫人应有的礼遇。与她在国内那令人难堪的成规重压恰为尖锐对比。王储与夫人均非常感激威廉二世。就在不久前，1914年6月12日，他们还友好地相会在波希米亚哥罗皮希那美丽的别墅中。

6月28日，星期天的下午，德皇正在基尔海上航游，穆勒海军司令驾着小汽艇赶来，将一个烟盒大小的东西隔船扔给了他。威廉二世打开，拿出纸条，当知悉萨拉热窝的消息时，脸色苍白，马上下令停止巡游。他非常想去维也纳参加丧礼，但手下人以有刺客正计划在维也纳暗杀他而阻止了他。德皇在一些呈文的批语中写下：塞尔维亚人是“杀人犯”、“弑君者”、“匪徒”，提到“现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必须和

塞尔维亚人把事情弄明白，越快越好。”

7月5日，奥大使卓基夷将何约斯带来的文件进呈德皇。会见中，德皇不无鼓动意味地表示，奥对塞采取行动“不可延迟”，奥“可以得到德国全力的支持。”即使奥俄两国发生战争，“德国作为一个盟邦将以不渝的忠诚支持”奥国。

德皇在与国防大臣法根汉、首相贝特曼、代理外交大臣齐栋曼会商之后，7月6日，正式将其决定通知奥国卓基夷大使和驻奥的德国大使。他态度十分明确：“奥国必须自己决定应该采取如何的行动来澄清与塞尔维亚的关系，但无论奥国做什么决定，一定可以得到作为一个盟国和友邦的德国的支持。”这正是奥匈希望得到的最为满意的答复。

协约国也没有袖手旁观，它们支持塞尔维亚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对奥大使说：俄国对于任何想使塞尔维亚屈辱的意图，是不会不关心的。俄国不能容许奥国对塞尔维亚用威胁的语言或军事的措施。

7月20日，法总统普恩加莱访问俄国，主要一个议题就是奥塞问题。法总统在俄期间多

次表明支持塞尔维亚的态度，同时威胁警告奥国。他甚至在冬宫招待宴会席间对奥大使说：塞尔维亚在俄国人民中间是很亲密的朋友，而俄国又有盟邦法国……他向俄保证：如与德发生战争，法将履行自己的同盟义务，全心全意支持俄国。他的访问更鼓动了俄国的斯拉夫主义狂热，尼古拉大公等人要求采取更为激进的态度，主张不要向德奥让步。正是深信有法国的支持，俄国有了将冒一切战争危险的勇气。

这时，英国的态度微妙得多。或许是由于地理等原因，巴尔干地区对它不那么利益攸关，英国人，尤其是一般百姓关心爱尔兰问题还甚于巴尔干问题。此前，英德关系有些许的松动，所以人们不知内阁中的大多数是否准备干预，能卷入多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老道狡猾所致。首相格雷态度十分暧昧，他没有向俄国施加压力，因为它是盟国，搞得不好，会影响协约国间的关系；他也没有向奥国施加压力，因为他也不想引起德奥的不满。英国表面不偏不倚，国王乔治五世还表示：“我们尽一切努力，不使自己牵入战争，而保守中立。”这样造成一种错觉：英国不会立即卷入战争，而可能

暂时保持中立。其实不然，一位英高级官员在笔记中就写道：“在这次斗争中，我们的利害关系与法俄是一致的。这次斗争并不是为着争夺塞尔维亚，而是想独霸欧洲的德国和力争本身自由的列强之间的斗争。”这表明，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局部冲突在现实的可怕影响，已经把它提到了欧洲全局的范围来认识。他们岂能坐视事态的发展而袖手旁观？那种认识在欧洲列强中间存在广泛的共识。因此，各国都十分关注形势的演变，似乎还为平息动荡做努力。

在奥“最后通牒”出笼前后，大国们或真或假放出不少“和平”气球。它们有些是平行的，有些是矛盾百出的，它们的用语多是含混不清的，甚至倡议者本人往往对自己的建议也不甚了了。

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两三天内神差鬼使般地提出一长串的建议：多方努力，主要是德国出努力，防止奥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奥国延长对塞答复通牒的时限；建议塞向列强提出申诉；希望奥修改对塞通牒；呼吁各强国建立一种国际监督，防止塞以后再进行反奥活动；最主要的是建议英国明确声明与法俄团结一致，以抑

制奥德。

起初，德国极力主张的办法是所谓“冲突地方化”，即俄、法、英、德均不介入，由奥塞自己解决。这事俄国当然是绝对不会点头的，它岂能眼看着斯拉夫兄弟被奥匈异族绞杀。俄国不接受，法英当然也不会首肯。当局势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德也装模作样地劝告过柏耳喜托特考虑英俄的和平建议。那是做给人看的姿态。

英国还是很“珍惜”自己的关键地位，积极活动，提出了几个和平方案。7月上中旬，英首相格雷向俄国秘密建议，圣彼得堡与维也纳之间“直接会谈”。但俄不同意，法国也极力反对。格雷又建议举行英、法、俄、德四国大使会议，商讨问题。出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为德所拒绝。英还提出由英法、德意分别对俄、奥进行调解，也毫无结果。由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决定了的、必定燃起的战争之火，岂能为毫无诚意的和平努力所熄灭？

塞尔维亚政府为了避开高悬于头顶的斯摩尔达之剑，对于奥关于解决萨拉热窝事件所提的极其苛刻的最后通牒做了最大程度的委曲求全的接受。但是，这也不能改变其对塞开战的决

心。7月28日中午，奥匈对塞正式宣战。午夜，奥军开始炮轰贝尔格莱德，从而启动了欧洲战争机器的运转。

7月30日，俄国宣布总动员。次日，德国宣布“德国已处于战争威胁状态”，8月1日，下令总动员，并向俄宣战。德国同时向法发出一份照会，提问：“德俄一旦发生战争，法国是否保持中立？”法国外长回答说：“关于法国的行动，事先什么也不能告知，并将保留行动的自由。”这实际上是拒绝了德国的要求。法国下令总动员。8月3日，德国制造谎言，称法国飞机侵犯德领空，以此为借口，对法宣战。德国为了实现其“史里芬”计划，“借道”比利时。比利时以中立国身分向英求援。8月4日，英对德宣战。至此，战前结盟的各大国除意大利以外一并卷入战争的漩涡。关着战争魔鬼的盒盖彻底开启，这个恶魔跳将出来，开始了它在欧罗巴大陆上极为风光的日子。

第二章 剑出鞘

如果说1914年6月28日在欧洲大陆吹响了“魔鬼的笛音”，那么，甚至在更早，握在手中的利剑已自然出鞘，就是这把利剑割断了和平的咽喉，把一场亘古未有的世界大战摆在人们的眼前。就象欲脱离母体的胎儿，未来的憧憬淹没了现实的阵痛。它就是各国关于未来大战的美好蓝图。

临终遗嘱

1866年6月，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德意志领导权，在克尼格莱茨进行了一场决定胜负关键的战役，普军在总参谋长毛奇指挥下，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目睹了无以伦比的欢呼场面，一位年青军官在激动之余

将这次战役铭记在心，永志不忘。他就是继毛奇之后，德国军界又一位传奇人物，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伯爵。同许许多多德国军界人物一样，史里芬不仅一生嗜武，而且出身于普鲁士军官阶层，深受家庭熏陶。他沉默寡言，严守纪律，具备一个军人最大的长处，在他的一生中，始终牢记父亲的遗言：始终不渝地勤奋工作，矢志不移地忠于职守。他为德国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德国的军队建设贡献毕生，而在战争中贯彻自己的思想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其终生目标。但令人遗憾和惋惜的是，上帝似乎与他开了个玩笑，1913年，在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战争狂人正在竭尽全力煽起遮天蔽日的战争之火时，他却离开了人世，从而永远离开了他所喜爱的战场。这真是千古憾事。但他的后继者，德国军界仍奉行其衣钵。他的战略战术思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争计划影响很大。在他临终时，喃喃叨唠着的是这样一句话：“必有一战，务使右翼强大。”这句临终嘱咐始终萦绕在德国军界决策人物的脑海里，尽管变化，尽管争论，也未改其主旨。

闻名于世、人才辈出的普鲁士军官学校的

课堂上经常讲授从古至今最著名的战役，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发展新的军事理论。德国的许多军事将领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且许多人——克劳塞维茨、老毛奇、史里芬都是身经百战，在亲身体验中获益非浅。那些已成史迹的战役，象已逝的将军一样，死死地缠住了军人的头脑。史里芬声称，对法国作战要打出个赫赫有名的“克尼格莱茨战役”或“超克尼格莱茨战役”。

1892年，法俄结成军事同盟，使德国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在两面作战的战争中，“整个德国必须扑在一个敌人身上，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身上，而这个敌人只能是法国。”史里芬在1906年，即他退休之年完成的那份计划中，分配 $7/8$ 的兵力在6周时间击溃法国，而以 $1/8$ 的兵力守卫东部国境抗击俄国。按德国的算术，俄军四面八方相距甚远，军队众多，铁道窳陋，得要6周时间，才能发动大规模攻势，但到那时法国已被打败，大部分军队就可以调过来迎击这个位居第二位的敌人。而这一切目标的实现均以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为手段。这是史里芬在克尼格莱茨战役中取来的经，

也是德国军界一贯奉行的法典，其渊源始于克劳塞维茨的“兵不厌诈”。这个被捧为兵法上的《圣经》中规定，以“决战”迅速取胜是进攻战的要旨，占领敌人领土和掌握敌人资源均属次要。时间重于一切，“逐步削弱”敌人和消耗战，则是现代战争的桎梏。为了取得速决战的胜利，史里芬对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采取的著名两面包抄战略神往不已。虽然坎尼之围距今已时过两千年，昔日威武的将军已化作一杯泥土，但史里芬认为战略原则不变，就如同思想千秋万代永放光芒一样，“敌人的正面不是目标所在，重要的是粉碎敌人的侧翼，而以攻击后方完成消灭敌人”的任务。在史里芬思想指导下，包抄成了德国总参谋部崇拜的神术，正面进攻沦为可鄙的邪道。

德法两国世代为仇。俾斯麦说：“我的祖先没有一个不曾同法国厮杀过，我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同拿破仑一世打过仗。此外，我的祖父参加过罗斯巴赫战役，我的曾祖父和路易十四打过仗。我的高祖也在莱茵河畔的几次战争中同路易十四打过仗。”这是一个普通德国家庭的普通经历，却格外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几代人的

仇恨，在德法边境铸就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也锤炼了法兰西人民冰冷的心。因此，史里芬不愿在德法边境的铜墙铁壁下浪费时光。侵犯比利时，横切马斯河以东的比利时一角，逐渐扩展成很大一片右翼包抄区域，德军经此穿越比利时，从列日奔向布鲁塞尔，然后挥戈南下，利用佛兰德旷野直捣法国，这是史里芬最初的得意之作。

腓特烈大帝曾说过：“宁失一省之地，而不分散赖以取胜之兵。”这句箴言很合德国军人的胃口。所以不惜冒让东普鲁士这个容克地主邦国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老家只用9个师来守卫这样大的风险，不惜把防界敞开缺口，任愤怒的法兰西人冲进家园。史里芬同许多前辈一样，在其军事思想中有一种战术上的优越感，这是一种纯粹军事艺术所必然带来的弊病。由于德军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已不拥有数量上的优势，无法提供可资用以对法国采取坎尼式的两面包围的兵力，但发动一次地道的坎尼之战的野心始终在胸腔内搏动。因此，他是以极大决心改用右翼重兵一侧包围的方式，而在左翼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布署较弱兵力。正是这一点把他的后继者引向了误区。

史里芬的“坎尼战”理论，犹如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容不得一丝瑕疵。史里芬认为只有具备汉尼拔那样的果敢和决心的统帅来指挥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总决战，德军的胜利才能得到保障。他的继承人，忧郁快悒的毛奇将军，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毛奇家庭，是老毛奇的侄子。他多少是个悲观主义者，缺乏史里芬集中全力于一役的果断精神。他既担心他的左翼力量较弱不能抗击法国人，又惟恐剩下来防守东普鲁士的兵力单薄，不能抵御俄国人。他也对未来战争，特别是对法战争必将是速战速决的看法表示异议，他甚至同“参谋总部曾多次研究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打防御战是否更好些？回答始终是否定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失去战争尽快转移到敌人领土上的可能性。”因此，他坚持速战速决与史里芬的观点并不同出一辙，所以他总是被一种后顾之忧的烦恼所困扰。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不断地向史里芬的临终遗嘱开刀，从右翼借兵增强左翼最后的战略计划格局形成了：左翼8个兵团，约32万人，守卫梅斯以南、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阵地；中路安排11个兵团，约40万人，借道卢森堡和阿登山区

入侵法国；右翼 16 个兵团，约 70 万人，借道比利时，粉碎列日和那慕尔要塞，飞渡马斯河进入旷野地区，南捣法国。西线右翼与左翼的兵力由原来的 8：1 改为 3：1，而且进军的日程也作了安排：12 天内打开列日通道，19 天拿下布鲁塞尔，22 天进入法境，39 天攻克巴黎。

1914 年 6 月 1 日，毛奇对埃克哈德·施泰因男爵说：“我们已准备就绪，在我们是越快越好。”

生命的冲动

1913 年 10 月，法国政府颁布新的《野战条例》是法国陆军的训练和指挥的圭臬，八条军令都是一些气概不凡的豪言壮语，“唯有进攻战才能达到积极的战果”。条例的执笔人还给第七条军令用上了斜体字以示醒目：“军心士气重于一切，一切战争都是军心士气的较量。一旦失去征服敌人的希望，失败便不可免，胜利并不归于蒙受损伤最少的一方，而是归于意志最坚强、士气最旺盛的一方。”

如果说指导法国面对未来战争的是军事科

学，勿宁说是源于一种抽象的精神因素。强调精神意志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一个经历苦难和挫折的民族在恢复元气时所不可缺少的支柱，就如同当年的“巴比伦囚徒”心中涌现出上帝耶和華一样，这是精神和物质辩证关系中最玄妙最动人的部分。1871年，法国在凡尔赛唯德国之命是从，订下了城下之盟，在被迫接受的条款中，甚至还规定了德军要举行胜利进军仪式，在香舍里榭大街雄视阔步，耀武扬威。“仪式进行之际，大街上观者几绝，阒无声息，黑纱低垂”。“凯旋门，凯旋门，英雄走过，不用弯身”。维克多·雨果的著名诗章描绘了英雄凯旋归来那种气势磅礴的自傲和无与伦比的尊严。但是，现在这个英雄的国度遭遇到悲惨的耻辱，它在法国人的意识中，是一个历久恒在的阴影。“你们不要放在嘴上，而要铭记心间”，甘必大的一句忠告使那种无以名状的悲痛和难以抚慰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归宿。

肢解法国国土，赔偿军费，在法国驻扎一支占领军，按德国的意思是要把法国的手脚捆住，在地理上永远处于劣势。但是，法国人做出了惊人的努力，一批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在3年内

就凑足了，而德国原打算是要法国一代人不堪重负。这是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作用，用柏格森的话说，便叫做生命的冲动，也就是人类一种原始的与生俱来与人的生命不可分的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意志。这种冲动的意志转译成军事术语，便成了进攻的理论。“胸怀理想，利剑在握”，在当时是一种很切实际、很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象概括。在这种形象的旗帜下，法兰西精神中那种防备警戒的知觉被放弃了，人们厌倦了30年日复一日的自救图存的告诫和30年来的困处守势。进攻的电波来自陆军大学，校长弗迪南·福煦将军有两句现成的名言：“胜利即意志”，“一场胜仗就是一次决不服输的战斗”。在大学的课堂，最生动、最具感染力、最催人泪下的就是福煦将军那玄妙的关于意志的奥秘。它使听众为之心动，为之倾倒，为之激起奋进的决心。可以说就是这种意志创造了日后马恩河的奇迹。而这种关于进攻意志的理论也在法国军界号角长鸣，经久不息，并且渗入到人们的灵魂中，正是这种灵魂把关于防御戒备的想法抛到九霄云外。

激烈的争论，关于防御和进攻的争论，它的

冷酷和不遗余力的精神正在于它关系到了法兰西的生死荣辱。重担最后落在了一个不太出名，也不具有多少资历的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将军肩上。身躯魁伟，大腹便便，穿着宽肥的军服；面容丰腴，点缀着已近霜白的浓浓的髭须和天生匹配的两道浓眉；脸色白嫩，两眼碧蓝安详，目光诚挚、恬静——这是圣诞老人的形象，给人以慈祥朴直之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霞飞将军木讷少言，稳重沉着，丝毫不动感情。他的个人资历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也无可挑剔。他是那种滴水不漏的人物，这突出地表现在他那无比的自信心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指挥打仗，我要取得胜利。无论干什么，我都克竟其成”。于是他的沉默寡语，他的冷漠变成了一种优秀的品质——巍然屹立，不怕风吹浪打。正是在这种人物坐镇下，福煦将军的进攻思想被确定下来。

在色当的阴影笼罩下的进攻意识使法国军界把目标对准了阿尔萨斯—洛林和取得莱茵河左岸地区。霞飞总司令先后判定了16个作战计划，1914年4月，又制定了一个新计划，史称《第十七号计划》。计划每更替一次，进攻的意识

就增强一步，生命的冲动就升高一度，而用以防御法国与比利时边界广阔平原地带的兵力就减少一部分。力量的重心凝聚在法德边界的工事里。据说，“有家室的男子不上前线”是德皇陛下的上谕。法国参谋部确信这道圣谕的准确性，他们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人既要在右翼派出一支大军取道比利时向马斯河以西大举进攻，又要在他们中路和左翼保持充分兵力，以阻止法军向莱茵河突破，它的兵力是不足的。因此对德国人实行的右翼包抄也有可乘之机。参谋部认为：德国人在他们右翼投入兵力越大，他们在左翼和中路的兵力就要相应减少，法军就越有可能在这一带突破。因此十七号计划把法国的5个集团军部署在从阿尔萨斯旧省的贝尔福直到伊尔松一带的国境线上，法比边界1/3是在这道防线内，比利时国境线的其余2/3，从伊尔松到海边一带，则不设一兵一卒。他们这样做的理由还有着气壮山河的妙计，即坚决认为如果德国人把他们的右翼伸到佛兰德，他们中路的兵力就会异常单薄，法国人就可以把他们拦腰切断。

有一份简单的、只有5句话的总指示被列

为机密文件，这是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各位将军所仅能共同见到的，并且是不得互相讨论的文件。在文件的开头有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在任何情况下，总司令部都要求我军将士奋勇前进、齐心协力，对德军发动攻击。”总指示的其余部分仅说明法国的行动由两方面的重大攻势组成，即由对梅斯至提翁维尔一线德军筑垒地区的左侧和右侧的攻势组成。右翼直对阿尔萨斯—洛林，立足点为莱茵河，而左翼向北进攻，穿越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地区，但这一行动“只能由总司令发出命令”方可实施。这是一种进攻莱茵河、切断德军右翼的具体设想。

十七号计划不同于史里芬计划，没有一个见之文字的总目标，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只是一个兵力布署计划。它的总意图只是由于对德军的进攻路线无法预知而采取的一种“相机行事”的计划，如果说史里芬计划太全面，因而也就太刻板，那么它就应该广泛吸收十七号计划中那种“灵活性”。用霞飞的话说，它是个“后发制人”的应变计划，只是对德军的进攻做出敏锐反应，并迅速回击的计划。

但是，有一点是值得强调的，即它的宗旨是

“进攻、进攻”。

神秘的面纱

法国对德国的右翼包抄置若罔闻的原因之一，就是依赖英国有一支远征军在比利时海岸登陆。这是1905年英法签署联合军事计划的结果。

英国是个岛国，多少年来，依靠天然的海上屏障，与欧洲大陆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直到大战爆发前的一刹那，英国外交从未揭开神秘的面纱。塞丁政府极力避免发表任何说明它打算站在协约国方面作战的明确言论，以免惊动柏林政府而拒绝战争。伦敦是希望战争的。由此，他们才故做姿态：“一方面使柏林和维也纳指望英国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使巴黎和彼得格勒深信英国会参战”。这种玄妙的政策，使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政府很是烦恼和焦虑不安。

但是，今天的英国已不象过去那样在外交手腕上游刃有余了，大英帝国的威望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来自于德国，日耳曼

人要来抢劫英国王冠上那颗熠熠闪光的明珠，而且势在必得。经历了岛国的困苦，也经历了周游世界、漂泊闯荡的艰辛，也享受过一呼百应的尊贵和繁荣，英国人对事物变化的反应有了应有的尺度，敏感而不冲动。它当然不愿明珠落在别人手里，但它又不愿拿自己的繁荣去同粗鲁的强盗碰个鱼死网破。于是它煽动战争，却又躲避战争。隔岸观火正是聪明而有教养的不列颠人求之不得的状态，它希望欧洲大陆的战火愈燃愈烈，而自己充当那个声嘶力竭的鼓动者，不时地在烈火上扔上一把干柴。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对往昔繁荣的缅怀和爱不释手。

1910年1月，英国参谋学院院长亨利·威尔逊准将第二次访问法国，与他的对等人物——法国陆军大学校长福煦将军进行一次简短却令人深思的谈话。威尔逊问：“英国至少要派多少兵力才能对你们有所帮助？”福煦的回答好象是利剑射出的寒光：“只需英国大兵一人——不过我们一定要看他战死沙场。”这句切中要害的话，撩开了英国神秘的面纱，但并不使威尔逊感到太多的尴尬。实际上，英国人也在做自己的战争准备。1839年英、法、俄、普、奥五国签

订了一份关于保证比利时成为一个“独立和永久中立的国家”的国际条约。这份条约是英国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那个运筹帷幄、雄才大略的巴麦尊勋爵的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比利时的海岸是英国的边境，这是英国人一种直觉和常识，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是对英国的直接侵略，这也是欧洲人的一种惯常心理，所以1870年崛起中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一经英国示意，便欣然重申比利时的不可侵犯。因此，在未来战争中，英国也极力重复这一现状。“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为都要自动地招致我方参战以捍卫我们的条约义务”。这是一种警告，也是为了表明某种态度，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种发号施令的意味。法国人认为德国不会冒然入侵比利时，破坏英国的中立，这也是它对德国右翼包抄情报断定“不可能的”心理原因。

“比利时的中立”，这是一块试金石，英国以亘古未有的姿态承担起这一捍卫他人主权的义务。同时，也正是中立的比利时这一块空隙可以名正言顺地插上英国的一只脚。格雷有一句语似乎平淡但内容精彩的话说明了英国面对未来的心情：“倘若德国主宰了大陆，那我们就会和别

的国家一样不舒服，因为我们势必会被孤立起来。”这个史诗般的句子概括了英国现时的政策，从们可以透过英国外交上那神秘的面纱窥见庐山真面目。但如何制定未来的战争计划，在英国军界、政界争论极大。许多人不情愿把英国远征军作为法国的一支偏师使用，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在比利时独立作战，从而掌握安特卫普及其附近的一带海岸，直接守住英国的门户。约翰·费希尔海军上将则强烈主张以海军作战为主，因为海军既是英国手中的一把利剑，可以在海战中稳操胜券，也避免英国薄弱的陆军在海峡那一方作无谓的牺牲，而法国的军事能力是否抵挡得住德军又令人怀疑。他有一个得意的妙计，派陆军在德国背后来一次大胆强攻，选在一个精确的地点——东普鲁士，沿波罗的海海岸一段“沙土坚实的十英里长滩”。此外，陆军作战必须绝对限于作为“海军的配属部队”来支配。

但是比利时的态度出乎英国人意料。他们很快就发现，比利时人态度硬似铁石，恪守中立地位。英国武官问起，在德国侵犯在先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做出联合安排，让英军在比登陆。

得到的回答是，英国还是必须等到向它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时方可安排登陆。比利时并且严正声明，如果英国军队在德国入侵之前或未向比利时提出正式要求即行登陆，比利时人便要开火。因此当得到法国“绝对不越过比利时的边界”的承诺后，英国许诺唯有德国侵犯比利时，英国才会支持法国。

军界拔刀相向，那么政府呢？1914年8月，《笨拙》周刊发表了一首《表达一个普通的英国爱国者意见的诗》：

凭什么我要奉行你们的打仗路线。
就为了一桩与我无关的事件？……
到时候我将被召征作战，
全欧洲烽火遍地，
卷进了一场别人的战争，
为的是履行两家协约的规定……

这反映了海峡那边岛屿上的人民，也反映了政治领袖们的心理状态，只不过普通人绕过了阴谋的暗道，直接袒露了纯真的心怀。

第三章 叶落凯旋

德国士兵在 1914 年夏天向亲人告别时总是说：“当树木落叶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英国的活跃人物丘吉尔当时也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切照常。”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普遍流行的一种速战速决的论调。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观点的泛滥，人们没有经过更多的疑惧就拉开了欧洲大战的帷幕。

事出有因

一个法国将军说得好：“谁更决心要战争，谁就势必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1914 年 8 月 1 日夜，未等德军动员完毕，德国政府便向卢森堡宣战，控制了那里的铁路网，为入侵比利时做好了准备。

没有什么比入侵比利时、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更能说明德国参谋部面对未来战争的勇气和所向披靡的决心了。同时也反映出这个年轻的德国那种不可一世的自信。在入侵比利时的问题上，德国参谋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因为这场战事将是“保卫德国和为了德国生存”的一次战争。小毛奇在1913年曾说：“我们必须撇开关于侵略者责任问题的一切庸人之见。……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在德国人看来，比起入侵比利时带给德国的巨大胜利成果——摧毁法国，其连锁反应的副作用显得微不足道，而这就是德国甘愿冒这个险的原因所在。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军事战略战术堪称一种无可言喻的艺术，他们对自己这种艺术有一种不可抑制、不加掩饰的自傲，就如同世界上崇尚艺术和美感的人们及追求奢华时尚的人们拜倒在巴黎的脚下一样，普鲁士的军官学校也为全世界尚武的勇士所敬仰。这是军事艺术思想鼻祖克劳塞维茨开创的新纪元，他使德意志民族在欧洲有了扬眉吐气的法宝。德国人很珍视这个难能有二的锐利武器，每一代有代

表性的军人都紧紧握住它，尽管有现实实际的约束，但总免不了到克氏的法宝中去引经据典，似乎后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部“圣经”寻找更完美的诠注。德国就这样一代复一代地珍藏它，同时做了许许多多锦上添花的工作，使它成为一个完美无暇、晶莹剔透的艺术品。面对未来的战争，德国人尽管意识到现实与过去的差距已经很大，但是那完美的艺术珍宝以及由之引发的无与伦比的荣誉感的强大诱惑力，简直是无法抗拒的。在德国军界，人人都以能称许为克氏的门徒而自豪。谁都不会丢掉了优越感去到冷漠无垠的现实沙漠中去重建理想的大厦，因此，老毛奇也好，史里芬、小毛奇也好，每一步的行动方案制定出来都要急切地去翻阅那本“圣经”，似乎除此以外，道理和方案就失去了脊梁，失去了有力的支柱。1905年初小毛奇曾颇为理智地对威廉二世说，“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不可能用一次决定性突击来结束它。我们面临着长期的人民斗争，我们与之作战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人民的力量未被彻底摧毁之前，它是不会认输的”。德国军界有这种想法的并非个别人，长期战争的前景使帝国首脑们感到恐惧，

远不如拾起过去的优越感来使人感到愉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拿出来的锐利武器就是这种优越感所凝结的精华——史里芬计划。而入侵比利时则是其在这种优越感桎梏下最得意的构思和行动步骤，即右翼包抄的庞大梦想。这种优越感告诉德国人，梦想定能成真。这就是小毛奇所说的“巨大胜利”。

德国这种巨大信心还出自于它认为比利时不会抵抗，不会以它的6个师为法军增添力量。以一个德国外交人员在1911年的话说，比利时的抵抗也许会以“它的军队在德军借道之处沿途列队”的方式出现。史里芬也说，比利时是不会用武力相抗的，它只会抗议了事。德国人深信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认为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品性很了解。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就曾经说，比利时国王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他最著名的品性是他的贪婪成性。德皇认为只要给他一份法国领土，他就会与德国结盟。德皇后来又希望利奥波德接受200万英磅来确保比利时的中立。战后，一个德国军官把这一数目告诉了一个法国情报官，不过德国军官又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补充：“这笔钱原本是要法国人付

的。”不过，德国人确实希望比军不会抵抗，因为抵抗意味着破坏铁路、桥梁，意味着打破德参谋部那份精确的时间表。但是有一点德国人当初没有更多地考虑到，1914年比利时国王是阿尔贝亲王，他是否与利奥波德志趣相同？

德国热衷于借道比利时，是为了实现它的速战思想，而对速战论的观点，德国参谋部曾做了大量论证。史里芬说，“当维持几百万军队需要几十亿开支的时候，消耗战略是不可思议的”，他断言，“在一个国家的整个存在取决于商业和工业不断发展的时代，这种战争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欧洲社会许多金融界、政界人士的赞同，或者说在战争的温度不断升高的时候，在欧洲大陆上，许多忧心忡忡的人奔走相告的就是这种论调，互相安慰的也是这句话，似乎未来的世界大战只是瞬间的痛苦。为了在闪电战中出奇制胜，德国军事当局遵循克氏的军事理论，用最残酷的手段进行战争，认为这样可以缩短战争的时间，“减轻人类痛苦”。德皇说：“一切都应沉浸在火焰与血泊之中，”“唯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最恐怖的方法，才能恫吓象法国那样堕落的民族，如果使用这种方法，战争不

到两个月就会结束，但如果考虑人道的话，那么战争将延续好几年。”德国的哲学思维堪称人类的一绝，在这里我们可以略见一斑。在他们看来，为了在最短期间内达到战争目的，一切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方法应该被认为是最人道的。德国人就是怀着这样的崇高目标、高尚境界举起了屠刀。因为它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需要，而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从这种观点出发，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在比利时制造最惨不忍睹的恐怖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老毛奇说得好：“只要这种措施能为破坏中立的人带来十分肯定的好处，任何中立都是可以破坏的。”

布鲁塞尔回答“不”

“你邻居的屋顶可能失火，但你自己的房子将安然无恙”。当8月1日夜比利时人被德国入侵卢森堡的消息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德国驻比利时大使赫尔·冯·贝洛的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绝妙譬喻，使他们感到如此惊慌实在有失体统。

比利时人以一种真诚的天真信赖有五国保证的中立独立完整。这里曾是自从恺撒攻打比尔盖人以来，一向穷兵黩武者的必经之地。勃艮第大公和法兰西的路易十一在这里决过雌雄，拿破仑曾在这儿的滑铁卢迎战威灵顿。比利时人珍惜有关国家保证的长达 75 年的持续和平，他们强烈希望邻国能让这种安乐境况长此下去，不受干扰。因此他们紧握“中立”这把宝剑，迎接未来的挑战。

1909 年登基的阿尔贝国王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列强环伺，比利时的中立如履薄冰。由于对大国的不信任，他认识到中立才是唯一的出路。他是一位有教养、有个性的人，他最大的长处不仅仅在于他的聪明好学、喜欢接受新鲜事物，而且突出表现在他始终漠视危险、礼仪、非议等等，他是一个对自己绝对负责的人，这种责任心使他不愿受传统的摆布。在他的生活中充满豪放不羁的乐趣，受人左右和左右他人都是令人烦恼的事情。因此，他决心守身如玉，带领他的臣民坚持中立。但是他又不能象普通百姓那样无视周围的风云变幻，蒙起头过自己渴望过的日子。来自外界的危险不时给他敲

起警钟。1914年7月29日，一份由毛奇将军亲笔拟就，经过外交官和首相润色订正的照会送交布鲁塞尔，照会说，德国得到可靠情报：“法国拟欲通过比利时国境进犯德国的意图已不容置疑”，德国不能指望比利时军队可以阻挡法军推进，因此，德军必须先发制人。照会最后说，如果比利时反对德国通过其领土，则将被视做敌国，今后与它的关系将由“枪炮决定”。这个具有强烈威胁意味的照会，带给国王及大臣们很大的压力。他们感到前景可怕，不论怎样答复，德国占领比利时已在所难免。如果捍卫中立，则家园被毁，生灵涂炭，而顺从德国意志，一个独立的比利时也将不复存在，另外还得丧尽荣誉。

比利时人对中立是非常诚恳的。由于信守中立，珍惜中立，他们忽略了自己的军队、边防、工事等等凡属意味着对中立缺乏信心的事情，以至于他们的军队状况恶劣，纪律松弛，懒惰拖沓，军容不整，军礼不行，步调不一。军队在人们的思想中是多余的。由于信守中立，珍视中立，在同其它国家制定共同作战计划上始终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障碍，即规定把所有第一个踏

上他们国土的国家视为敌人，而不论他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信守中立，珍视中立的结果使他们不分谁是敌人，不论动机如何，布鲁塞尔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字，那就是“不”。这个不字，仅仅有一层含义，即不许破坏我们的中立。1913年11月阿尔贝访问柏林，当毛奇问及比利时人将如何捍卫其中立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不论哪个大国进犯我们的边界，我们都将全力抗击。”毛奇以平淡的口吻指出，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行，“你们还必须有一支能够履行中立责任的军队”。比利时的军队包括6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装备不足，缺乏训练，军费微薄，所能提供的弹药有限，每人每周只能进行两次实弹射击，每次又只有一发子弹。当欧洲上空乌云密布，国会勉强将每年服役人数从13000人增至33000人。它怎么可能阻挡几十万、上百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德国大军？

但是，比利时人的信念是不容动摇的，1914年8月2日，阿尔贝国王在王宫主持会议，他在开幕词中说：“不论后果如何，我们的回答必须是‘不’。我们的责任是捍卫我们的领土完整。”一份由加来上尉草拟的备忘录中体现他面对未

来的危险所采取的具体方针政策，“我们决心向蓄意侵犯我们领土的任何大国宣战，决心竭尽全部力量和全部军事资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甚至越过疆界，进行战争，并且决心一直打下去，即使在进犯之敌败退之后，仍将继续打下去，直至实现全面和平”。

土灰色的浪涛

1914年，高步跨跃欧洲战场的德国士兵换上了新近改制的土灰色军服，似乎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复仇者形象，开始了它在欧洲实现辉煌的历程，于是土灰色的浪涛一股股席地卷来。

1914年8月4日上午8时刚过两分，第一阵土灰色的浪涛在离列日30英里的格姆梅里希冲过了比利时边境。最先维护中立的站在哨所里的比利时士兵并未对他们构成任何威胁，他们满怀信心地前进，确信比利时不会真正抵抗。这时，在布鲁塞尔，人们为阿尔贝国王而自豪，被那“不”字所激动。“家家户户挂着国旗，人人手里拿着鲜花，街头巷尾满是兴奋激昂的人群，素不相识的人们相互握手，欢笑与呼号交

杂一片，每个人的感情都被他和他同胞之间的共同的爱和共同的恨的纽带联结一起”。突然之间，德军入侵的消息象一阵春风刮过街面，人们忘记了派别斗争、生活艰辛以及所有个人利害，思想和灵魂上都似乎得到了全面的净化。一向为人瞧不起的军队现在成了英雄。群众激情高涨，如痴如狂，欢呼着求见陆军大臣。在政府中，由于职务关系，陆军大臣无论由谁担任，平时总是最最不得人心的一个人。现任陆军大臣德布罗凯维尔先生尽管是个温文尔雅、老于世故的人，那天当他走上阳台，面对布鲁塞尔人同仇敌忾的情绪，也不禁流下眼泪。

列日就象一座城堡的吊闸，守卫着德国进入比利时的大门。它雄踞在马斯河左岸高达500公尺的陡坡上，宽约200码的河道是它的天然屏障，方圆30英里，都有堡垒卫护，它有一座称誉欧洲的固若金汤的城池，它是由19世纪80年代举世无双的防御工程大师亨利·布里阿尔蒙亲自设计构筑的，全部建筑由相距约二、三英里的堡垒群构成。它象中世纪的城堡，大部分堡身隐蔽在地下，地面上只露出一块三角形的顶部，这样的堡垒距列日镇4~5英里有12座。共

拥有大炮 400 门。由于比利时人过分信赖这些防御工事，而对其它工作缺乏准备，而且唯恐德国人找到借口，指责它违反中立，因此至 8 月 2 日才下令挖掘路障，保卫堡垒之间的空隙，到德入侵时，这些工作才刚刚开始。

德国人认为比利时所谓不惜一战的说法，不过是一个普鲁士政治家对他国内政敌的用语——“绵羊的梦呓”。因此他们派出的先遣队并没有把他们已准备好的使人惊奇的大炮，包括各种巨型攻城加农炮运到前线。德国出动的全部兵力超过 150 万，分 7 个集团军，沿法比边境集结，布署在与列日对峙的德军阵线的右翼顶端为第一集团军，由冯·克卢克将军指挥，另有一支由 3 个骑兵师组成的独立兵团也配属于右翼。8 月 4 日清晨，晴空万里，布鲁塞尔以东 70 英里的地方，第一批入侵者冯·马维茨的骑兵部队进入比利时，马蹄声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惊动公路两旁的田野里正在收割庄稼的庄稼汉抬头张望。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比军和法军的阵地，并掩护德国部队的展开，同时打算夺取一些村庄，以保证粮食和饲料的来源，并且有一项不可少的任务，即在沿边境各个乡村的广场

上，把“我们必须有一条畅通无阻的通道”的宣言书散发下去，扯下各地比利时国旗，升起德意志帝国的黑鹰旗。在他们后头，一队队突击部队的步兵挤满了通往列日的公路，在一片单调的土灰色中，不时闪现出漆在钢盔上的各团的红色番号，一批批骑自行车的士兵抢在前头占领十字路口，架设电话线。参谋部的官员乘着轿小轿车穿越人群，站在野战炊事车上的炊事员，正在熊熊的炉火上搅拌炖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次歌舞升平的阅兵行进。士兵们纵情高唱《德国至上》、《莱茵河的守卫》和《国王胜利万岁》。他们满怀信心地向前进军，因为他们的司令曾向他们保证：比利时人不会抵抗。

但当它们到达马斯河时发觉上下游桥梁已被破坏，在试图架设桥梁时，比利时步兵开了枪。德国人想不到“巧克力士兵”竟真的抵抗起来。德军被这种状况弄得既措手不及又气恼万分，继而使他们从风和日丽转而为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德军最初的想当然，使它损失惨重，而且遭遇到来自堡垒群的猛烈杀伤，尸体山积高达一码，在堡垒前面，据一位比利时军官说：“倒下去的伤亡人员堆叠成一堵可怕的街垒，快

要遮住了我们的枪口。”这是日后把士兵的生命视如草芥的开始。

德国人由于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去同原来不在计划之列的比利时人作战而恼火。在他们看来，如果比利时人具有一般常识，就早该让出道路。因此，在整个8月份，德国人始终摆脱不了“威吓”比利时，使他们放弃愚蠢而无益的抵抗的想法。他们的根据就是卡利古拉皇帝的理论：不怕他们恨我，只要他们怕我。因此，在入侵的第一天，德国人不仅枪杀平民，而且枪杀教士。许多村子被付之一炬，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德军派出武官打着一面休战旗帜去说服勒芒将军，要他放下武器。使者告诉勒芒，如果阻止德军通过，齐柏林飞艇将毁灭列日。8月6日，齐柏林L—2飞艇从科隆起飞，对这个城市投掷了13颗炸弹。克劳塞维茨曾把恐怖规定为缩短战争的正当手段，不让平民百姓受到战争影响是不行的，要用最严厉的措施，置“敌人于继续打下去要比投降更难以忍受的境地”，于是随着一股股土灰色浪涛的席卷，枪杀不断发生，废墟不断增多。8月12日，德军盼望前来结束这种烦恼阻挠的攻城巨炮终于运到了前线阵

地，接着在列日城传来了阵阵可怕的爆炸声，弹雨阵阵，把人炸得块块段段。列日陷落了，布鲁塞尔陷落了，许多城镇都被土灰色浪涛所淹没。市长被枪毙，市民被集体枪决，日耳曼兵大肆骚扰抢劫放火，其惨状不亚于当年的旅顺港大屠杀以及后来日本人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恐怖。恐怖，似乎正是德国人所想要的最终目标。德国人就把这种恐怖一直推到法比边界。

对于德国人的刀光剑影，肖伯纳先生在1914年写道，整个世界“又头痛又厌烦”，“我们被普鲁士军国主义对我们的蔑视，对人类幸福和常识的蔑视，折磨得忍无可忍，我们只好群起而攻之。”

阿尔贝国王面对他的国家遭受如此巨大的威胁，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堪称千秋楷模。当初，没有人会想到比利时竟会表现得如此英勇不屈，在敌人的猛攻下，国王和政府在被削弱了的比军保护下撤到安特卫普。而在占领区，尽管德军采取了最恐怖的手段，但屈服投降的念头从未在比利时人的头脑中闪现过。游击队的不断骚扰使得德军困苦不堪，一听到游击队，德军就控制不住歇斯底里。“可恶”的比利时人最早使

德军的梦想蒙上一层阴影，他们不得不留下部分军队，采取特别措施，警卫后方交通。

大战开始时，一批美国记者获得了德军颁发的证件，一直随军采访。他们都是杰出的妙笔生花的写作大师。他们写到比利时人遭到的种种景况：“火后的农村空无一人，只是在毁坏的台阶上有一只不声不响的猫蜷伏在那里……难民络绎不绝，背着包袱，赶着马车，带着雨夜在路边过宿用的雨伞。田野里，成熟的谷穗低垂着头无人收割。”他们还写下一句被反复问及的话：“你们看见法国人了吗？法国人在哪里？英国人在哪里？”

当德国在比利时由北向南卷来一股股土灰色浪涛的时候，穿着鲜艳的红裤子、蓝上衣的法国士兵正在一往无前地向预定目标——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开进。一个向东，一个向西，都有着理直气壮，气吞山河的理由。但在法国的道理中，感情色彩几乎取代军事目的，靠阿尔萨斯的奥秘激起的强烈爱国热情成了法军进军的主要动力。不论敌人有任何行动，它对阿尔萨斯的攻击欲、占领欲似乎并不比德军对列日、对比利时的稍弱些。因此当德军在比利时大肆制造恐怖，

比利时人翘首企盼，当阿尔贝国王带领他的臣民决心充当欧洲的普罗米修斯的时候，霞飞和他的参谋部正在拼命地挖掘法国人的炽热的阿尔萨斯情感。一支与西线德军数量相当的法军被布置在从凡尔登到土尔一带的防线上。它按番号分成5个集团军，前2个目标对准法德边界，后3个则用以对付德军中路，以便按霞飞的妙计在德军的战线上打入一个令其丧命的楔子。受到德军右翼冲击最敏感的是由“真正的雄狮”朗勒扎克将军统帅的第五集团军。朗勒扎克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切身的利害，在8月1日即致信霞飞，指出这种冲击的危险性和现实性。当第三集团军司令吕夫将军也提出“德军可能从比利时侵入”，而对十七号计划提出自己的看法时，霞飞带着他那惯有的人们所熟悉的神秘莫测的天使般微笑说，“那只是你的计划，不是我的”。在他看来，一次胜利的战役不需要什么完美的计划，而真正需要的却是最坚强的意志和最坚定的决心。实际上，崇尚这两种品质的人是不容易听从别人的批评的，哪怕是最善意的批评，最微小的改动性建议，在他们看来都不啻是向自己的权威挑战。

《画报》在战时出版的第一期中，把法兰西表现为一个英俊的法国兵，他把象征着阿尔萨斯—洛林的年轻貌美的姑娘抱起来，狂热地搂在怀中。8月14日，法国第一、二集团军向东北进发，进入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头四天，法军进军顺利。面对法军进攻，德第六、七集团军边战边退。法国人重新进入40多年前失去的地方，法国的三色旗终于在阿尔萨斯重新飘扬。在大广场上，法军举行了历时两小时的盛大阅兵典礼，军乐队高奏《马赛曲》和《桑布尔河和马斯河进行曲》。阿尔萨斯—洛林的子孙后代终于又回到法兰西大家庭，家家户户的窗口都有人挥动旗帜和手帕。但是，法国人落入了圈套，按照史里芬计划，德第六、七集团军的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法军牵制在法德边境，以便完成梦寐以求的右翼包抄。因此，它的先行退却是为了诱法军深入，以其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为毒饵，把它推进战略上遭受失败的深渊。当法国人为收复失地而庆幸，为实现了苦苦求索40年的复仇雪耻而热泪盈眶的时候，20日，退至莫朗日—萨尔布尔—孚日山脉一线的左翼德军突然回过头来，对法军实行猛烈反击，以大炮和榴弹炮弹给

法军以很大杀伤。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法军难以招架，全线溃退。十七号计划开始破产了。其实，由于它的不切实际，早在被制订出来时就注定了必然破产的命运。

十七号计划渐显庐山真面目。法军参谋部认为德军中路兵力薄弱，而法军在这一带占有绝对优势，决定性的战斗将在这里打响。这才是十七号计划的制订者的得意之处，也是霞飞总司令摆脱对阿尔萨斯的狂热追求而运用了足够的理智和聪明写下的神来之笔。8月21日，霞飞发出了在阿登地区和桑布尔河发起总攻的命令。

不幸的是，法军对不利的自然条件以及敌人的强大力量都严重估计不足。阿登地区的地形不宜进攻，森林茂密，丘陵起伏，地形复杂，当年恺撒用了10天才通过这个山区，他把这里隐秘的、幽暗的森林描绘为“恐怖之乡”，道路泥泞、泥炭地上冒起的雾霭终日不散……事实上，法军在阿登地区也不占优势，而是恰恰相反。担任第五集团军司令的德皇太子虽然才智平庸，但他对列日方面的荣誉羡慕不已。他求战心切，迫不及待想创造“勇敢的奇迹”。与法统

帅臆想相反，共有 10 个兵团的王储的部队和符腾堡公爵的部队，总兵力和大炮比法军第三、四集团军多得多。临战之前，第三集团军的 3 个主力师，约 5 万之众竟在吕夫司令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霞飞不声不响地抽走了。我们这些后来写史人真不知是该称赞法军的灵活性，还是应批评霞飞的越级调遣？双方在阿登地区茂密的森林进行艰苦的战斗，双方损失都很大。经过 3 天的激烈血战，法军终于支持不住，败退下来，一路退向凡尔登，一路退向斯特内和色当。法军就这样极不情愿地放弃了十七号计划中最宝贵的精髓。

没有谁比朗勒扎克更忧心忡忡更对十七号计划毫无信心了，德军右翼企图跨跃马斯河以西地区的情报虽然零星琐碎，但不久就能据之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全貌。它对于朗勒扎克和法军总参谋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总司令部认为这的确是阿登地区德军中路兵力薄弱的有力佐证，而朗勒扎克则明显感到德军右翼滚滚而来的浪涛。经过不断的各执己见的争论，虽然霞飞仍坚持第五集团军配合阿登森林之战，但德军对迪南的进攻，迫使他不得不改变计划，

命令第五集团军北上，进入桑布尔河和马斯河之间的夹角地带，准备迎头痛击企图西渡马斯河的德军。原来，由于德第三集团军强渡马斯河，向南绕行欲包抄法军后路，为避免被围歼，朗勒扎克毅然率队脱离接触，于8月23日悄悄向南撤去。

让朗勒扎克忧心如焚的还不仅仅是要命的十七号计划，萦绕心头的还有原计划登陆的英国远征军迄无踪影，从而使第五集团军的侧翼完全暴露。

当德国军队开进被称为英国边境的比利时，英国人也许感到了一种尊严被蔑视的痛苦。在公开的国际舞台上，英国人把比利时当做它一把左右逢源的利剑，公开宣称比利时的中立就是大英帝国在世界面前的荣誉。因此，不论从何种角度看，英国都不会对德国这一行为等闲视之，它需要做出某种姿态，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举动，以求平息解脱一下心头的尴尬。在战前，英法似乎有这样一个不知是否成文的协定，即：法国负责对付德军在大陆上的攻击，而英国则在海上给德以重创。这样的分工似乎合情合理，但英国人不能允许他们的“海岸线”受到丝

毫骚扰，这种侵扰不但使统治阶层心惊肉跳，普通的英国百姓也会寝食难安。于是8月14日，由陆军元帅约翰·弗仑奇率领的一支3万多远征军平静地渡过海峡后，在亚眠下了火车。

英军在大陆登陆的具体情况始终对德保密。德军在蒙斯第一次碰上他们之前，无从知道英军有多少人，何时开抵何处。德第一集团与英军不期而遇了。司令冯·克卢克将军，其貌不扬，黑色的皮肤，一副可怕相，看上去不象年近70的人。他在1870年的战争中负过伤，是带着再次创造色当奇迹的梦想走上战场的。他的部队被视为右翼主力，这不仅是由于他本人的能力和威望，而且还在于他率领的确是一支最雄厚的打击力量。由于情报失误，冯·比洛命第一集团军挥戈南下，而素有“坏脾气”之称的英军司令弗仑奇拒绝了法要他领军向右攻击德第二集团军的建议，于是，8月23日，克卢克和弗仑奇在蒙斯交上了手。仅3万人的英军，拼死作战一天，第二天不得不败退而去。

最初的较量停止了，它以法国十七号计划的破产和德国史里芬计划遭到意想不到的挫折而告终。土灰色浪涛席卷法比边境，滚滚南来。

决战马恩河

8月29日，有“忧郁的儒略·恺撒”之称的小毛奇，并没有为胜利之师的前进而欢喜若狂，他的性格要求他对征途上的困难做出客观估价，他痛感忧虑。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形势如此严重，德皇却漫不经心。他已陶醉于一种胜利的欢呼声中，这种情绪是我所深恶痛绝的”。尽管不断报称英军和法军“已被打得一蹶不振”，但毛奇以他特有的目光注意到了一种可疑的情况，那就是没有出现通常所见的溃逃和无组织撤退的迹象，他直观地感到敌人虽被打退，他们仍会在别处出现，重新开始他们暂时放弃的抗击。战斗将继续下去。

但是对于一个七旬的老人，一个屡建战功、梦想不灭的军人来说，大半生的经验使他有权利保持与自己的身分和年龄相当的自信，而且这种自信又赋予一个老人固执己见不为他人左右的性格。与顾虑重重的小毛奇相反，冯·克卢克将军现在正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他以一种令人悚然的气派，傲然阔步地向前走去。他认为对

手已被击溃，正在抱头鼠窜。他明显地感到，关键时刻已经来临，应该狠下决心，不让敌人有丝毫的喘息机会。于是，他以自己那种勇敢的自信，决定改变总参谋部要求的“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的计划，挥师转向，变外侧包抄为内圈包围，从正南转向东南，从内侧掠过巴黎，直追朗勒扎克。于是，他给自己的部队下令，“必须兼程行军”。小毛奇怀着对史里芬的内疚，同意了克卢克的内圈包抄计划。更使他自责的还有，遵照史里芬的设想和规划，要不遗余力地增强右翼的力量，而不惜削弱它的左翼。但是突破法军堡垒的前景诱惑着他，使他举棋不定。克卢克的建议恰好避免了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矛盾，也使小毛奇看到了抛开陈规所展现在面前的理想前景，这使他如释重负。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克卢克的大胆计划是以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后援部队为前提的，还得以他的前面的对手英国远征军远远逃遁为条件。小毛奇无法满足前一点，后一点也不是德国所能左右的。非但如此，在王储的活动下，经德皇首肯，小毛奇又犯了一个使史里芬不能安卧地下的错误，即他把原来用于增援右翼的预备队，用来加

强左翼，并下令由防御转为对南锡高地法军的进攻。德军左右齐飞，两翼并进的态势完全违背了史里芬的临终遗嘱，它反映了小毛奇那种缺乏信念和意志、左右摇摆、瞻前顾后的矛盾性格。而这些是由一个人的智慧、洞察力和勇气所决定的。对德国人来说“不幸”的是，史里芬完美无缺的蓝图被一位缺乏同样完美无缺能力的人破坏了，如果史君地下有知，不知是会暴跳如雷呢，还是会潸然泪下？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这种被霞飞几乎发挥到极限的观点，显然不适于克卢克将军，他刚愎自用地大胆改变上级的行动计划就说明了这一点。39天内就将击溃法国，进入那个威廉二世梦寐以求但终生无幸登临的“仙境”——巴黎，进而实现主宰欧洲的目标，这鼓舞着克卢克和他的士兵做最后的冲刺。他的军官们一路纵马挥鞭逡巡，拼命催促士兵前进。“我们的士兵已精疲力尽”，一名军官在9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们踉踉跄跄，满面尘土，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活象一具具会行走的稻草人”，“使他们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是早日胜利和得意洋洋地进入巴黎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他们就会瘫倒

下来，就地入睡”。他们哪里知道，行军路线已经改变。更令人吃惊的是，被他们穷追猛赶的英国人，竟能回过头来，于9月1日在贡比涅和维莱科特雷的森林里给他们迎头痛击，并且成功地摆脱了德军追击，9月3日渡过马恩河。为了防止敌人的突袭，小毛奇通令克卢克放慢速度，列成梯队，尾随第二集团军之后，并注意掩护两军的侧翼。这对克卢克不啻于天大侮辱，比听命于比洛更使他难于接受。这位一手挎着步枪，一手握着左轮手枪，面容严峻的将领，给他的部队又发出了一道命令：继续前进，跨过马恩河。于是在法军参谋部里挂在墙上的地图上赫然无误地呈现这个事实，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他们把侧翼送上门来了，他们把侧翼送上门来了。”于是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上光辉的篇章——马恩河战役。

边境之战使十七号计划彻底破产，但促使十七号计划形成的生命的冲动并未消失。而且由于宿敌的入侵，尤其是9月3日，那份由加利埃尼亲拟的、措辞经过一番精心推敲的公告，激起了人们那种玄妙的意志。公告说：“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防务，共和国政府人员已撤离巴黎，

本长官兼司令业经受命，负责抗击入侵之敌，保卫巴黎……”当德国人以为胜利唾手可得，法国人在劫难逃时，曾经拯救过法国的力量又经过积聚而爆发。以毛奇的话说：“法国的冲动眼看即将消失，但顿时又熊熊燃烧起来。”

福煦将军曾说，“1914年，如果我们没有他，我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将是个什么样子”。他指的是霞飞，这位在8月份以错误的十七号计划给法国带来巨大灾难的人，这个被他的属下认为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出错误所在，而把一切失败的责任推给他的将军们，从而在边界之战后，在他的各个集团军司令中来了个大换血，包括撤掉从战争一开始就似乎显得比自己还正确的第五集团军司令朗勒扎克的人，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本质——正是这种品质挽救了法兰西，即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临危不惧的勇气。在德军认为法军已溃不成军，胜利指日可待时，霞飞和他的参谋部又发出了第二道命令，将第三、四、五集团军撤至松姆河和凡尔登一线，准备反攻，并且做了周密详尽的布署。霞飞不同于他的对手小毛奇，小毛奇很少亲临前线，也许这与他的军队是在异国他乡作战有关。他对部队的指挥取

决于各集团军的情报，因此加剧了他行动上的左右不定。霞飞是一位资历浅、缺乏真正训练的司令官，他把司令部设在与5个集团军距离相当的地点，和他的将军们经常见面。他总是安详地坐在汽车的后座上，由专任的私人司机——汽车竞赛三次获得大奖的乔治·布约驾驶，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巡视各地。因此，霞飞对自己的情况了如指掌，对自己所要从事的行动有必要的思想准备。毛奇尽管也没有狂妄自大的毛病，但他的脚步制约了他的思想。虽然他做了种种可怕的估计，比如说9月4日，他有过这样的议论，“我们的马几乎没有一匹再能向前迈进一步”，“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获得了成功，但不是胜利。胜利意味着消灭敌人的抵抗力量，当成百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胜利者必然有虏获，但我们的俘虏在哪儿呢？……再说，从缴获的大炮数量较少的情况看来，我认为法国人正在作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他道出了一般人所讳言的看法。但是这只是他朦胧的看法，如同他事事举棋不定一样。战局的变幻莫测和艰难困苦不是增加而是减弱了他的意志，这也是他输给霞飞的致命一招。当一个具体的计划制

定出来，不同性格的人拿着它走上实践的战场时，所出现的结果会截然不同。

霞飞面临有利战机，开始也有些犹豫，但在其部下的不断催促下，下了反攻的决心。9月5日，霞飞在做了新的布置后，走进位于塞纳河畔夏蒂荣的作战室，对聚集在那里的军官们说：“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决战吧！”他签署了准备翌晨军号一响就向部队宣读的命令：“现在，战斗已经打响，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人人必须牢记，已不再是往后退的时候了。必须全力进攻，击退敌人。部队如感到不能前进，则必须不惜代价，坚守阵地，宁死不屈。在当前形势下，决不容许失败。”

惊醒了的小毛奇连忙给孤军南下的克卢克下了一道通令，要求第一、二集团军阻挡巴黎地区法军的威胁，但克卢克仍同往常一样置之不理，况且法军的行动也使他无法照令行事。9月5日，法国第六集团军与德军不期而遇，在马尔克河西岸交手。6日，第五集团军也按计划返身与德军厮杀起来，在德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之间制造了一个缺口。英军则开向了缺口，甚至快要插了进去，但其行动显然太慢，没能咬住德军。

双方展开空前激烈的遭遇战。生死关口，强悍的日耳曼人抖擞起精神。当克卢克几乎要击败莫努里的第五集团军时，加利埃尼征用市内出租汽车将在巴黎刚下火车的6000子弟兵疾速送到前线，这才保住了阵地。德国豪森和比洛的部队压得法第九集团军步步后撤，是福煦高呼“能坚持到底者胜！”鼓舞着士卒击退了比洛……9月7日，小毛奇下令部队后撤，退守努瓦荣—凡尔登一线。法国人尾随德军前进，在埃纳河前被阻。双方就地设防固守，战役宣告结束。双方参战11个集团军，总人数约200万。“常胜军”后撤，法英军推进60公里。小毛奇在写给德皇的呈述中说：“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史里芬计划破产了，德国速决战幻灭了。毛奇家族在德国军界无比荣耀的历史也断送了。埃里希·冯·法根汉接替小毛奇担任了德军总参谋长。

但是，业已开始的战争呢？由于这一个月多的战斗使理想破灭，而必须重新寻找出路。德国士兵不仅没有在叶落之前凯旋荣归故里，而且必须在法兰西旷野上那阴暗潮湿的战壕里忍饥挨饿，带着绝望的痛苦渡过未来3年寒暑。

第四章 神话的诞生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神话，就如同人类将始终有梦想一样。因为在它们身上可以寄托尊严、希望，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在它的身上可以找到心灵的慰藉和道德的框架以及荣誉的确切定义。而神话的由来又与人的梦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生活中很多优秀人物往往被善良的人们披上神圣的花冠。更确切地说，现实加上梦想则预示着一个神话的诞生。上帝耶稣则是人类创造的千千万万神话中最“杰出”的一个，在他的身上，人类可以找到任何所需要的智慧和美德，而这种智慧和美德又零零散散地闪现在你周围各种各样的人身上。人们创造神话，利用金光闪闪的神话自我欺骗，而少数绝顶聪明的人却宁愿闭起眼睛，不忍去揭穿它，在它的光环笼罩下载歌载舞，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这是

人类最后一块避风港，还是不要去破坏它吧！

后院起火

当小毛奇为西线不能顺利地实施史里芬计划而焦虑不安的时候，在德国的后院——东普鲁士起火了，粗鲁的哥萨克闯了进来。

威廉二世违背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同俄国交恶，从而为他征服世界又多制造了一重障碍，注定要面临两面作战的局面，使德国向西方推进，去实现其大刀阔斧的计划时，不无后顾之忧。可以说德国在俄国问题上是不够胆大妄为的了。它先是把俄国推向了法国，使它们结盟，进而形成三国协约，丢弃了同英国争霸时可以依靠的伙伴，丧失了普鲁士“后院”的平静与无忧无虑。战争爆发时，它驱赶百万大军奔赴西欧战场，仅仅保留了一个集团军守卫它的家园。这种冒险确实是出于欧洲人对俄国的偏见，只是在俄国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时，才使它的这种做法真正面临巨大危险的边缘。

法国人在制定和实施它的十七号计划时，是把俄国能够在东线发动进攻并牵制住一部分

德国军队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的。这就如同德国在它在西线推进史里芬计划时，是以俄国不会在东线组织起有效的进攻为假想的。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两种不同的对俄国的希望竟然渊源于共同的对俄国的业已形成的看法。德国人认为从俄国的现状和历史看，它不会在发出动员令 15 天内做好进攻的准备，而这恰恰是德国预计征服法国的关键时机，他们得意的认为等把西线踏平之后再去对付俄国，从时间的安排上讲就如同史里芬计划一样天衣无缝。对于德国人的看法法国人是深以为然的，认为要俄国在 15 天之内完成动员和集结部队，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欧洲人的眼里，俄国陆军声名狼藉，积弊甚多。在克里米亚之战中，俄国陆军曾在自家的土地上吃了英法两国的败仗，而在 1877 年普列文防御战中，土耳其这个在欧洲人看来不可救药的民族竟然也能挫败俄军，只是后来因众寡悬殊而告失利。尤其是 1905 年，日俄战争，泱泱大国竟败在日本人的手下。俄军这些糟糕的记录，不能不令其气短，别人则深信其必然是欧洲最差劲的军队，英国派到日本军中的军事观察员伊思·汉密尔顿早对俄军的弱

点做过最不留情面的概括：情报工作很差，部队不知隐蔽，不知保密，也不讲求行动的敏捷，缺乏斗志和主动性，缺少良好的将材。但是这些弱点并不令英法同盟担忧，他们所要求的就是俄国能够组织起进攻，而不论这种进攻是否有效，“单凭他们进攻了德国领土这一点就可望造成举世震惊的效果”。

法国政府很清楚对于俄国来说卷入未来的战争会是多么凶险，但是它也非常明白把俄国拖入这次战争对法国会有多么大的好处。因此在动员沙皇下决心签署总动员命令的问题上，法国外交部门花费了大量脑筋。7月26日夜法国大使巴利罗格在和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密谈之后，发表一项声明，称“法国大使遵从我国政府的指示通知外交大臣说，在必要的时候，法国政府完全准备尽它作为一个盟邦的义务”。这种保证宣言鼓起了俄国参谋部舍身投入一种非常残酷的冒险的决心。法国针对与德国战争的命运不可避免的现实，早就为促使俄国与德国为敌的问题上精心努力着。1911年，当时身任法国陆军部参谋长的迪巴伊将军奉命前往俄国，去给俄国的总参谋部灌输必然夺取主动的

作战思想。1912年，俄国总参谋长日林斯基来到巴黎，1913年霞飞将军又前往俄国，两国参谋部之间频繁来往，双方的协议日益牢固，这种协议主要是要求俄国尽早发动攻势。俄国仿佛受制于法国人那种冲动的魔力，这种魔力把俄国军界和政府那埋藏已久的雄心激发出来。自从中国东北蒙垢以后，他们急欲一雪出师败绩的耻辱，因军力孱弱而自惭形秽的心情当然也需要谋求振作之道。俄国参谋部被法国人那种殊死进攻的理论所感染，法军领导人讲演集被译成俄文，在军界争相传阅，备受欢迎。军界在这种感染中变得神采飞扬，发生了掷地有声的诺言：一俟俄国前线部队进入阵地，不等全军集结完毕，就在动员令发出的第十六天发动进攻，越过东普鲁士。沙皇在双方签字的协议上声言，“我们应该对准德国的心脏打击；我们两国的共同目标必须是柏林”。他全然不提俄国即定的目标是奥匈。

很显然，被热情鼓舞起决心的俄国参谋部在制定计划时，大胆有余而细心不足。他们更多关心的是怎样促使人们行动起来，而很少考虑他们如何发挥作用。但就是这一点也是很难做

到的。俄国的幅员广阔为统一行动增添了巨大障碍，且不说一道命令传递给各地驻军需要多长时间，而这段时间恰恰是执行和完成这次命令最为宝贵的时机，只论其在战时运送士兵的铁路系统也是令人担忧的。在动员期间平均每个俄国兵的输送里程是 700 英里，为德国兵的 4 倍，而当时俄国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只及德国的 1/10，而且德俄两国铁路轨道宽窄互异，运送士兵的火车往往不能达到前线目标，士兵需要徒步行军。这就为动员和战时行动造成了致命的障碍。

同样致命的还有支持这个军事机器运转的是个“愚不可及的政体”，“它是集怯懦、盲目、狡诈、愚蠢于一体的大杂烩”。操纵这个政体的核心人物即是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是一个身体虚弱、优柔寡断的人。他那金玉其外的美髯掩盖了腼腆而且犹豫不决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听信他那任性、倔强、多疑、歇斯底里的皇后。他在施政用人上只存一个念头，即把他父皇传给他的专制皇权要加维护，勿使损缺。他不喜欢同臣民有密切的接触，更妒忌那些出色的有能力、有主见的大臣。俄国的大臣们总是抱怨沙皇这

样一个缺点，即总是听信最后一个向他进言的人的建议。鉴于父辈的经验，他总是担心大臣们有朝一日会夺走他的君权，因此他逐步疏远当初为他效劳的大臣。一些敷衍塞责的，但又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却得到他的信任。这种人向他反映某些虚假的情况，往往比官方的报告更容易得到他的称赞，于是各种各样的骗子、冒险家利用尼古拉二世的昏庸无知都混迹于沙皇朝廷。其中最大最有名的骗子拉斯普廷，这个西伯利亚的农民以预言家的身分取得了皇后的信任，掌握了朝权。在这种阴影笼罩下的各政府机构，其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在陆军中，军官的任命和擢升，主要依仗有社会地位的或有钱的靠山，耄龄老将多如过江之鲫，他们殚思积虑，日夜忙碌，为的只是保全他们在宫廷里的恩宠和权势。这样的制度之下，虽然依然存在极少数英勇干练的军队，但却不利于把最优秀的人才推上最合适的位置。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对陆军大臣苏克霍姆利诺夫有一句评语，“要他干工作固然很不容易，可是要他说句老实话那就简直难如上青天”。也许是出于对1877年对土耳其一仗中因骁勇善战而荣获圣乔治十字勋章的光辉历史

的缅怀，他坚持认为“过去的战争是这样，现在的战争也还是这样”，所谓现代战争关于对诸如火力要素，“射击的组织与实施”等问题“都只不过是邪门外道的新花样”。战争取决于“双方火力的较量”，他对这类告诫则一概嗤之以鼻。他坚信刺刀胜过子弹，所以根本不肯花费力气去兴建工厂，增产炮弹、步枪和子弹。在俄国，苏克霍姆利诺夫们甚至连政府专供生产军火的拨款也未用完。在开战时，每门大炮只摊到850发炮弹，而西方国家每门大炮则有2000~3000发炮弹的储备。他草草收场了日俄战争后在陆军部的改革，对德备战的工作也是松松垮垮。俄军参谋部被削去自主的权力，难于出现一个有作为的领导人。1914年以前的6年间，共换了6个参谋长，这种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影响了作战计划的周密性。……但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却赢得最初对德作战的胜利，可谓俄国人在一战中创造的第二个神话。

1914年8月12日拂晓，俄国总动员的第十四天，比沙皇的诺言还提前了两天，莱宁坎普将军的第一集团军的一支先遣队，在主力推进之前，拉开了杀入东普鲁士的战幕。德国在东线的

任务主要是防御，它派出相当于俄国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即普里特维茨率领的第八集团军。他根据德国的俄国问题专家第八集团军作战处副处长霍夫曼的建议，制订出作战计划。准备利用俄两个集团军行动时必然出现的时间差，诱使其第一集团军深入境内，然后击破之。因此，打算随着俄军的突入，主动做出退让，然后在距边境25英里的贡比楠（今古谢夫）迎击敌人。但如同西线的克卢克将军一样，在第八集团军里，冯·弗朗索瓦也可谓是位信念坚定的将领。他无比自信主要表现于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正确而充分理由的同时，顽固地拒绝上司下达的要求他停止随意行动的军令。

8月16日，弗朗索瓦在贡比楠（今古谢夫）设下司令部后，马不解鞍，继续向前。他把其它兵团远远抛在后边，并且打乱了集团军司令部业已完成的对俄防御布置。麾下大多是普鲁士士兵的弗朗索瓦的头脑中显然存在“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糊涂念头，他还犯了“孤军盲动”这一军事战术之大忌。幸好他的对手是俄国人，而且与其相同，也没有重视起码的军事常识。可能是协调不够，莱宁坎普属下的第三兵团

比其它部队早动作几个小时。在距边境仅5英里的施塔卢珀楠两军遭遇了。俄军对于战斗思想准备不足，三兵团的第二十七师开拔过早，对敌人的攻击毫无防御，它的一个团被打得溃不成军，为德军留下了3000俘虏，撤回边境改编去了。随心所欲的行动竟带来出乎意料的好效果。

如果说最初的交锋给俄军的进攻以挫折的话，而对德军的影响则仅仅是使弗朗索瓦深信不疑：拒不从命是大有好处的，并且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满怀感情地描绘居民们离乡背井的情况，慷慨激昂地力陈拱手让普鲁士国土遭受斯拉夫人践踏的可耻，把自己打扮成胜利女神派来的正义之师，因此他坚持靠近边境作战。他统率部下要在贡比楠（今古谢夫）同莱宁坎普展开更大规模的战斗。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最高指挥官不能控制他的属下，显然就不能贯彻全军的战斗方案，不能使全盘行动的各个环节协调一致，普里特维茨被弗朗索瓦和俄国人共同制造的烦恼搅得心神不宁。更可悲的是，他又不时被弗朗索瓦的举动所感染，为他的言语所打动。当他已把各兵团安排在安格拉普河，形

成一条防线之后，竟又同意弗朗索瓦在前方的进攻，向贡比楠调动兵员。20日，当其它兵团匆忙赶到战场时，已失去“先手”。俄军因弗朗索瓦部炮声的提示，已做好准备。这次受到炮火轰击的是德军，慌忙参加战斗的德军很快成营成营的、铺天盖地的从路上和田野里向后方涌去。俄军一个集团军打败了德国的一个集团军。虽然弗朗索瓦这支不败之师给俄军右翼以重创，但远不能抵销由于他的错误给中路、左路造成大败而退带来的损失。贡比楠战役失败了，这是在德国军国主义者眼中最不堪一击的俄军在东线创造的不啻于神话般的奇迹。尽管这个奇迹的出现是由许多的因素造成的。

普里特维茨认为只有退守维斯瓦河才能挽救第八集团军并使它衔接起来，这就意味着要放弃东普鲁士。小毛奇被吓呆了。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对传奇人物将粉墨登场了。正是他们在东线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不仅挽救了东普鲁士，而且把人们从由于西线失败，对小毛奇的失望情绪中解脱出来。军国主义者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上帝派给了德意志又一对战神，德国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神话般的梦想，

也渴望他们为德国创造更新奇的神话。这将是东线上继俄国人莫名其妙创造的神话之后，更令人眩目的“伟大”神话。

HL

当东线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部正在焦头烂额地寻找新的良策并准备一挽颓势的时候，8月22日，一封电报被送到办公室，电报通知说，一位新司令和一位新参谋长的专车将于明天到达。这表明胖子白痴普里特维茨和其助手瓦尔德泽被免职了。

德国绝不打算把东普鲁士拱手让人。不讲这块土地如何美丽、富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德国民族的心脏和灵魂所系。容克贵族的庄园在这里比比皆是，霍亨索伦皇室在这里有一个方圆9万英亩的禁苑，德皇每年都要来这里行猎。而且普鲁士的历代君主加冕登基之地的“国王城”也在它的境内，德国人岂肯轻易把它放弃。小毛奇放心地挥师西向的唯一安慰就是认为俄国不会如期进攻。

要探寻贡比楠之捷这个神话产生的原由，

应该说其中很重要一点正是俄国的“提前行动”促使了德军在最初的失败。这种失败给俄军以大获全胜的假象，莱宁坎普所部不仅没能乘胜追击，反而毫无理由地膨胀了轻敌思想。俄指挥部甚至下令“赶快肃清东普鲁士的敌人”，以便调一部分军队去支援西南方面对奥匈的进攻。克劳塞维茨认为，胜利并不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敌人有生力量是否被消灭。这一点上，俄军显然是门外汉。正是因此，刚刚获胜的俄军，总兵力远大于对手的俄军，不久之后即陷入惨败的境地。

珠联璧合的一对德国将领创造了扭转乾坤的神迹，还创用了一种奇妙的二人天衣无缝结合一体的标志——花押HL。HL不仅在一战的战争中出尽风头，而且在德意志帝国后期，几乎成为帝国的统治力量。兴登堡名字的德文是 Hindenburg，鲁登道夫名字的德文是 Ludendorff，它们的第一个字母H和L的合写即是“HL”。他们签署文件，命令就使用这个花押“HL”。

重视参谋长的人选和地位是德国军界的一种惯例。当小毛奇为东线筹谋理想人选时，首先圈定了鲁登道夫。可以说，小毛奇把东线的希望

押在这位鲁登道夫身上。埃里希·鲁登道夫同大多数德国军人一样是一位职业军官，他是一位以军队为本、以战争为职业、以胜利为目标的军界少数野心勃勃富有才干的人物。他的优秀品质在一星期前的列日之战中初露峥嵘，成为攻克列日的英雄，受到德皇的嘉奖。这次把他从众多军官中选拔出来，派往东线，承担独挡一面的重任，说明他具有扎实的根底，雄厚的实力，这也成为德国军界任人唯贤的一段佳话。还可说是小毛奇下台前，为德国军队做的最大一件好事。

最高统帅部在一封电报中说：“你或许能挽救东线的局势。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曾得到我们这样完全的信赖。德皇也完全信任你。”不过鲁登道夫雄心勃勃，锋芒不敛，需要挑选一位善于同各种人相处、极有涵养和杰出的军事才干的主将，以便鲁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最高参谋部突然有人想起在战争爆发时，收到一位老同事的来信，信上说：“如果情况的发展需要一位指挥官的话，不论哪里，请不要忘记我。”他就是性格随和而善于处事的兴登堡。在东线局势不妙，俄军重压之下，面临崩溃边缘，普里特维茨

显得惊慌失措的时候，不需要一个神经质的人。兴登堡以往行事，可资信赖，一向稳如磐石，以沉着镇定闻名。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一书中说，“东线作战的领袖不是最高司令官，而是参谋长。作战意志取决于参谋长”。他说：自己虽无越俎代庖之意，但“参谋长立于总司令之旁，实有自立门户之势”。试想泛泛之辈岂能与之善处？更不用说和衷共济屡战屡胜了。事实上，确如其所言，在未确定总司令之前，鲁登道夫已经到达科布伦茨，听取毛奇和德皇关于东线战事的指示，并且给前线的第八集团军发布新的命令，发挥东线首脑的作用了。

8月23日，鲁登道夫与兴登堡在汉诺威东站见面，开始了日后辉煌的合作。鲁登道夫在车上向兴登堡汇报了东线的情况和已发出的一些指示。兴登堡耐心地听了15分钟，说了一句“我也没有更好的主意。我看就这么办吧”，就去睡觉了。这样，他从一开始就完全适应了自己所应担当的角色。后来，他成为陆军元帅，但同时也博得了一个“你说呢？元帅”的诨名。这是从每当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总是转向鲁登道夫“你说呢？”的习惯而来。在这次合作5年后，未同鲁登

道夫闹翻以前，他曾坦率地讲过，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使我的参谋长的聪明才智、几乎超凡的精力和从不懈怠的干劲得到充分的发挥，必要时为他创造条件”。

鲁登道夫初来东线，对情况尚把握不住，而且对形势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多是按照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霍夫曼中校早已拟好的围歼俄军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计划发出相应的指令。

实际上，早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还在旅途中“坦能堡战役就已打响”。俄西北战线司令日林斯基的任务是协调莱宁坎普顿和萨姆索诺夫的行动，但是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完成预定的钳形攻势，因此只是一味地要求部队前进。莱宁坎普顿已提前出发，并且在前方与敌人交了火，因此8月19日，他要求第二集团军要赶紧行动，“你们要加速行动，要尽量使劲”，这样俄军原有的仓促参战的种种不足就显露出来了。由于铁路轨道不同，士兵徒步行军，疲惫不堪。后勤供应也跟不上，“一个兵团由于另一个兵团的补给车辆没有开到，就分一些炮弹给它，这样也就搅乱了自身的计划。面包车也不见踪影，军队的给养需靠敌人的乡村供应，一匹马在沙砾上

拖动炮架，事实证明是不够有力的，在有些地方，不得不把一辆货车的马卸下来，加套到另一匹的车辆上，用两匹马来拉一辆车子。向前走一段后，再把马卸下来，套到抛锚在后的车子上，然后再如此往返，一段一段地前进。”26日，日林斯基电告，“我坚持要立即投入决战”。萨姆索诺夫回答说，“乡村毁坏，马已久无燕麦，人也无粮食”。但就在这天，萨姆索诺夫所部十五兵团与德军相遇，战斗打响了。日林斯基不顾莱宁坎普顿在北线按兵不动，仍令萨部前进，去实现原定截断德军后路的任务。德第八集团军摸清形势后，决定置莱宁坎普顿于不顾，挥戈南下，全力对付萨姆索诺夫。

霍夫曼中校曾声称：他对莱宁坎普顿和萨姆索诺夫的不睦了如指掌。二人的互不配合在日俄战争中已屡有表现。当时萨姆索诺夫的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由于莱宁坎普顿的骑兵师不顾上峰一再命令，始终按兵不动，以致他在英勇作战后不得不放弃烟台煤矿。据说，萨姆索诺夫后来曾在盛京车站月台上同莱宁坎普顿发生激烈争吵，把他打倒在地。因此，霍夫曼认为这次莱宁坎普顿绝不会急于前来支持萨姆索诺

夫。如果他的话当真，那么俄军参谋部把这样两位将领安排在没有需要紧密配合、互相照应的位置上，显然考虑欠妥。不管怎样，事实确是在坦能堡地区，萨姆索诺夫被德包围，得不到援助，士气沮丧。30日，混乱中突围不成，萨姆索诺夫自杀，其余部队或被歼或投降。

当那两军交战时，担任阻击俄第一集团军的德军使用疑兵之计迷惑莱宁坎普顿。白天，大队人员堂堂正正向阵地前进，夜间则悄悄退回。第二天，同一支部队又向阵地前进。这样给俄军以大队德军不断前来的假象，似乎面临的是德主力，使其畏缩不前。直至第二集团军覆灭，俄军仍未醒悟，从而失去大好的作战机会，坐视友邻丧于敌手。8月31日，德军主力在围歼萨部后，又折回马祖尔湖以北，西线的两个兵团也赶到，共同对付第一集团军。“从侧翼进攻敌人是所有战争史上最重要的内容”，这是德国军事院校反复强调的观点。9月初，德军在俄军正面摆开阵势，却以优势兵力去进攻其侧翼，粉碎了俄军的抵抗，迫使其全线撤退。9月11日，战斗结束。东普鲁士一役，俄损失兵力25万，俄军被赶出东普鲁士并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

然而，由于德军在西线遇到了挫折和在马恩河的失败，毛奇被免职。为了抵消它的不利影响，德国报纸在毛奇被免职那一天，即9月14日晚上，都以整版的篇幅宣传“坦能堡的胜利者”，兴登堡一夜之间成为赫赫有名的“英明统帅”。全国掀起了“兴登堡热”。柏林率先建起了兴登堡纪念碑，许多街道广场以兴登堡命名，许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市场上出现种种以兴登堡命名的商品……他被授予元帅军衔，统帅东线全部军队。东线的另外一个一直发挥核心作用的关键人物霍夫曼中校以他那惯用的对同行挖苦口吻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真正有能耐的人是否也会碰巧当上元帅？”在兴登堡调到统帅部之后，他曾对一个到战地参观的人说：“这儿是战斗前元帅睡觉的地方，”“这儿是战斗后元帅睡觉的地方。老实说，这儿也是战斗期间元帅睡觉的地方。”但这些中伤并不能揭穿兴登堡的神话，因为德国太需要他了。

一次战役的胜利就如同一次失败一样，并不是一个因素决定的。比如当年拿破仑在俄国的败北，是出于对哥萨克的恐惧，还是来自严寒的威力……谁能一下子说得清？兴登堡和鲁登

道夫在东线创造的神话也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他们的计划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霍夫曼的建议。这位是德军参谋部里的俄国事务专家，他的军事生涯与俄国密不可分。他1898年从参谋学院毕业后，曾奉派到俄国担任6个月的译员，接着在史里芬任内的总参谋部的俄国科干了5年，然后在日俄战争中出任德国的军事观察员。回到毛奇掌管的总参谋部后，重操旧业，研究对俄作战计划。他研究了俄国的陆军，研究了制约它动员和运输的各种因素，以及俄军可能的进军路线，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事后证明，霍夫曼的观点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在第八集团军面临的一些关键时刻，他都能提出正确的意见，虽然他的理由不尽充分。是他坚持莱宁坎普顿不会追赶的看法，是他提出的计划和草拟的命令把第八集团军调去迎击萨姆索诺夫……这也就难怪他对兴登堡、鲁登道夫那种不屑一顾的挖苦了。

胜利同时也来自弗朗索瓦。这不败之师的倔强统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不理会上司的恼怒，以及由此而来需要

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决心。正是他的孤军深入，并不断以勇敢意志挫败敌人，使莱宁坎普顿进军锐气受挫，一路疑神疑鬼，小心翼翼。保证德军完成了对萨姆索诺夫的包围计划。而对鲁登道夫的粗暴抗命，又保证了其对萨姆索诺夫左翼的打击。

胜利还归功于兴登堡。是他的沉着镇定，密切配合，抚平了鲁登道夫在关键时刻那颗狂躁的心。当鲁氏正在为包围计划精心设计时，却被侦察飞行员提供的关于莱宁坎普顿正在朝着他的方向进军的报告搅得心神不宁。他写道：莱宁坎普顿“千军万马、声势浩大，象一片雷雨欲来前的乌云密布在东北方”，“他只要逼近我们，我们就会失败”。他开始感到那曾经侵扰普里特维茨的恐惧又向他袭来。他被一种举棋不定的痛苦折磨着，不知是将全部兵力投入打击第二集团军好呢，还是应该放弃萨姆索诺夫，掉转枪口来对付第一集团军。在霍夫曼幸灾乐祸的日记中记载：这位列日的英雄“似乎有点神经失常了”。兴登堡也承认他的同伴为“严重的疑惑”所苦。是兴登堡在这关键时刻，使他的参谋长坚定起来，“克服了内心的危机”，很有把握地认为：

第八集团军用不着有丝毫的迟疑，只需留下一支掩护部队来对付莱宁坎普顿即可。兴登堡为坦能堡大捷押上关键性的筹码。

最重要的，胜利还应归功于他的敌人——俄军。霍夫曼就认为，真正赢得坦能堡胜利的原因是截获了对方的电报。他说，“我们有一个盟军，那就是敌人。我们知道了敌人的全部计划”。俄军由于缺乏自己架设的线路，缺乏电报设备，只好使用德国的电报线路和电报局，但这些已被德国人破坏，他们就使用无线电明码发送电讯。由于缺乏经过训练的通讯兵，而且各部队的参谋部门都没有密码和密码员，那些明码和简单的密码很快就被一位派来第八集团军任密码员的德国数学教授所破译。因此，当参谋长为莱宁坎普顿动向所苦恼时，截获的莱宁坎普顿停止前进的命令为其解了忧愁。而在这方面，俄军吃尽苦头。部队通讯混乱不堪。在华沙电报局，一个参谋大吃一惊地发现，一大堆给第二集团军的电报搁在地上，未拆也未送出，因为和战地司令部之间没有建立起正常通讯联系。俄军的空中侦察几乎是零，骑兵侦察效率低下。因此隔着马祖尔湖的第一、二集团军的联系似有似无，

尤为恼人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关于敌方行动的准确情报。当德军在完成重大行动的布置时，他们仍一无所知，毫无准备。

俄国在东普鲁士的行动遭受惨败，但它确实配合了法军的行动，其直接结果是毛奇把原在西线的两个兵团千里迢迢派来支援，从而为法英军在马恩河击败德军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这两个兵团仍在西线，其中之一就可用于填充克卢克与比洛之间缺口；另一个则可增强豪森的力量，挫败福煦。那样就难说战局是何态势了。

收之桑榆

俄国对付的重点是奥匈。在东普鲁士激战的同时，4个集团军开往奥匈边境，准备夺取加里西亚地区，控制巴尔干，进而攻击德国。8月中下旬，双方在从德涅斯特河到维斯瓦河之间300多公里的地段上全线投入战斗。双方兵力超过100个师。奥匈军队在一战史上似乎未打过几场胜仗，它几乎总是仰德国之鼻息。战前，受德国唆使，挑起了同塞尔维亚的争端，拉开战争的帷

幕。当初，奥匈参谋部把俄国、塞尔维亚、黑山作为预想敌。1879年，同德国缔结盟约以后，则完全以德国的意愿是从。在德国的作战计划中，奥匈在东线担任重要角色，被要求当德同法在西线战斗时，牵制俄兵力并掩护德后方。至于奥匈在对俄作战中有什么遭遇，德并不关心。史里芬曾说，“奥匈的命运将不在布格河而在塞纳河决定”。因此奥匈仅仅是德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炮灰，它的利益只不过是德国全部蓝图中的一点装饰而已。八九月间俄奥之战，起初奥匈在卢布林—赫尔姆战役中占了上风，但在加利奇—莱姆堡地区，俄以超过敌一倍多的优势兵力击败奥军，攻下莱姆堡，占领加利奇。而在哥罗多克战役中，奥匈则全线溃败，退守喀尔巴阡山一线。这就打破了德以奥匈牵制住俄军的期望，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军队援助溃乱的奥军。

俄统帅部对战争缺乏明确系统的计划，东普鲁士失败，就不敢在西南线大胆用兵了，失去大好战机。兴登堡、鲁登道夫组建第九集团军，伺机攻击俄西南战线的侧翼和后背。在德军灵活机动的活动下，俄显得被动。直到大批援兵赶来，才以优势兵力在伊凡哥罗德、华沙一带击溃

德奥军队。

一攻失败，兴、鲁及时撤兵，然后远距离迂回到俄右翼，以出其不意的进攻，夺取了战役的主动权。11月11日，包围了罗兹一带的俄第二集团军。俄一时手忙脚乱，急忙调军增强右翼。双方展开十分激烈的战斗。德合围未成，反而陷入源源不断赶来的俄军的包围。如果不是俄指挥等方面的失误，使得德军于11月24日从薄弱处突围，俄军就又会创造一个神话。德奥保住了西里西亚，俄军在维瓦河一带设防。

这一年，俄国人在东普鲁士吃了大亏，但在西南战线颇有进展。在加里西亚打败奥匈军，造成对手40多万的伤亡，主力进抵喀尔巴阡山麓，在波兰重挫德军，令人刮目相看。沙俄有失有得。德国认识到俄军不可轻视，从而奠定其1915年战略重心东移的思想基础。

执拗的塞尔维亚

不知是什么因素给了塞尔维亚民族那种倔强、自尊的性格，世界史上的一些关键时刻，他们的命运往往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情和担忧，正

如1914年及其随后的几年那样。

当那瘦弱的青年不计后果的开了几枪后，塞尔维亚政府故作轻松的姿态，却无论如何也抖不掉固有的沉重。这份重压到7月23日下午6时变得更具体更强烈了。正是这时，由奥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斯男爵递交的一纸最后通牒，将塞政府所有的担心和忧虑变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奥匈帝国在王储被刺后，德国意味深长的同情和鼓励煽起它的复仇之火。威廉二世在驻奥大使的报告中看到：维也纳希望“跟塞尔维亚人来个一劳永逸的清算”一句话，作了一句著名的批语，“要么现在就算，要么永远不算”。它打消了奥政府最初的犹豫不决，奥匈抛弃一切后顾之忧，狂热地拧紧了战争的发条。

为了给对塞作战寻找堂而皇之的理由，奥匈在最后通牒上煞费苦心，千方百计提出一些明知对方不能接受的条件，以便当塞政府拒绝它时，把战争责任推给塞。通牒中明目张胆地干涉塞内政，如提出按奥匈政府拟定的名单开除军队中的官员，惩办边防警卫部队中协助刺杀王储的组织者及潜越国境的人员等，还要求让奥匈统帅部的代表来塞参与调查此事件。它限

塞政府48小时做出答复。否则，断绝外交关系。这薄薄的几页纸满是很强烈的火药味，它又好似一把抵在塞尔维亚人胸口的锋利的刺刀。它留给塞民族的唯一生路就是低头屈膝举手投降。

塞尔维亚的官员在看过这份照会后那种沉重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他们意识到战争迫在眉睫。如何巧妙地应付这困难的局势？在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同时，他们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起草了一份答复，忍气吞声几乎接受了全部条件，仅对奥派代表来塞参与追捕谋刺案罪犯一条有所保留，因为它不合塞尔维亚宪法，当然也不合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这复照不仅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而且更激起国内人民的爱国热情。军官中民族激情不断高涨，人们纷纷要求政府对奥作战。

塞尔维亚政府对协约国寄予很大希望。但三大国并没有给它什么实质性的支持，俄国甚至劝告塞放弃抵抗。

7月25日下午6时，截止时间到来之前，塞尔维亚首相巴希齐向奥公使递交了复文。很快，他接到吉斯公使早就准备好的文件，内称“现在既然期限已到，而我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故特通

知阁下，我和帝国公使馆的全体职员将于今晚离开贝尔格莱德……从此信送达阁下的时刻开始，塞奥之间外交关系的断绝，将要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吉斯和属下迅即赶上6点30分的火车离去，创造了断交史上外交人员撤离的最快记录。

战争开始时，塞尔维亚共有24.7万人的军队，分为4个集团军，加上后方部队近40万人。但它没有国防工业，武器几乎全靠进口，装备很差，40万部队只有10万支能用的步枪。炮弹缺乏，一门炮只有700发炮弹。而且后勤储备、交通工具也十分短缺。奥匈军绕开塞国多瑙河和萨瓦河的天然屏障，以14万人从西部入侵。塞军鉴于此，用1/3的军队守卫北面和西面边境，将主力集结于伐列伏东部山区。

8月12日，奥匈军队开始进攻，很快获初步胜利。正当维也纳为初战之胜欢欣鼓舞的时候，塞军赶到前线，英勇作战，很快冲破奥军战线，迫其全线溃退，俘敌5万。奥匈又调集部队，再次进攻。塞军坚守阵地两个月之久，后由于弹药缺乏，放弃首都，转战内地高原山区。协约国总算没忘盟国，提供部分武器、弹药和粮食。塞军稍

事休整，10月3日进行反攻。军队为解放家园而战，士气高涨，而且人民同仇敌忾，纷纷志愿参军参战。12月15日，收复首都贝尔格莱德，19日，将奥军赶出国境，俘敌4.5万，取得反侵略的巨大胜利。

塞尔维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为1914年又增添了新的奇迹。他们英勇顽强，不畏强敌，为维护国家民族自尊、自立所表现出的无穷智慧和无畏牺牲精神为弱小国家树立了楷模。

如果确认1914年的神话，那么塞尔维亚的奇迹是最真实最生动的神话。虽然在不久以后，塞尔维亚遭受了新的、极大的痛苦，但1914年他们在世界面前所树立的尊严为强者认同，弱者崇尚。

第五章 鹿死谁手

早在190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就写道：“德国是个火药桶，所有邻邦都吓得发抖，因为它总有一天会爆炸。”20世纪初，德国人的哲学是黑格尔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为了防止内部骚乱，巩固国家内部的权力，战争不应被看做是绝对的罪恶。同时，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那就是说，通过战争可以防止一个民族由于长久的和平生活和闭关自守而腐化堕落，从而保持“各国民族的伦理健康”。因此，战争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应该的，所以，德国把战争作为一剂有益身心健康的良药。普法战争的胜利既提高了德国人的斗志，也是对战争机器的一次小小的尝试。萨拉热窝一声枪响，划过欧洲大陆本已不寂静的天空，德国认为它在这个世界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临了。马恩河的波涛

只是淹没了它速胜的梦想，这台装备精良而又冷酷无情的机器斗志不减。威廉二世是政客，他并不象小毛奇那样是个孤注一掷的军事天才，只要机器还在，他并不悲观。夕阳如血，德国人善于捕捉一种悲壮的美，在这一点上倒象个诗人。

东方巨人

1915年来临了，当枪声还在西方隐约回响的时候，德国的军事机器又轰隆隆地开向了东方。普鲁士军事鼻祖克劳塞维茨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条原则，即如果我们要通过战胜其中之一而战胜全部敌人，那么就必需以打败这个敌人作为战争的目标，因为在这个敌人身上，我们打击的是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德国人是很尊崇这个军事先知的，尤其是他的思想体系，更是珍贵的经典。战争伊始，德国把英法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但这个目标成了不软不硬的钉子，使德国人欲罢不能，欲取不得。在欧洲人眼中，俄国人是愚蠢至极、不屑一顾的。但战争伊始，沙皇尼古拉二世就趾高气扬地冲破德军防线，

深入到东普鲁士境内，使德国容克集团感到了切肤之痛。战争是英雄的世界，与小毛奇威信扫地恰成对比，东线一对珠联璧合的将帅兴登堡、鲁登道夫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干，逐渐取代了毛奇家族昔日的地位，取得德皇的赏识。正是他们坚持东线开战，先解决俄国。

避免腹背受敌，决战于一线，这是德国军事集团一贯的思想。德国人是在拿破仑铁蹄的践踏下唤起民族的自尊的。大多数德国人对拿破仑是既恨又怕，却在拿破仑的身上汲取灵感，这是自俾斯麦以来完成的一种折衷。在战略方面，德国的军事天才是拿破仑式的，因为拿破仑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也是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拿破仑的解决办法是使用速度、力量、突击，在攻击点上高度集中兵力，以便各个击破，德国人也是这样。

1915年，决战于哪一方，在核心人物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够先打垮哪一方。鲁登道夫、兴登堡认为俄国战线过长，不便于机动作战。而且俄国实力较英法弱，便于击败之，从而在协约国中打开缺口，最后迫使英法投降。战争是考虑多方面的较量，斗智、

斗勇、斗力，力即是后备资源。诸葛亮囿于粮草不足，北伐曹魏终未成功，最后客死军中，留下千古憾事。主张东线开战的论据就考虑了德国后备不足，不利于西线长期阵地防御战，而打败俄国，就可以获得必要的物质资源，争取巴尔干诸国，使其变成坚强的后方。占据德意志政治生活核心的东普鲁士容克集团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战争，扩大德国在东方的殖民地面积”，因为大洋彼岸的土地“已经瓜分完了”，“打赢了也无法得到”。可想而知，德国人把俄国及东方小国当做唾手可得的猎物。

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法根汉将军对能否做到打败俄国，结束东线的战争，战胜英法表示怀疑。谁都不会忘记19世纪杰出的英雄人物——拿破仑在西欧昂首阔步，不可一世，正是在俄国的漫天风雪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失去了生命的翅膀，从那里走向了不可逆转颓势。不过新总长还是屈服于东线双雄了。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同二战纸糊的同盟伙伴意大利一样，一战的盟友——奥匈帝国也是相当虚弱，面临俄国的重击，正迫切需要德国的援助。而失去这个伙伴，尽管它几乎不堪一击，

将会使德国陷入真正的孤军奋战的境地。虽然它怀有征服世界的雄心，也不会在这时冒这种无同盟者的风险。

东线决战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

德国人的梦想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在具体行动上并不缺少理智。1915年的计划是在东线突击进攻，在西线实施积极防御。这个计划正好对应了英法军事集团的新策略。英法，主要是法国在战战兢兢中挡住了德国疾风暴雨的冲击，但也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法国与魔鬼为邻，又处于战争的前沿，而英国只是利用其海上优势打击德国，仅派20万远征军固定比利时海岸一线，因此，几乎是英勇的法兰西儿女独立阻挡如洪水般自北向南的德军。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不仅使几十万的年轻生命抛尸荒野，而且后勤储备捉襟见肘，马恩河一役，法军每天消耗24万发炮弹，而原计划每天供应1.3万发，与之所差惊人。因此，1915年英法决定西线实行防御，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同时，派海军在达达尼尔进攻土耳其，开辟新的战场。

沙皇在一战中的表现无疑是积极而英勇的，这多半要归之于尼古拉二世刚愎自用、狂妄

自大、野心勃勃的性格。比起英法资产阶级正统的绅士风度，沙皇无疑是缺乏必要的谨慎和谦虚的。许多前苏联的历史学家认为，英法在1915年把俄国置于德军的铁蹄下而无动于衷，但俄皇的战争梦想以及德国的战争主动权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1915年，沙皇的计划仍是进攻，欧洲各国的发展状况很容易为一个地缘政治学家提供生动的借口，英、法、德、俄从西到东依次排列的几个强国发展阶段呈阶梯式下降状态，俄国是最落后的，在一般欧洲人眼里甚至认为它是一个亚洲式大国，神秘而贫弱，它缺乏德国具有的用以与英法争强的资本，它的军队装备差，统帅素质低，这在1914年的战役中已露端倪。1915年统帅部的进攻计划在争吵中达到了双方的妥协，即分兵出击，在西北、西南两线同时进攻。这就分散了兵力，竟与德军的布置相吻合。德奥决定在东线南北两面进攻，北面由东普鲁士向布列斯特，南面由德奥联军向莱姆堡方向主攻，最后将俄军主力包围在“波兰口袋”内，加以消灭。这样就形成德俄南北两个方面的两军直接冲撞，大有狭路相逢之势。德奥联军107个师，俄国108个师。

柏斯克是法国荒唐派漫画大师，还是一个军人画家，他的大部分作品取材于军旅生活，取名为《傻兵日记》，其中有一组为：一辆辆军车满载士兵驶向战场，士兵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力前冲，最后在沉寂的山谷排满了十字架。的确，战争就是如此残酷，描绘一场战争显然更需要的是一个诗人。德国这台战争机器象许许多多时代英雄一样，令人敬畏，但不受人欢迎，当它轰轰地开向东方的时候，是势在必得的。它的勇气和无畏正如它不受约束的思想那样充满了野性。

1915年2月，马祖尔湖地区的冬季异常寒冷，一米多厚的积雪在阳光下森然闪光，但这丝毫也未冷却德军将帅的战斗热情，他们严令督促部队全速前进。当俄军躲在掩体里不住的感谢“天公作美”时，平静的雪野中德军悄然而至。1月25日，俄军首先发难，打算改善一下第十集团军右翼侧的境况。它低估了拉斯杰年一带德军的兵力。到2月7日，基本无所收获。2月8日，准备就绪的日耳曼人动作了。利茨曼指挥的第八集团军和艾希霍恩的第十集团军压向西维尔斯将军的部队。俄军抵挡不住，且战且退。俄二十

军被追到奥古斯托夫森林。连续的作战，弹药和粮食得不到应有的供应，甚至起码的睡眠和休息也几乎被剥夺殆尽。2月21日，可谓一无所有的俄二十军遭全歼。幸免于难的其它各军退守格罗德诺和鲍勃尔河一线。俄军也不是随人捏扁抻长的面团，2月下旬到3月下旬，德俄双方不下10个军在普夏斯尼希一场激战，兵员较少的德军力不能敌，退守边境，俄国人也未能打入东普鲁士。

与此同时，加里西亚战线的奥军处境危急。3月22日，普热米什尔失陷，12万奥匈军投降。俄军深入奥匈领土，几乎占领了喀尔巴阡山的全部重要隘口。奥匈参谋长康拉德请求德军尽快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统帅部决定集中兵力于俄军防卫较弱的西部加里西亚，猛烈突破，打开战局。德军采用了娴熟的奇兵计策，声东击西，迷惑俄军。5月2日，德军开始进攻。在果尔利策镇，德军如同天兵降临，突然响起密集的炮火，俄军还未来得及布置，即被突破防线。俄军的指挥、调动、军需供应一片混乱，尤其是严重的“炮弹壳”使其战斗力大打折扣，前沿阵地每门炮每天只摊到一发炮弹。在这种时候，统帅部

还命令士兵进行无益的血战，不许退却，这无异于以卵击石。5月22日，德军攻下莱姆堡，战领加里西亚大部地区。果尔利策战役持续了52天，其结果是俄军的战略态势大为恶化。

这时，西线的情况使德国惴惴不安。它不能无视英法即将发动进攻的消息，不过，又不甘心放下已遭重创的俄军，立即拔腿东去。必须先战胜俄国，这就是德国人的选择。他们集结了德、奥各6个集团军，计划了3个战役，准备吃掉对手的11个集团军。

6月26日，马肯森元帅指挥对维斯瓦河和布格河一带的俄西南方面军的各集团军发动了进攻。7月13日，德国加尔维茨的集团军打响了强渡那累夫河的战斗。7月14日，里加—沙夫利战役开仗。德奥军主动进攻，占据优势，尤其是火炮的众多，弹药的充足更是致胜之利器。俄国人靠那微不足道的武装加上士兵的血肉之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还是节节败退。到8月下旬，德奥已基本形成了对俄军包围的波兰口袋。为保存实力，俄军撤离华沙。如同1812年库图佐夫的莫斯科撤退一样，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转变。尾随其后的德军乘对手上层更叠，人心浮动之机，搞

了一次“斯文茨亚内突破”行动。但是，吃掉俄军10个集团军的打算又一次破产，不过多夺得一些土地而已。

俄军是打不死的巨人。就在遭受重创之后，1915年12月，它还应盟国之请，为多少转移一点德奥对塞尔维亚的压力，西南方面军的第七集团军向科韦耳一带的德军发动了一次进攻。由于准备不充分，武器弹药的匮乏，理所当然地失败了。但这又一次表明：俄国熊是打不死的。德军也看到不可能完全歼灭俄军，遂兵力西移。1915年的作战计划即告流产。虽然战线大幅度东移，俄军伤亡、被俘达170多万人，超过了1914年西线英法的伤亡人数。但它把约150个团的德军从西线“调”到了自己这边。

1915年俄军损失惨重，战略上彻底失败。德国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实现梦想？是拿破仑的阴影，拿破仑影响欧洲大陆不止一代人。俄国就如同一片巨大的泥潭，它缺少巨大的力量攻击你，却有无限的潜力使你望而却步。当拿破仑昂首阔步走出凯旋门，纵横欧洲大陆时，他所向披靡，锐不可挡。侵略俄国却使他一败涂地，战神的翅膀在俄罗斯的广袤原野上被剪断了。当莫

斯科化为一堆灰烬时，亚历山大准备“率领可爱的贵族和善良的农民，使用我国最后的资源来打消耗战。我国的资源要比敌人想象的多得多”。漫天风雪使拿破仑迷失了方向，哥萨克不断的骚扰使他苦不堪言。当拿破仑怀着绝望的心情带领疲惫不堪死里逃生的士兵从俄国返回时，英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俄国保证了“欧洲的得救”。上帝造人时，给了人种种无与伦比的优点，也给人以种种致命的弱点。就如同中国神话中大闹三界的孙悟空，72变神通广大，却被头上的紧箍咒治得死去活来。历史在造就英雄时，给了他超过常人的智慧、毅力和绝妙的机遇，也给了他最后的克星。恺撒之于埃及，亚历山大之于小亚细亚，拿破仑、威廉二世及希特勒之于俄国……那里成为他们不可逾越的一座大山。欧洲人把俄国称为“东方巨人”，也正表达了“英雄们”既惊又怕的绝望心理。横亘欧洲、亚洲的俄国成了战争机器唯一不能摧毁的怪兽。它以血的代价又一次挽救了英雄辈出、多灾多难的欧洲大陆。战争机器在东方巨人面前停滞不前，仿佛失去了锐利无比的巨齿。

巨人依然屹立，却又创痕累累。它之为巨人，并不在于它的优秀，而在于它的硕大无朋，造物主尚未造就吞噬这大巨大怪兽的生灵。面对灾难性的失败，俄国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推诿责任。代表思想较活跃的人们，似乎多少有些作为的尼古拉大公被撤销最高统帅职务，毫无军事才能的沙皇穿上军服，执起最高统帅的权杖。

1915年，俄国先后放弃波兰、立陶宛、里加以西的土地和沃伦地区。9月下旬，东线从里加湾到德涅斯特河基本形成一条直线，战事趋于平稳。

俄国只是本年度德国人的一个主攻目标，德国仍有近一半的兵力在西线与英法对垒。

1915年春意料峭，西线从佛兰德到瑞士边境，漫长的战线上，双方都在为巩固防御阵地而努力。在对峙的营垒后面，德军方面有190多万军队，近6000门轻重火炮。协约国方面聚集了260多万将士，基本相同数量的大炮。面对德军占据的距首都巴黎不足百公里的努瓦荣突出部，法国人深感它是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为拔掉这个钉子，并为将来总进攻创造条件，协约国发动了春季攻势。

2月16日~3月17日，法第四集团军对香巴尼发动进攻。4月5日~17日，法第一集团军在圣米耶尔再次组织进攻。由于估计不足，准备不够，仓促动作，法军伤亡严重，收效甚微。

科学的遗憾

工业近现代化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步入了现代战争的轨道，科学技术与战争紧密结合。现代战争的特点在于军事科学技术的作用日渐显著，战场上拼搏的不仅仅是一兵一卒，而是人们智能的较量。战争对人类的威胁扩大了，少数几个拥有新式武器的人主宰着芸芸众生的命运，人们时刻在人类将毁于一旦的恐惧中颤栗不安。

战争的残酷性使交战双方不择手段，而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就很自然地被架上了战车。1915年德军为了在西线实行积极防御，掩护部队东调，决定消除防御战的突出部（也恰恰是英法联军的接合部）。4月底，德国发动伊普雷战役，有效地采用毒气这种极不人道的武器。在此之前，德军曾于1915年初对东线的俄国人尝试

性地使用了催泪瓦斯弹。因为气温、风向等原因，那次并没有发挥作用，以致俄军根本没有注意到其存在，也未将这一信息知会英法盟友。德国人经过研究改进，送上西线，要借助它夺取胜利了。这个地域地势平坦，常刮西北风，是使用毒气的绝好场所。几天之内，为实施攻击而建立的特种化学分队利用夜间在6公里宽的地面上安放了150组毒气罐。4月22日下午5时，德军利用顺风对英军第五军的阵地施放18万公斤氯。毒气放了5分钟，一人高的黄绿色浓烟向英军阵地滚滚而来，渗到掩体、掩蔽部和掩蔽工事里。当第一阵浓烟笼罩整个地面，人们闷得喘不过气，拼命挣扎时，最初的感觉是吃惊，随之便是恐惧，最后军队中一片混乱。还能行动的人拔腿逃跑，试图跑在径直向他们扑来的氯气前面，但多数人是徒劳的。德军脸上缠着纱布绷带，以靠拢式队形尾随其后。英军15000人受到氯气毒害，其中5000人死亡。宽10公里，纵深7公里的地带，实际上已无人防守。德国人也没有料到它有这么大作用，没有充足的预备队，无法将已取得的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英法匆忙运来大批军队，堵住缺口，并配备最简单的防毒气器

具，教会士兵如何对付毒气。德军的进攻持续20天，付出巨大人员伤亡，也没能实现占领伊泽尔运河一带的预期任务。

德军在战争史上首次有效使用毒气，成为各交战国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先声。为了迅速查清德国化学武器的生产秘密，掌握其发展动态，协约国派出间谍潜入德国，其中有法国间谍夏尔·卢齐托。他接近克鲁伯工厂，混迹于工人出入的酒吧，他还和一个工厂警卫交朋友。在这个警卫帮助下，他得以混入毒气弹试验靶场。他出生入死获得了毒气生产秘密。因此，协约国超越阶段，仿制出新式毒气弹，并为部队配备了相应的防毒器具。在业已开始的毒气战过程中，各国不断使用新的致死性化学物质，同时也使军队的防毒设备有了发展。1915年，最简单的纱布口罩已被防毒面具所代替。俄国化学家H·杰林斯基发明的防毒面具，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

为回击德军的伊普雷进攻，也为了策应东线俄军，英法布置了阿图瓦战役。5月3日起连续6天的炮火破坏性射击，摧毁了德第一道阵地的防御工事。5月9日，法第十集团军，英第一集团军分别发起进攻。德军调兵遣将，构筑新的阵

地，拼命防堵。战役进行一个半月，英法夺回土地一共不到30平方公里，双方伤亡20多万。

协约国不甘放弃德军在西线采取守势这个时机，也为了安抚正在东线孤军苦战的俄国人，使其不致萌生二心，于1915年秋季再次计划实施香巴尼和阿图瓦两大战役。他们的目标是实现“战略大突破并解放法国国土”，并做了相应的准备。

在狂轰滥炸几昼夜之后，9月25日，法军两个集团军发起香巴尼攻势。同日，英法各一个集团军在阿图瓦也开始进攻了。炮火准备发挥了一定作用，协约国占领对手第一阵地比较顺利，但在第二阵地面前就难于前进了。20天后，战斗陆续停止，进展微乎其微。

协约国动用先进技术加强了战斗力。出动飞艇、飞机轰炸德重要目标；用气球和校正飞机通过无线电调正火炮弹着点；使用声测等仪器测定敌方火炮位置；双方都使用了化学毒气弹和燃烧弹。一战只是现代工业战争的开端。1915年在西线虽使用的化学武器只是一个尝试，还很不完备，但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却已暴露无遗。双方攻防并未有任何突破，死伤却十分惊人，联

军157万，德军61万，在凡尔登到海边的狭长地带有多少死者的灵魂！

科学技术与战争的关系很难用一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但二者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则是不言而喻的。战争催化科学技术新成果的出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了谁赢得战争。当人类有了私有制，人们之间便有了冲突，而战争是解决冲突的一条途径。远古时代，在旷野上，人们较量力、勇、谋，使用最原始的手制武器，与野兽的撕斗相去不远。火药的发明，尤其是机械的发展、枪炮的出现，给战斗者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武器，也使杀伤力惊人地增长，科学技术发明愈发与战争密不可分。新式武器在战争中的快速应用，为使用者争得了绝对的主动权。以长矛大刀对抗洋枪洋炮是中国近代遭受外国侵略、割地赔款、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直接原因。看到一幕幕英勇的清军义士手挥大刀，在战场上成了洋人的枪靶子的场面，我们切肤地感到武器的重要性。与此相同，当欧洲人踏上新大陆，在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中轻而易举地把这块大陆的主人逼进茫茫丛林，使其失去天堂、失去家园。他们依靠的是先进的武器。而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是美国的原子弹给轴心国以致命一击。希特勒的重大失策就包括把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尤其是犹太人包括爱因斯坦等推进美国的怀抱，从而也就把最先进武器——原子弹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了罗斯福。

科学技术在人类战争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上帝，还是魔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回答：它既是魔鬼，也是上帝。说它是魔鬼，是因为它使战争不断升级，许多科学家呕心沥血、奋斗一生的成果被战争狂徒用于战争，成了杀伤人类的武器。瑞典伟大的科学家诺贝尔穷其一生，历尽艰险，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发明了炸药。他原希望将其用于工业，造福于人类。但炸药很快被用于战争，加重了战争的灾难和人类的痛苦。这使他非常愤慨，他说他将发明一种更有力的武器，“如果有一天，两方军队能在一秒钟内彼此消灭，一切进步的国家将会恐怖地退出战争”。核武器的发明实现了诺贝尔的“理想”，但它也把人类抛入将毁于一旦的恐怖的深渊。人类比以前更加害怕战争。许多科学家在研究新技术的同时，孜孜不倦地从事和平事业，以减轻科学进步带给人类的灾难。科学是文

明的标志，它一方面给人带来不幸，又赋予人新的希望。现代战争的残酷性迫使每一个人都把它看做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人们按下战争之钮的手已不再那么随意。在现代社会，战争已不局限于以往那种战场上士兵的面对面较量，而发展成军事技术的较量。人类从野蛮的厮杀转而为智力的较量，文明似乎迈进了。当代战场上搏斗声、撕杀声让位于电波的传播、机械的轰鸣，战争进入更微妙、更复杂的文明状态。所以科学技术也可以说是上帝。但上帝并不完美，现代战争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科学的遗憾远未消除，人类在恐惧中正在寻求希望。

不贞的妻子

战争是私欲和贪婪的温床。欧洲在历史上虽然有大大小小的纷争，由于处于同一地理环境中，相差无几的生活习俗以及水乳交融的语言和种族，拥有一个共同的上帝——耶稣，共同的信仰，使其在中世纪形成由教皇执掌的一统，加上各国皇室之间的联姻，使人们很容易把它看做一个整体。但到了近现代，在这块沟通多于

隔阂的大陆上，却发生了一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硝烟笼罩了天空，炮火不时划过暗夜，每一个欧洲人的脑海中只有“战争”二字。渴望战争带来稳定和繁荣，在惴惴不安的恐惧中，内心又按捺不住一股希望的冲动。在这场大混乱中，主要交战国谋取的是霸权，而其它小国希望不失时机地分得一杯香羹。太阳照耀每一个人，不论大小强弱，人人都有美好的幻想。

北欧的瑞典、挪威和丹麦，西欧的荷兰和瑞士，南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同这次大战较少利害关系，远离交战双方争夺的中心，均宣布局外中立。它们不愿冒战争风险，但也不愿放弃在战争中获取经济利益。而交战国出于种种原因，或者需要市场，或者借作间谍的孔道……纷纷要求维护它们的中立。那些同战争有直接利害的国家，如意、土、希、罗、保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交战双方之间待价而沽，伺机而动。交战国为了打击对手，扩大阵营，则极尽拉拢之能事，给予种种许诺。意大利是其中较大较强的国家，它地处地中海，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拥有同法国相当的人力，一支不算小的陆海军，是交战双方首先争取的对象。

意大利不象二战中表现得那样富有勇气。这个具有浪漫气息的国度此时还未找到多少与德国的共同语言。它原是德奥的同盟者，但战前它即有了首鼠两端的倾向，一方面是由于它对法国经济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则由于与奥匈的矛盾。所以大战爆发后，它不仅未遵约开战，而是在第三天宣布中立。对于意大利来说，身在同盟，未履承诺，就是对同盟的背叛。德国宰相比洛讥讽意大利是“不贞的妻子”。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被喻为不贞的妻子该是再尖刻不过的了。

这个“妻子”是怎样脚踏两只船，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外交讹诈的？意大利所寻求的是既可能成为战胜又愿意给它开高价的一方，在决定“卿归何处”的时候，它一点儿也没有浪漫色彩，不过表演却是很精彩。

公布“中立宣言”只是宣告自己在待价而沽。意大利一方面秘密传话给德国，如能满足其领土要求，它还是同盟的忠实伙伴；另一方面又向协约国献媚，进行共同对奥匈作战的秘密谈判。大战开始，德国势如破竹，很快突破法国，深入腹地，法军不停后退。意大利马上见风使舵。

中止同协约国的谈判。随着史里芬计划的破产，前线呈胶着状态，意大利又执起了协约国的手。

意大利一方面毫无远见地静观战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搞私下交易。由于意大利最渴望的领土正是奥匈所占据的土地和势力范围，如特兰提诺、蒂罗尔、达尔马提亚、的里雅斯特等。它认为“很难从德奥方面获得所期望的东西”。但它以同德奥恢复谈判来对协约国施加压力。协约国方面也确实希望意大利尽快跳上自己的战车，于是慷他人之慨，同意它的要求。德奥方面很难同意意大利做领土交易，但又不肯轻易放弃它。它们先是把法国的科西嘉、尼斯、萨伏依丁等地作为投向意大利的诱饵，未能奏效。随着前线的形势日益严峻，德国又迫使奥匈让步，将王室领土的一部分割爱，作为意大利信守“中立”的报酬。

但此时的意大利在双方的极力争夺下，胃口越来越大。它对北非的扩张，同德国也产生矛盾，同时要求土耳其的某些领地也不是德奥所能满足的。于是1915年4月26日，意同英法俄签订秘密伦敦条约，答应参加协约国作战，签字一个月后对奥匈宣战，英国还给它5000万英镑贷

款，作为它参战的费用。但到1916年8月前线形势明朗时，才正式对德国宣战。列宁说，“意大利资产阶级因为能够参加分赃而眉飞色舞”。

5月底，意军对奥匈军队发动进攻，小有进展。6月、7月、10月、11月意军4次以优势兵力进攻奥军坚守的伊索河一带防御工事。意大利人战斗力极弱，重炮和弹药不足，战术技术也有问题，不仅未获什么重大成果，反而损失近30万人。但它缓解了协约国的压力。以后，意奥战线也转入阵地战。

塞尔维亚被抛弃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巴尔干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而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场所，这就注定巴尔干各国必是罪人，不是同盟国的罪人，就是协约国的罪人。其中命运最惨的就是塞尔维亚人。在德奥集团日益孤立的情况下，德国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必须粉碎塞尔维亚这个妨碍它与土耳其联系的小国。而争取保加利亚是一重要的关键，保加利亚拥有一支较强大的陆军，且地理位置重要，它倒向何方，将对巴尔干战局产生重

大影响：参加同盟国，将使塞尔维亚腹背受敌；参加协约国，将使塞尔维亚无后顾之忧。保加利亚统治阶层有明显的亲德倾向，这不仅源于经济上对德国的依赖，同时德国在争取保加利亚的问题上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它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塞尔维亚的马其顿地区许诺给保加利亚，而这一地区正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保被迫割让出来的。德国的这一许诺燃起了保加利亚的复仇烈火。

协约国方面的俄国对巴尔干地区十分热心，为了争取保加利亚，它要求塞尔维亚做出领土让步。但这一要求遭到塞尔维亚的断然拒绝。

从几个青年刺杀奥匈王储进而引起一场大战的时候起，塞尔维亚就勇敢地面对现实，把几十倍于己的奥匈军队挡在国门之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谱写了一曲真正辉煌的战歌。现在保加利亚将倒向德国的时候，塞尔维亚面临前后夹攻、被敌围歼的危险。统帅部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它打算依靠江河山川之险为屏障以较少的军队保卫正面北段，而将主力集中，乘保加利亚还处于动员阶段出其不意将其歼灭，迫其投降，然后回师将全部兵力投入对德奥作战。这

一计划虽具很大风险，却有一定的可行性，是塞尔维亚解决自己困难的最好办法，但协约国以拉拢保加利亚为由，强迫塞放弃这一计划，从而失去了一次绝好战机。

1915年10月6日，德奥突然发动对塞尔维亚的进攻，8天后，保加利亚未经宣战就向塞发动进攻。此时，塞尔维亚还没有制订出相应的具体行动计划，25万人、678门大炮在650公里的正面平均摊开。协约国在对待塞国的问题上缺乏必要的主动，任由德奥施行军事布置。到1915年10月1日，德奥对塞开战的前几天，协约国才决定派兵援助，俄国因罗马尼亚不借道而无法派兵，英国不愿削弱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兵力，法国也反对抽调它在西线的兵员，这样，几乎是塞尔维亚在独自对付强大的敌人。连英国劳合·乔治都不得不承认，“塞尔维亚的盟国违背了及时给予援助的庄严诺言，把塞尔维亚抛弃了”。

抵抗在进行，而且是十分英勇十分顽强地抵抗着，但由于力量悬殊，大部分国土被同盟国军占领。1916年在希腊科孚岛组成塞流亡政府。但德国合围消灭塞军的企图并未实现，塞仍有12万军队，1916年5月编入萨洛尼卡远征军，在

解放祖国的战斗中发挥重大作用。

1915年交战双方都有一些重大行动。德奥在东方巨人面前受阻，虽有重大突破，但东线仍维持着阵地战。英国达达尼尔海上行动的失败，使协约国企图在巴尔干打开缺口，从而赢得战略主动的梦想也幻灭了。塞尔维亚失陷，德奥打通了与土耳其的联系，但意大利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奥匈又形成有力的牵制。所以，1915年仍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前景，鹿死谁手，仍不得而知。双方都认识到自己所期待的胜利还是遥遥无期的。劳合·乔治回答合众社记者关于何时可能结束战争的问题时说：“英国军队既无钟表，也无日历，”“英国曾需要20年的时间来战胜拿破仑……在这一场战争中，需要多久，战争就进行多久。”

第六章 柳暗花明

1916年是一战史上关键的一年，同盟国军在凡尔登城下的重创，松姆河畔的恐怖，加里西亚的重大损失以及希腊、罗马尼亚纷纷倒向协约国一方……使人们拨开云雾，柳暗花明，谁将赢得这场战争已不是个未知数。

谁执牛耳

当俄国那令人敬畏的“压路机”被德军打得千疮百孔，望风披靡，后退二、三百里的时候，当100多万的斯拉夫人血洒疆场，暴尸荒野的时候，当粗鲁的沙皇暴跳如雷，披甲上马准备亲自挽救颓势的时候，英国的劳合一乔治公开宣称“让俄国听凭上帝的安排吧”，这就是协约国所孜孜以求的协约。

战争初期是谁执战争这个恶魔之牛耳，是谁把战争的狂飙刮到西线，又从西线带到东线，是谁迫使欧洲东方、西方的人们心惊胆寒地固城擦枪？那只能是精悍的日耳曼人。他们那咄咄逼人、自信自傲、势在必得的气魄曾使欧洲苍生不寒而栗。只有德国人在出征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似乎世界就在脚下。

德国式的自傲来自它那多姿多彩和多灾多难的历史。我们从落满尘埃的历史中去搜寻其民族意识症结，很容易发现它那强悍的表面背后悲观绝望却又不甘沉寂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不仅仅折磨了它一代人。“德国哲学思想中许多仿佛奇特的东西，反映出一个由于历史的偶然事件而被剥夺了它那份具有广泛影响的精悍民族的心境”。自宗教改革以后，这个曾经以出现查理大帝、腓特烈大帝而显赫一时的国度，由于内部纷争和绵延不断的战争，靠教皇神谕建立起的神圣罗马帝国很快变得名存实亡，代之以依靠邻国生存的许多小国。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远较英、法缓慢，到19世纪初，当英国和法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迅速发展时，德国依然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

的封建国家。因此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似乎是受西欧资本主义熏陶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在德国资产阶级身上明显地表现了更加生动的两重性，一方面它屈服于封建专制，另一方面又受法国大革命的感召。这种现象使它耽于幻想，怯于实践，注重内心的生活更甚于对外界的渴求。“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在精神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成果。歌德说人都是“一半靠别人思想，一半靠自己思想来生活”。而对一个民族则一半靠历史，一半在现实中寻找。德国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在其思想意识中形成了悲观绝望和自傲自大相混合的曲扭的心理。18世纪，只有一个德意志国家——普鲁士抵抗法国人获得了成功，最后俾斯麦促使德国实现在普鲁士下的统一，使德意志民族在唤起自尊的同时也接受了普鲁士的文化影响。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普鲁士并不象西部工业区那样深受法国文化的感染，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使德意志民族文化里国际主义精神较淡的成份获得了胜利。

概括地说，19世纪及其以后的生活远较以

前复杂。新科学的出现，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的发展，涌现了新思想。传统体系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出现了深沉的反抗，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出现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方式，德国永远比其它国家更容易感受浪漫主义。这种反抗的倾向是牺牲理智、强调意志，耐不住理性的束缚，颂扬某些类型的暴力。我们在拜伦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那是裹在非哲学的外衣下。在叔本华和尼采的作品里，它学会了哲学用语，事实上，正是在它们中间，德国统治阶级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生活准则。

许多欧洲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似乎都与拿破仑有着很深的渊源。许多人怀着惧怕和憎恨的感情却又从这个近代“恺撒身上学到了许多对生存更有益的事情，那就是把自己的意愿以暴力的形式强加在别人头上，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近现代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在撕毁中世纪掩盖残忍和罪恶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达尔文穷毕生精力，在澳洲那荒凉的土地上得出的关于生物界生存竞争理论堪称一种伟大的革命。无疑，它反映了自然界严酷的一面，在某些哲人看来，它关于世

界万物的解释似乎也同样应用于人类，是人的智慧所能完全达到的理解。适者生存不仅是生物进化的过程，也是人类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必由之路。因此，热衷于弱肉强食，强权即真理的战争在近现代文明之乡——欧洲人的思想上并不算做耸人听闻，而是顺理成章，听之“耳顺”了。崇拜浪漫主义、对现状充满了强烈不满、内心膨胀了种种关于未来的欲望的德国在这种思想的温床上很快成长起来。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它甚至藏起对拿破仑铁蹄践踏所引起的恼怒，而从这个民族仇敌身上汲取了足够的营养。德国是这个时代叫嚷战争最强烈的国家，从它那歇斯底里的呐喊声中我们窥到了它几代的挣扎、几代的不满以及现时的自尊渴望。唤起民族的自信和觉醒，从而在它那深奥隐晦的哲学中提出了唯我意志的观点。德意志民族是优等民族，它将领导世界的口号经几代哲学巨匠的润色成为千古“绝唱”。它迎合了落后民族耳闻目睹邻居的海市蜃楼所引起的狂热。普法战争后，德国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法国，虽为战胜国反而惴惴不安，面对法国日益高涨的复仇主义，德国人的恐惧感与日俱增，如同尼采所说

的“高贵人”一样，恐惧迫使他变成一个完全缺乏同情的人，无情、狡猾、残忍，只关心自己的权力。象李尔王在临发疯前所说：“我定要做那种事——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但它将成为全世界的恐怖。”这是德国人发自内心的呼喊，是一种急欲摆脱恐惧和自卑的绝望表现。这就是战争登上历史舞台的楔机。因此德国哲学中提倡战争更甚于提倡对基督的信仰。战争是摆脱现状，战争是求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

拿破仑的壮举使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认识到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战争是人类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也是其手段。在德国，从拿破仑身上学到的东西甚于在法国，法国人拾到更多的是自豪和骄傲。正是从此时起，普鲁士的军事学说鹊称世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作为这一成果的奠基人，把军事科学化、哲学化、艺术化，开德国跻身军事强国之先声，由此开始的普鲁士政治生活也日渐抬头。俾斯麦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记载在德国崛起的里程碑上，使普鲁士军事和普鲁士政治成为一专有名词并为世界上许多野心勃勃的人所推崇和景仰。因此德国在20世纪的崛起是有着深刻的基础的。这基础也是一些

狂人意欲征服世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

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民族在它实现自己野心的实践中显然占据足够的优势。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及战争初期德国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它不仅决定了战争的进程，对协约国集团有很大的制约，而且在同盟国内部也占据绝对领导地位，奥匈、土耳其等小国只是其身后的仆从，在军事行动时从属于德国，德国是同盟之长。科班出身的德军将领，在领导战争的问题上也并不因统帅的易职而改变其军事思想，普鲁士军事院校的学生们在处理问题上有着惊人的共同点。因此小毛奇被撤换总司令职务以及兴登堡、鲁登道夫受到德皇的青睐，并不影响德国军事机器正常的运转以及操作程序。这是协约国在战初惨重遭遇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协约国既缺乏德国人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具体军事行动上又缺乏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目的在于保住已有的果实，抑制或削弱德国，它的动机是被动的，就连靠生命的冲动鼓舞的法国人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也是针对德国的进攻而实行的防御性进攻。而且英法俄之间由于利益所在引

起的矛盾冲突也不时干扰协约国之间的正常协调。英国历来奉行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拖入战争“绞肉机”，而自己凭借英吉利海峡的天然“护城河”作有节制的伸缩这一政策。它把注意力放在强大的海军上，保住其海上生命线才是其根本利益，对欧洲大陆上的战事不想太过介入，所以仅派20万的远征军逡巡在比利时海岸一隅，时刻准备“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正是英国迟迟不肯把联军指挥权交给霞飞总司令以便协调行动的原因。法国是德国的宿敌，它的坚强不屈正是协约国一把致敌于死命的利剑，但国家安危所系，它也不愿在解决东线压力的问题上做任何实质性的努力，抽调一兵一卒的实力就意味着防卫巴黎的铜墙铁壁可能出现些许的松动。欧洲的孤家寡人俄国只是英法设下的对付德国的一块诱饵，它的牺牲精神令人钦佩，但由于实力所限，并不能扭转乾坤。

法国永远是对遭受德国威胁最敏感、反映最强烈的国家。战初的惨败虽经马恩河的英勇献身而趋于稳定，但西北富庶地区沦陷、巴黎成为战争前沿使它有理由比任何国家更容易感受失败的痛苦。而且俄国经过1915年的重创，大伤

元气，与德媾和之风日盛，引起英法恐慌。为了打开战争新局面，也为了死死拖住俄国，1915年7月7日由霞飞总司令倡议，在法国尚蒂伊召开了联盟会议，决议“对协约国中遭到敌人主要攻击的任何一国军队给予支援”。虽然这次会议并未实现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联盟的设想，各国也未严格遵循已达成的协议，但毕竟取得一种共识：寻求战争的胜利不应限于一个战争区，而应在西方、东方、巴尔干三个主要战争区共同谋求。为以后的行动制定了一个大致的统一时间表，正是这次会议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丰碑——凡尔登战役的基础。松姆河战役的主动进攻以及德国“和平”方案的流产……都不能不说是“尚蒂伊会议”的直接或间接结果。

起初，人们都认为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而对军火的消耗也大大地估计不足，尤其是协约各国持这种观点的人更多。德国要发动一场战争蓄谋已久，在精心经营军事的同时，也在物资保障方面做了必要的准备。以生产和研制军事装备和武器为目的的克虏伯工厂在德国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它生产的420毫米口径

大炮经过不断完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德国的铁路效率堪称世界之冠。小毛奇敢于在东西线两路出击，就是依靠这支生命线的快速转运。在两次战役的不长间歇时间中，完成了兵力千里大调运。在德国开赴比利时的普通士兵身上，配备了各种各样的战斗所需物品，包括枪支、弹药、背包、水壶、备用皮靴、挖壕工具、小刀、应急口粮、针线、绷带、橡皮膏、火柴、巧克力、烟草等，足见其准备之充分。德国的经济是最早转入战争轨道的，在头两年里它基本保持了对协约国在武器装备方面的领先地位。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严厉的海上封锁给同盟国带来严重威胁。德奥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对手实行“消耗”战的可怕。国土人口有限，人力、物力资源趋向枯竭，兵员紧张，劳力不足，某些原料食粮短缺，同海外殖民地和国外市场的联系又被掐断……灰暗的境况使得德奥不得不于本年初采取定量供应措施，对食品和一些工业产品实行配给。这些做法的消极影响可想而知，难免不动摇人心、军心，它将逐渐消蚀德奥的军事机器。

哲学思想的差异，民族底蕴的不同，高举自

由、民主大旗的法英虽然可以把黎民拉上战车，但国家政体不允许它把开战做到万事俱备。战争初期，协约国的后勤供应显然远不能满足要求，连起码的弹药都无法保障供应。而俄国更是仓促上阵，通讯、交通等皆与一场大战的要求相去甚远。

大战进入第二年，协约诸国逐步将经济转向战时体制。它们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尤其是俄国，它一浪接一浪的人海波涛，永无穷尽，以格雷的话说：“俄国的资源非常富足，就是我们不去支援，时间一长，德国也会山穷水尽。”无尽的资源使俄国具有了神奇的恢复能力。它们还有幅员辽阔的海外殖民地，粮食矿产、原材料资源较为丰富。经过一年的努力，走上战时轨道的英法工业生产大量武器弹药，基本消除了与德国的差距。法国的步枪生产增加50%，火炮增加48倍，子弹增加近50倍。同时期内，英国的机枪生产增加4倍多，飞机增加9倍以上。它们还发展了化学毒剂和防毒器材的生产。1915年下半年，法国工厂一昼夜可生产毒气弹6000枚，制造的防毒面具足以保证军队的全部需要。俄国工业落后些，但经过改组经济，加强压榨，武器

生产也大为改观。同期内，步枪生产增加2倍，火炮增加3至7倍，各种弹药增加1.5~4倍。加上美国所提供的军用物资，协约国的物质技术基础超过了同盟国。经济实力较强的一方将要把握战争的命运了。

不朽的凡尔登

不论战争双方怀着怎样的心理走上战场，战争的车轮仍在不停地运转。随着1916年的来临，双方又准备开始新的较量。拿破仑的阴影使重创了俄军的德军止步不前，反而后撤，又把枪口回转，在西线决战。英国是德国的主要敌人，但远隔大海，徒唤奈何。法国是美国的主要伙伴，又是西线主力，因此德军统帅部认为，法军已经衰弱，再给予重创，必然崩溃，就剪除了英国的羽翼。

而要打垮法国这样一个业已森严壁垒的对手，则意味着打破防御，摧毁其要塞。在漫漫几千里战线的诸多要塞中选择其一，是很重要的问题。德国人选择了凡尔登。因为法根汉认为凡尔登是这样一个目标：“法军统帅部为了保卫

它，将不得不牺牲最后一人。”

凡尔登是法国的著名要塞，它的名字在法国历史上几次出现，同法国的许多重大事件有牵连。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通往巴黎的门户和法军阵线的枢纽，它的突破与否与西线战局有着直接影响。也可以说它对西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军选择这里又一次体现了它企图毕其全力于一役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军事指导思想。因此，德统帅部对这次进攻十分重视，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为出其不意，部队和炮兵的集中与展开，构筑出发地域的工程作业，准备供给基地，通讯枢纽部署和积聚炮兵弹药等等，都是千方百计隐蔽进行的。为了突破要塞而必需的炮兵的展开特别经心。因此，德军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对法军占据绝对的优势。

沉着冷静的霞飞总司令直至2月21日还认为，德军举行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地段不是凡尔登，而是香巴尼，在凡尔登地段只会进行一些次要的攻击。由于在大战初期，一些重大要塞迅速失陷，军事官员们认为永备筑城工事不是那么可靠的，而要同野战型筑垒相结合，构成全新的防御体系。加之进攻战需要重炮，1915年8月，霞

飞总司令下令废弃要塞炮台，拆除火炮，代之以战壕、掩护体、土木障碍和铁丝网等野战工事，守备部队抽调用于加强野战部队。当时凡尔登兵力只有10万人，270门大炮，而德军用于进攻的部队有27万人，1000门大炮，由皇太子亲自统帅德军精锐部队。德军打算用威力强大的炮火摧毁法军的筑垒，以急速攻击夺取凡尔登。在战斗爆发的前几天，法军得到情报，表明德军将在凡尔登有一次大的行动，但霞飞未予足够的重视。凡尔登的新防御体系远未建成，情况对德国人极为有利。幸而天道不汛，在原定攻击凡尔登的2月12日前后，连续多日雨、雪、雾轮流当值。攻击日一延再延。2月11日到2月16日几天内，法国人将步兵6个师和6个炮兵团调来加强防御，不无补益。

1916年2月21日，法军筑垒地域的整个防御纵深突然遭到15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的猛烈火力杀伤。贝当说：“德军试图造成一个任何部队都无法坚守的死亡区。钢铁碎片、榴弹片和毒气向我们所在的树林、沟谷、塹壕和掩蔽部铺天盖地袭来，简直是在消灭一切。”德军步兵师在后面推进。虽进展缓慢，但法军阵线被切成几段，

并且失去与后方的交通联系，法军处于明显劣势，凡尔登即将不保。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卡斯特尔诺将军代表霞飞，口传军令，“不惜任何代价将敌人拦阻”。在马斯河右岸，总预备队紧急调援，第二十军从行进间投入战斗；任命亨利·菲利普·贝当为凡尔登地区司令官。

贝当给前线部队划定了一条督战线，要求士兵用一切手段顶住德军，不许退过此线。同时组织运输队，调集3900辆汽车，依靠一条二等小路，在一周内运来19万援军和2.5万吨军火物资。据当时人统计，每昼夜有6000辆汽车到达凡尔登，平均每14秒有一辆汽车通过，法国人称它为“圣路”。它保证了物资弹药的供应，保证了生力军的增援更换。

战斗双方对这次战役都十分重视，双方反复冲杀，彼此伤亡惨重。这里成了新式武器的试验场，新式毒剂弹、喷火器、轻机枪、超重火炮……轮番登场。德军的几次大规模进攻，都未达到目的。6月7日，德军发起第三次进攻高潮，德皇甚至下达了6月15日前占领凡尔登的命令。德军组建起强击队，在重炮和空军的支援下疯狂

地冲锋。21日又使出新式闪光窒息弹。他们离目的地近了，近了，仿佛马上就可以踏进法军阵地。

贝当失去了信心，秘密地准备撤退。只是由于霞飞的坚定，士兵的勇敢，敌人在松姆河等战役的牵制下，不得不减弱了攻势。凡尔登守住了，贝当非但没出丑，反而成为英雄。不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失去了幸运之神的垂青，不光彩地归顺了德国人，做了几年“儿皇帝”。

8月战役的主动权转归法军，短促突击，反攻，夺回阵地。到12月份基本恢复了战役前状况。

凡尔登战役使德军的计划又一次落空，而且损失惨重，大伤元气。8月末，法根汉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兴登堡取而代之。不过，德奥集团企图赢得战争胜利的梦想在凡尔登城下破灭了，从此同盟国集团再也未制定出如此有决定性意义的计划，也再不能组织起此类强大的进攻。从此，德国对这次大战完全丧失了出征时的信心和勇气。

与此同时，法兰西民族的冲动又一次挽救了法国，以柏格森的话说“是圣女贞德”又一次

把法国从死亡的边缘夺了回来。凡尔登城下法兰西儿女的英勇献身精神正是那玄妙的意志的再现。从此，在凡尔登的城墙上又树立起一道可歌可泣的历史丰碑。就是经过这次战役，胜利女神对协约国集团绽开了她那迷人的微笑，饱尝战乱之苦的欧洲人民看到了和平稳定安宁的理想彼岸。因此，凡尔登之役被史家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但是，曙光在前，道路还很遥远。

根据1916年3月尚蒂伊会议决定了的如期开始的松姆河战役不仅策应了保卫凡尔登的勇敢、刚毅的法兰西儿女，还将神武的新式武器呈现于世人面前。

战斗大象

战争不仅是军事家们各展宏图大志的良机，也是新式武器大显神威的场所。在松姆河战役中首次使用了战争大象——坦克。

年初，英法商定在松姆河两岸发动大规模进攻，从防御到进攻实行战略转变。原计划由法军担任主力，由于凡尔登德军先发制人的进攻

打乱了联军的部署，法军自顾不暇，只好由英军担任主攻。英法用5个多月的时间对这一战役进行极为周密的准备。他们修造机场、桥梁、公路、铁路，提高了交通运输水平；构筑工事、仓库，改善了士兵掩蔽和物资储放条件；进行广泛的战术演练，配备新式兵器……

6月24日，大炮发言，震天动地。连续7天的炮火准备严重破坏了对手的防御设施。法根汉承认：“前面的障碍物全部消失，大部分掩体被夷为平地，只有极少数特别牢固的工事经受住了猛烈的炮击。”7月1日晨，英、法步兵分别在松姆河南北岸发动进攻。英军行动迟缓，队形密集，伤亡严重，进展甚微。法军行动突然，战术灵活，很快夺下一些村庄和堡垒，并打退了敌人的一系列反冲击。但在逐步行动的理论指导下，法军停下来调集炮兵，巩固占领区。德军不失时机地调兵遣将，封住了缺口。英法兵力优势逐渐下降，双方对峙，很快成为一场消耗战。

战役进行4个月之久，一系列的攻击只带来无法想象的损失和微不足道的成果。在9月15日英军的大规模进攻中，首次使用了32辆新发明的坦克。

坦克是英文 tank 的音译，原意为“箱子”或“水箱”。它是一种履带式装甲车，集火力、机动力和防护力于一体，是矛与盾的现代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都有尝试，尤以俄国的瓦·德·门捷列夫1911年设计的“陆地装甲战舰”最为杰出，重170吨，长13米，上有炮塔，下有履带，颇象今天的坦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新式武器的发明和实践提供了良好机会，同时也使研制新式武器的热潮应运而生。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双方进入防御线，以铁丝网、战壕和碉堡构筑的防御工事很难突破，几十万士兵的生命就丧失在这纵深防御面前，战争陷入僵持局面，寻求一种积极有效的突破防御新技术新武器，势在必行。英国首当其冲，这要感谢传奇人物丘吉尔，在许多文艺作品中称他为“坦克之父”，此种说法虽不尽然，但“由于丘吉尔的敏锐、勇敢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1914年，前线的丘吉尔即组织生产一种名叫“陆地主力舰”的新式武器，寓意该武器如同在海洋中游弋的巡洋舰一样庞大，一样坚不可摧，威力无比。它是未来坦克的雏型。1915年9月，第一辆试验成功，它采用履带

式拖拉机的底盘，以内燃发动机为动力，以机枪为武器。

松姆河战役中使用的坦克就是在此基础上稍加改进。英军出动了49辆，这种坦克很不完善，时速5.5公里，车内温度很高，驾驶员缺乏训练，结果在开赴前线途中，有的陷入泥泞，有的发生机械故障，只剩下32辆到达攻击出发位置，而这32辆中也只有18辆真正参加战斗。

9月15日上午，18辆坦克发出隆隆巨响，在前沿阵地发起攻击。这些钢铁怪物的出现，使德军目瞪口呆，正当他们为之百般端详时，坦克已冲到面前，德军慌忙射击，然而，这些庞然大物依然怒吼着，虽然缓慢却是坚定地向前。它们碾开掩体，冲破铁丝网，摧毁机枪点，用机枪和火炮向敌人扫射，德军慌作一团。英兵紧随坦克之后，初战告捷，阵地推进4.5公里，这是过去耗费几千吨炮弹，牺牲几十万人才能获得的。当然这18辆坦克也损坏了10辆，但它在实战中的神威，使德军大为震惊，英国人自己也赞叹不已，视为神秘武器。为了保密，则依据其外型，英人对外称其为“坦克”，说它是一种机动水箱，专为前线供水用的。

英军初次使用这种新式武器，缺乏后备力量，对战局影响不大，但它给德军以巨大精神压力，德国著名军事著作家里特尔在其《评世界大战》一书中，曾描述当时德军的心理状态，“敌军在大炮的数量上占强大优势，发射数百发炮弹，敌机机群完全控制了天空，当代不可战胜的战斗大象——坦克的出现，这一切，使作为德军核心力量的步兵受到极大震动”，“军队对领导的信任和对胜利的信心发生了动摇”。

随着战争的推移，坦克及坦克战术不断完善，到大战即将结束时的康布雷战役，坦克战已趋成熟。以坦克为先导，随着浓雾的消散，“战场上所有的人一下子看见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场面：一群群英国步兵正排成一定队形前进，同他们一道前进的坦克就象东方国家部队中的大象一样……”

一辆辆坦克令人想起了古代的象战，威武、神秘、可怕。德军军心动摇，德皇抱怨，“我们的部队总是不习惯对付坦克，真是怪事”。坦克的出现是现代新式武器的开端，真正体现了现代标准原则：即保护自己，杀伤敌人。在一定意义上讲，它对战争进程有一定促进作用，为协约国

增强了信心和声势；相反，德军碰上了特洛伊木马。

坦克发挥了作用，但它的数量和性能尚不足以担当大任，远未能完成战役突破的任务。在10多公里宽的地段使用几辆、十几辆坦克，它能给对手多大的打击呢？11月份，天气渐冷，特别是数额庞大的物资被耗尽，战斗无法进行下去。此一战双方投入150个师，1万门火炮，1000架飞机。英法军以巨大代价夺得240平方公里，但并没有突破德军防线，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双方人员损失超过凡尔登战役，英军42万，法军20万，德军65万。可怜无定河边骨，堪叹军中梦里人。松姆河战役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它确实牵制了大量德军，策应了凡尔登战场。当然，其它地区的协同作战亦发挥了作用。

几个战区协同作战，这是协约国集团不同于1915年的最主要之处。一场欧洲大陆的浩劫，波及到方方面面，就如同当年的黑鼠疫。根据尚蒂伊会议的要求，在西线激战的同时，意大利战线、西里西亚战线也是战火纷飞、枪林弹雨。

无数战神的故乡意大利在近现代似乎已经失去了元气，当欧洲其它国家蓬勃生长的時候，

她已垂垂老矣。1916年，意大利仍是小心谨慎地同奥匈作战。当意军在东部伊崇佐河一线集结，准备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奥匈在西部特兰提诺直驱意大利境内。由于俄军在西里西亚的牵制，奥匈才停止进攻，进入相持阶段，意军借机向伊崇佐河右岸的戈里查猛烈炮轰，并占领该地，此后进入相持的消耗战，无大进展。

俄国的潜力令人大惑不解。1915年的惨败后，又有173万军队集结于西部战线，相对德奥在东线106万军队，数量上占明显优势，1916年3月份开始，应英、法、意等国的要求，在东线发动进攻，6月在加里西亚一线同奥匈战斗中，取得了很大胜利。鲁登道夫惊呼“这是东线一次重大的危机”，迫使其从国内和其它战线抽调兵力增援东线，但也未能阻住西南战线俄军的进攻势头。但到7月，加里西亚奥德军队得到了增援后，在斯托霍德河一线稳住阵脚，这一战双方损失约百万人。同盟国从西线和意大利方面抽调30个半步兵师，3个半骑兵师，俄国人减轻了凡尔登和特兰提诺的压力，促使罗马尼亚下了决心，对协约国做出贡献。

天平上的筹码

战争的瘟疫如雾霭笼罩晨曦。作为争夺激烈的巴尔干地区的弱小国家，也很快被抛入战争的汪洋大海。当欧洲强国把触角伸向巴尔干以及小亚细亚、中东地区，当土耳其成为同盟国的忠实奴仆，当保加利亚怀着对胜利的憧憬加入同盟国集团，当塞尔维亚民族被抛入血与火的炼狱之中，希腊、罗马尼亚在选择梦想的同时，也选择着自己的命运。

希腊由于本身的发展状况，在决定参加哪一方作战的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国王是德皇的连襟，同时根骨里禁不住对普鲁士政治、军事的崇拜，这种崇拜来源于对俾斯麦重建德意志丰功伟绩的赞叹和敬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德国的坚定信心。因此，国王坚决站在同盟国一边，但迫于自卫本能，表面保守中立。而以首相为首的资产阶级梦想的是英法资本主义的繁荣，希望在战争中攫取色雷斯、小亚细亚部分地区以及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英法资本与希腊有着利害关系，同时，出于抵制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欲望，利用希腊，削弱俄国，因此积

极支持这一派。维氏主张援助塞尔维亚，抵制保加利亚。这种明显的亲英反德倾向招致国王不满，结果首相被罢免，议会被解散。可见内部倾轧之激烈。

1916年，为了牵制西调的德军，协约国保存了萨洛尼卡的驻军，而这里正是同当年协约国迟迟不肯出兵，抛弃了塞尔维亚的不光彩历史痕迹的地方。协约国在这里扶植了以维氏为首的临时政府，以与国王抗衡。协约国损害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并不顾国际法准则，胁迫希腊政府解散亲德分子控制的军队，交出希腊舰队。这样协约国实际上控制了希腊的局势。1917年，希腊向同盟国宣战。英、法、意、塞、希、俄在萨洛尼卡集结70万兵力，成为对付同盟国一支强大力量。

当俄国在加里西亚取得胜利的时候，凡尔登传出喜讯，罗马尼亚结束犹豫和长期观望，1916年8月17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条约，向奥匈宣战。收复被匈牙利占领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是罗马尼亚的梦想之一，于是集中3/4的兵力于靠近特兰西瓦尼亚的要冲。

德国视罗马尼亚参战为一现实威胁，因为

它将阻塞同盟国与土耳其联系的通道以及南部出口，而占领罗马尼亚则可获得必要的石油和粮食。因而，德国决定消灭之而后快，派33个师在西、南两面打击罗马尼亚。德军首先在南部进攻，因此地区是罗马尼亚防御薄弱环节。

当战斗打响时，俄军的援兵杳无音讯，罗军急忙用火车从西线运兵至南线。军队行到途中，西部战线又遭德奥联军的进攻，于是军队又急忙调去西线。这样当罗马尼亚军队奔波在途中的时候，同盟国军队已逼进首都布加勒斯特。

对于罗马尼亚的严峻形势，俄军一直置之不理，直到11月份，才派兵南下，取得一些微小的胜利，到12月份，德军占领罗马尼亚大部分地区，罗军伤亡达25万。

罗马尼亚以巨大的代价牵制同盟国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德军在凡尔登的进攻。鲁登道夫写道：“我们击溃了罗军，但未能将其歼灭。凡是我們可能做到的，我们都做到了，……虽然我们战胜了罗军，但总的说来我们都削弱了。”

这就是大战中小国的命运、责任和作用。

总之，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关键

的一年，同盟国军在凡尔登城下遭重创，松姆河畔的恐惧，加里西亚的重大损失以及希腊、罗马尼亚纷纷倒向协约国一方，使人们拨开云雾，柳暗花明，谁将赢得这场战争已不是个未知数。

第七章 三栖怪兽 or 狡兔三窟

当战火在欧洲大陆如火如荼地燃点、炸响的同时，游弋着舰船的海面，盘旋着飞机的天空也成为战争这个与人类文明俱来的恶魔肆虐的场所。它把为自己礼赞的花朵向四处胡乱抛洒。当然，那不是芬芳沁人的鲜花，也不是五彩缤纷的礼花，而是制造杀戮与劫难的枪炮弹药炸开时，四下飞迸令人心悸的火花。欧洲乃至世界的海洋、天空同广袤的大陆一样均没有逃脱战争恶魔的巨吻。

沉寂的北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英国并不象后来那样心情沉重，感到担忧，也没有我们今天想象中的恐惧。格雷8月3日在下院说：“我们参战所蒙受的灾难会比不参战多少小一些。”这种思想在当时并不缺少共识，其渊源盖出于他们有一支可资依赖的“无敌舰队”。按英国大臣们的设想，英国海军将在各大洋和北海上粉碎德国海军，而大陆上的英国盟军将在陆地上打败德国。

战争开始时英国有一支世界上最强的海军，它是英国建立世界性日不落帝国的支柱，总吨位约200多万吨。战舰漂泊到哪里，哪里就成了英王陛下的庄园。它是英国生存的必需，撒克逊人荣誉和权力所在，也许就是因为它才使得不列颠面对怒吼的雄狮——德国，保持住了无畏的勇敢。对于即将来临的大战，英国海军部认为入侵并不是主要危险，保护在世界贸易中占绝对优势的商船，护送英国远征军平安抵达欧洲，消灭日益强大的德国海军才是最主要的责

任。

最初的资本主义繁荣与航海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德国确立了它主宰世界的宏伟目标之后，建立强大的海军，保证它同在陆上一样成为海上主要强国，这样辉煌的前景不断地在前方招手。威廉二世不惜承担引起与英国的海战，从而遭到封锁，在战时失去海上运输供应的巨大风险。严格地讲，这位野心勃勃的日耳曼人也着实被一种矛盾心情所困扰，苦恼不堪，“他时而坚决认为他决不想与英国为敌”，在海上多树立一个敌人，“时而又坚决认为一支较强大的舰队会使英国人大惊失色，从而使他们清醒过来”，“那时，他们就会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就会与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海军总吨位已达107万吨。

德舰船总吨位尚逊于英国，但它的机动作战能力并不弱。战争初期，它的巡洋舰在印度洋、太平洋一方面保护其殖民地，一方面灵活出击，拦截协约国零散舰只和商船，给对手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当年，德国通过干涉还辽，强行租借了中国

的胶州湾一带。1914年战争爆发，日本加入协约国，居心叵测地对驻青岛德军发动进攻。德军人少势单，陆军投降，太平洋舰队司令冯·比士率驻泊青岛的编队中的5艘船离青赴南美活动。

是年11月1日，德舰与一支由4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在智利附近海面相遇。黄昏中，双方激战多时。英两只舰相继沉没，司令克拉多克与1000多官兵同葬鱼腹，另两艘使出浑身解数，方逃得性命。英舆论大哗，军方立即派海军少将多夫顿·史特梯率7艘战舰奔赴南大西洋。史特梯以前次逃脱的两舰为饵，12月8日，将德舰队引到留克兰岛附近，以优势兵力与之决战。经过激烈战斗，4艘德舰被击沉，司令冯·比士和他的舰队同归于尽，只有“德累斯顿”号逸围逃遁。

曾泊青岛的另两艘德舰，出没于太平洋、印度洋之间，用各种方法伪装自己，迷惑敌人，寻找机会，攻击英法船只。其中“恩登号”在3个月中击沉敌舰15艘。11月9日，它被澳大利亚军舰侦知行踪，逃跑中触礁沉没。还有的德巡洋舰在一年里竟击沉或捕获协约国船只达38条之多。不过，经过1914年至1916年的角逐，德舰被驱出了外海，那里才安静下来。

在欧洲诸海域，情形不尽相同。英国的主要海上力量集中在北海，在这一带占绝对优势。在波罗地海、黑海、地中海等地则是德国势力强大些。

在战斗打响的最初几天就同德国海军决战，有这种想法的人在英国海军中是主流派。可是德国人不愿意给英国海军提供机会，让它们一次打击就埋葬较弱的德国海军。如同克劳塞维茨对小毛奇和陆军起指导作用一样，德海军的军事规范是以美国人A·马汉的理论为经典的，即：最大限度地保存海军以用于总决战，“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本身就会对敌人起到威慑作用”。同时，还有一条现实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使德国海军岿然不动，袖手旁观。那就是由于相信陆军可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战争不会打很久，封锁不是什么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当英国运兵船通过海峡这段时间里，用丘吉尔的话说，这对“德国人有着采取行动的最强烈的诱惑力”，但海面上死一般沉寂，蜷伏在赫尔里兰岛后面的“公海舰队”毫无动静。以致于英国的海军大臣等人在这种寂静中感到一种可怕的恐怖，“敌人显得出奇地静悄悄，没有动静，这

可能是重大行动的前奏……说不定在本星期就要大举登陆”。无声无息的对对手更令人不安，英国不想让北海沉寂下去。

海上的英国不比陆上的德国气势薄弱。由于德国舰队不离开港口，英国人准备象从洞里挖田鼠那样把德国人赶出来。8月，为了掩护海军陆战队在法登陆，英统帅部决定奔袭赫尔果兰岛。这里是作为海军根据地的基尔运河的出入口，距德本土仅有30公里。为保卫这个咽喉，岛上安放了近400门大炮。英军事先进行了侦察和研究，并由五、六十艘舰船组成攻击中队和支援船队。8月28日黎明，海面无风无浪，但雾气弥漫。英以数艘舰只引诱德舰队离岛，主力舰队及时赶来，截住德舰退路。从10时到14时，经过海上激战，毫无获胜希望的德舰队在英舰绝对优势的打击下，遭受重大损失，4艘军舰沉没，一艘被重创，人员损失1000多；英有5艘军舰严重受伤，伤亡80多人。

1915年初，英德海军又进行了一次海战。德希佩尔海军中将奉命率队前往多格尔沙洲巡察，英将其命令破译，派出大量军舰准备一战。1月24日晨，双方在多格尔沙洲相遇。对射20分

钟后，希佩尔看到敌人兵力强大，于是向东南方的赫尔果兰岛退去，英舰穷追不舍。中午时分，英舰击沉德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自己的战列巡洋舰“狮”号亦受重伤。是役，德损失千余人，英伤亡30多。

德国两战受挫，改而在英国通往德国的重要航道上布雷，并寄希望于潜艇发挥重要作用。威廉二世再次下令，大型军舰未经他批准不得驶出海湾。英国两仗获胜，但因规模不大，无决定性意义，进而在北海对德实行封锁，派舰队逡巡，使德海面舰只一度在北海失去活动自由。英国还利用海上封锁，依靠日本及英联邦各国的协助，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所属的全部岛屿，并夺得其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

封锁的最主要目的在于阻断敌人的海上贸易，切断德国获得战争物资供应来源。这在陆地上的战争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持久战的阴影时显得愈加重要。1914年，海上封锁之初，德国本想派40艘商船去海外索取战争物资，结果仅有5艘出港，而出海的船只也在英国军舰的追击下，或被击沉、或逃遁到外国的港口里，同样遭到禁锢。德国军舰和商船都受困于基尔运河，英国掌

握了制海权。而对于中立国的商船，英国也进行严密的封锁和搜查。公海上航引自由，国旗保护商品这是中立国在战时要求的权利，但如果允许中立国利用这些权利，提供了敌人需要的一切，则阻塞敌人的海上通道又有何用？这是令英国海军头痛的问题。要解决这难题，必须小心绕过可能引起与中立国直接冲突这块暗礁。经历了冗长而艰苦的争论探讨，英国在华丽的外交辞令掩护下，制定了十分明确、十分苛刻的禁运令，它包括禁运物品、禁运目的地。由于许多物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目的相关联，更由于有间接运到敌国的可能，因此，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爵士承认，是把每样货物都视为绝对禁运品，把几乎所有通过北海的船只都视为禁止通行的，这些船只只好乖乖被拖入英国港口，接受检查，货物多被没收，这样就切断了德国与海外的联系。

的确，德国政府起初对这些事件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或者说过于忽视。毛奇说过：“不要用经济学来打搅我——我正忙于指挥一场战争。”这说明德国的军事家们只是一帮穷兵黷武的武夫，面对现代战争的复杂局势头脑显得过

于单纯，它是促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因素之一。只可惜德国的醒悟为时已晚，当德国海军明白到无所事事、龟缩一隅有可能使德国在失去陆军的前提下，从而也自然失去了海军，而双方的协同一致努力才是赢得战争的唯一出路和现代战争的最基本要求时，当政府认识到由于失去海上贸易从而失去军队乃至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时，幡然醒悟的德国发现自己已被紧紧地束缚住了，并且完全被孤立了。海外殖民地也被英、法、日等国乘机抢占和瓜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1915年2月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德国政府声明：环绕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领海，连英吉利海峡全部在内均为战争地带，凡在该地带被发现的敌国商船一律击毁，事先不予警告，以免逃脱。更为严重的是，在该地带的中立国船只也不例外。

这样，一面是英国的海上封锁，一面是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北海及附近海域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领海，在一片沉寂中完全变成了“死海”。货船沉没，就连满载乘客的客船也葬身海底。这种巨大的伤亡，不仅危害协约国，而且殃及中立国，尤其是美国正在做自由贸易的使者，

也不得不望之却步。数以百计的美国人随着客货船被德潜艇击沉而丧失性命。1916年3月，美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美德关系濒临破裂，使得德国在封锁中愈加陷入了自我孤立的窘境。1916年5月，德国政府又不得不声明：竭力在其余战期内，将军事行动限于对交战国的军队，并命令海军“如事先未警告并且未能救出人命，不得击沉商船”。至此，德国无限制潜艇战暂告停止。

1916年，为了解除德国在波罗的海对俄国的封锁，建立起便于进攻德国的海军基地，英国立誓要击垮德公海舰队。而德国新任公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薛尔坚决主张采取积极行动，提出以军舰奔袭英海岸，诱使英舰艇出战，给予各个击破。这年上半年，双方互相试探，各有损伤。5月31日下午，急欲寻求一战的双方舰队在日德兰海面不期而遇了，15时40分左右，英比蒂分舰队同德舰队主力交火了。实力单薄的英海军损失4艘军舰，德损失2艘。傍晚6时许英主力赶到，战斗更加激烈。数百艘战舰纵横海上，巨炮轰击，火光闪闪，浓烟滚滚，浪柱冲天。德薛尔上将发现敌强己弱，决定撤出战斗。几经周折，终

于在晚11时前脱离战斗，是夜还发生了数次冲突，双方互有损伤，这是一战期间英德间最大的一次海战，共出动250余艘军舰。英海军舰艇损失吨位比德方多1倍，人员伤亡多2倍，但它并没有丧失元气，仍掌握着制海权。

英国的海上封锁，给德国造成愈来愈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扭转颓势，德国人要“用强有力的尽可能残酷的潜艇战‘去剥夺’英国岛国的便利形势”。因此，于1917年1月恢复无限制的潜艇战。它们使用鱼雷击沉大型舰船，使用火炮攻击小型船只，还广泛敷设水雷。2月到4月间，给协约国及其盟国造成极大损失，约有总排水量达145万余吨的840多只船被击沉。以后，损失船只数量时升时降，丘吉尔当时无可奈何地说：“爱尔兰西南的巨大出路正变成为英国船舶的真正葬身之所。”一时间，英海上运输瘫痪，所需物资严重不足，粮食供应短缺，政府紧急实行配给制，并想方设法利用土地多种蔬菜食粮。协约国还采取措施护航、反潜，下半年美国大批驱逐舰投入战斗，协约国逐步扭转被动，德军的无限制潜艇战终于破产。

达达尼尔的滑铁卢

任何理论在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而软弱。无论人们如何谈论达达尼尔海战的前前后后，我们也不能给它以全面的总结，而这种感慨的由来则源于这次海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海战史的特殊地位，它是英国海军和世界海战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对当时乃至今天的英国人来说，就如同拿破仑当年的滑铁卢。

1915年是交战双方在暗夜中摸索的一年，当德国转而在东线决战的时候，西线的英、法有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俄国统帅部在准备大规模作战的同时要求英、法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大规模的海上或陆上佯攻。俄国的本意在于把马尔马拉海的出海权控制在协约国手里，从而使其出入黑海的门户洞然敞开，同时把土耳其一部分部队从高加索引开。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正好处于各条权力之路的会合处。长期以来，土耳其就以其苛政、腐败和残暴而闻名于世。欧洲的文明人对其万分厌恶，甚至有人呼吁把这个“人类中仅有的不

合人道的大败类”逐出欧洲。不过由于它所拥有的地理位置，这一无价之宝在战争将要开始时，引起了德国人格外注意。日耳曼人千方百计争取它成为自己的盟国，以封锁黑海的出口，切断俄国与盟友的联系。土耳其虽然由于英国对其不感兴趣，而逐渐靠拢同盟国，但它宁愿多观望一阵。两只德国巡洋舰驶入君士坦丁堡，最后促成了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一方。

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及其僚舰“布雷劳斯”号，1912年下水后，一直游弋在地中海。战争打响，它们原本是要对付法国运输船队的。德国统帅部感到必须给迟迟不宣布参战的土耳其施加一点压力，于是下令，两舰驶向土耳其。英法曾计划攻击“格本”号，也注意到它们的行动，但不知是敌人太狡猾还是自己太无能，虽然进行了长途追逐，还是让“格本”号驶近土耳其海域。8月10日，该舰以卖给土耳其为名开进了达达尼尔海峡。军舰有了土耳其名、升起了土耳其国旗，但祖雄海军上将等还是它的指挥官，船员也还是原班人马。为了将土耳其完全绑上战车，10月28日，祖雄指挥“格本”和“布雷劳斯”以及几只土耳其鱼雷艇驶进黑海，炮轰了敖德萨

等俄要塞。

俄国人不能再收买土耳其了。11月5日向它宣战，翌日，英、法也向土宣战了。土耳其堵死向地中海的通路，俄国立即有了窒息的感觉，所以它不惜冒使英国势力扩张的风险，请求它发动达达尼尔之战。

提起达达尼尔海战，就不能不提起英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丘吉尔。如果说，英国大臣们在关于这次战役的问题上稍显犹豫而缩手缩脚的话，那么丘吉尔孜孜不倦的劝说和勇敢的努力终使其变成真正的现实。丘吉尔是这样一种人：有着杰出的才干，超人的天赋，但这些都不是他真正的优点，他真正的优点在于有能力和毅力保持和实现一种理想，使一群忠于传统、吵吵闹闹、瞻前顾后而实际上平庸的人们感受到一点火花的作用，虽刺眼，但明亮。人们在他似乎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思想至行动上，在感受他的强烈性格中，诅咒着、叫骂着受到他的蛊惑。平静的生活潮流因为有了他而汹涌咆哮。所以当英国海军在达达尼尔惨败后，按惯例，英国专门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得出了公允的结论：“首相、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应对

达达尼尔海战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丘吉尔的任何错误都构不成罪行，因为他总是同自己的海军顾问协商行事的，尽管有的时候取得顾问们的同意是勉强的。”

大众被天才人物的梦想激起热情，但我们往往只看见天才人物的影响，捕捉不到在表面现象的背后那种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是肥沃的土壤，供给他空气、阳光、雨露。如果缺少这些，天才人物就不复存在，或者成为社会的异端。就如同后来的德国与希特勒，如果说在希特勒的思想中没有一点德国人当时的共识，或者完全与欧洲人的思想脱节，显然不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在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上说，天才人物正是有选择、有目的地提炼了普通大众纷繁复杂思想中的精华。因此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不能只要某一关键人物做反思，群众乃至整个人类都要深刻反思，从中得到反省，这样才是历史的真谛所在，也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精华所在。

不论俄国人以何种理由要求英国在海峡开战，英国政府和海军大臣们听到这一消息都暗自窃喜。他们有自己更得意的计谋，丘吉尔在这

一点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海峡交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是其它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英国，更不希望在它经过中东到印度的通道上有一个强硬的对手在监视。攻占海峡进而占领君士坦丁堡就可以避免俄国进入海峡。同时，君士坦丁堡也是希腊人垂涎的目标，丘吉尔认为吸收希腊参加反对土耳其的战役，使希腊和俄国在海峡问题上发生冲突，这样便可把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控制在自己手里。“请告诉俄国人，他们会看到，我国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是宽宏大量和富有同情心的。但是在同希腊合作的道路上不应设置障碍。如果希腊和保加利亚同意转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就应该把他们抓到手。我们十分担心你们会失去希腊，使未来的一切成果都落在俄国人手中。如果俄国妨碍我们得到希腊的帮助，我将尽一切努力不让俄国得到君士坦丁堡。”这是典型的两面把戏，却是英国的利益所在。

同时，丘吉尔积极主张在海峡作战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理由，即对英国海军的信心不可动摇。沉寂的北海，大英帝国的军舰无用武之地，而且1914年西线僵持局面的形成，都使活跃的

丘吉尔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认为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胜利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迫使土耳其投降，使德国同协约国媾和。这一成果靠英国海军的突袭即可达到。

战役计划规定，舰队要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然后突击君士坦丁堡。在突破海峡时，先以舰队的扫雷兵清除海峡的水雷，然后用舰炮火力彻底摧毁土耳其的沿岸炮台和其它工事。预计土耳其的海岸炮兵经受不住舰艇的炮击，防守达达尼尔地域的陆军将撤向君士坦丁堡，因此，战役计划中没有规定动用更多的陆军，只用水兵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登陆队上岸完成破坏炮台的任务。战役定于2月19日开始，预计一个月结束。

结果，到1916年1月9日达达尼尔海战才结束，但句号前面的文字是“英国惨败”。1915年2月19日战斗打响，最初10天战役进展得很顺利，外围要塞很快被摧毁。出乎意料的是，土耳其实际是在完全控制了土耳其武装力量的德国手中，抵抗极其顽强，英国舰队无法向前推动。而当军舰孤注一掷地强行通过时，又突然触雷。光靠海军战役已无法打下去，只好转交给陆军去

完成。

在陆军行动时，军舰越来越不积极，并且受到德国越来越多潜艇的威胁。英军多方寻找薄弱环节，但屡战屡败，攻击无法继续，12月决定将部队撤出。

1916年1月，这一战役结束。结果联军伤亡146229人。英国海军参谋长费希尔海军上将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该死的达达尼尔海峡，那里将是我们的坟墓。”这不幸竟成了一句谶语。战役的失败对英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保加利亚倒向同盟国集团，希腊和罗马尼亚亲德势力抬头，更重要的是英国丧失了它在国际上的威望，英国海军失去了往日崇高的荣誉。海战同时也证明了单靠海上霸权支配世界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而过去海盗式的海军经营方式更与现代战争格格不入。

战役失败后，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在一片指责和谩骂中暂告一段落。其实，把这次失败归结于某一具体的偶然失误，有失智者的风范。综观历史，它预示着一场思想上血的洗礼，一种新思想、新事物的诞生和旧的思想体系行为规范的沉落。把这一事件提到这种高度并不十分过分。

飞机不是玩具

1910年法国元帅福煦说：“飞机只是玩具，没有什么军事价值。”这种断言在今天听起来可笑，但在历史发展长河的特定环境里，这种结论并不出自一人之口，并不缺乏共识。它反映了人类认识上的局限和世界万物变化的无常。而能够对事物未来发展的前景做出一定程度正确的预见的人，才称得上为时代的先导。福煦显然不在此列。其实也不必责怪福煦，比他伟大得多的拿破仑，当有人将世界上第一只军舰模型呈献给他时，不是也被不屑一顾地嗤之以鼻，从而失去了控制大海的绝好机会，未能完成其霸业吗？战时，飞机刚刚发明不久，虽然在1910年法、德、俄、奥匈的军事演习中，都有飞机参加。1911年墨西哥内战，双方各雇一名美国飞行员和一架飞机，以手枪互击。1912年，意大利在意土战争中用飞机侦察和轰炸，但真正用于军事目的还处于试验阶段。它与气球和气艇并用。

就如同苹果落地引发了牛顿的万有引力，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有时潜伏着人类社会重

大科技发明的契机。飞机的出现也不例外，最初是经由升空的烟雾得到启发，以后出现了气球。德国的齐柏林飞艇则与气球有着十分天然的亲缘关系。齐柏林飞艇是由德国的齐柏林伯爵发明设计的，它是利用气球制造的硬式飞艇。用铝管作骨架，装着16个充满氢气的气囊，外面蒙一层布，使用两台16马力的汽油发动机驱动。

一战初，飞机在技术上远远达不到要求，而这种齐柏林式飞艇却已发展得比较成熟。1914年8月25日，在欧洲战场上，由庞大的飞艇担任轰炸任务，取得了惊人的效果。1915年1月19日，德国的88艘飞艇携带着重型炸弹，对英国进行轰炸。由于英军密集的高射炮使飞艇不得不仓惶逃窜。

经过战斗实践，人们发现飞艇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体积大，速度慢，易被击中，而且充满氢气的飞艇容易着火爆炸。此后，飞艇这个庞然大物便由于其本身的弱点而日益被人们冷淡，人们的目光转向寻找一种更方便、更有效、更具有威力的空中武器。需要逼迫人们去发现去完善。军事战争的需要，就是飞机不断发展和完善、性能和质量不断提高的原动力。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飞机已被交战双方引入战争。起初，飞机主要被用于空袭，英、德互相以飞机袭击对方的首都、军事重地、交通枢纽。英国伦敦饱尝德国空袭之苦，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防空体系，严密观察，早期预警，配备空军及时拦截，设置探照灯捕捉目标，建立强大的高射炮群迎击敌机，甚至构成气球屏障，这样一套系统对于防止空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最初的空中战争，驾驶员用枪支互击，轰炸时，驾驶员用手投掷炸弹。1915年，德国出现了配置机枪的战斗机。有的进而装上小型机关炮。于是，地面的炮火发展到空中，人类又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争夺场所，争夺制空权。1917年，德国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全金属军用飞机，使空军的发展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战争中前期，在飞机的使用、空军作战的战术技术方面，德国有明显的优势。1914年大战开始时，德国有飞机384架，法国123架，英国63架。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国虽在飞机数量上发展很快，但空战技术显然不如德国。1916年的松姆河战役中，英国为了争夺制空权，出动数量占明显优势的飞机日夜巡逻。面对数量上占优势

的对手，德国空军采取较为灵活的战术，时常抓住有利战机，以战术上的优势攻击英国飞机，不仅时常打破英军对战场上空的控制，而且使英国空军遭受巨大损失。在这次战役中，英国损失飞机782架，而德国被击伤击落飞机仅369架。但到战争后期，德国由于原料缺乏，弹药不足，飞机制造补充不了战场上的损失，因此居于劣势。

1918年，德军垂死挣扎，在西线发起猛攻。3月的松姆河战役中，英步兵节节败退，眼看将招致战役失败时，多亏英法及时调来大量飞机阻击敌人，才大大迟滞了敌军推进速度，赢得了时间，填补缺口，保住了防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空军在侦察、校正炮兵射击、轰炸地面设施和敌方部队、配合进攻方面都起到显著作用。双方发动战役进攻前，除了其它方面的准备，都要调集大量飞机，保证对敌的空中优势。7、8月，协约国和美国发起总反攻时，联军方面拥有飞机8000多架，德方则为3300余架。协约国空军组织形式完善，分成歼击、侦察、轰炸、投射、通信等类型，每一次大战都与陆军密切配合。几百架飞机同时动作，分成若干机群层，第一层为2000米以上，攻击德军的歼击

机，第二层为1000至2000米，打击敌侦察机，第三层扫射地面目标，打击敌强击机，轰炸敌后方。它们牢牢地掌握了制空权，有力地援助了地面部队。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主动权都转到协约国方面，等待同盟国的就只有失败的命运了。

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现代立体战的开端，若将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无数坦克碾碎一切，疯狂地横扫大地，遮天蔽地，数以千计的飞机尘嚣战长空……这些壮观场面比，简直就不值一提，要是站到越南战场、阿以战争、尤其是海湾之战中，海、陆、空打击力量的杰出表演面前，它更会羞臊得无地自容。利用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更利用了人类的野心与贪欲，战争之魔这个三栖怪兽，飞速发展出自己的十八般武艺，给人类带来愈来愈大的灾难。

第八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法国犹太作家朱里安·班达说：“如果世上确有和平存在，那么这种和平并不是基于害怕战争，而是基于热爱和平。它不是行动上的限制，而是思想上的成熟。在这个意义上说，最渺小的作家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而最有力的法庭却无能为力。”

同床异梦

“人们如果不怀有某种希望，就不能忍受这样一场规模巨大而痛苦的战争——他们希望这场战争的浩劫今后将永不再发生，他们希望在

战争不管怎样打到结局的时候，它将为未来的美好世界奠定基础。”“正是这个美好的幻想，使残酷无情的进攻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使士兵和各个国家继续战斗下去的，只是人类通过这场战争将能获得些美好生活的希望。”这段话是对现代战争的一种生动剖析，力图站在公正的折衷立场，把交战双方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不论是战争狂人或是受害者，在其思想深处、灵魂深处都有着对未来十分美好的向往，透过弹痕累累的荒原和残垣断壁的瓦砾，隐现着人们憧憬的一个美好世界的幻影。所以，尽管人们充分预见了战争的可怕遭遇，尽管战争极尽恐怖之能事，战争的阴影始终伴随了人类的成长。

这种梦想用更现实的语言来表述则如锋芒毕露的德皇威廉二世所公开叫嚣的那样“重建世界新秩序”。德国要求通过战争确立在欧洲及世界的霸权，树立堪与英、法媲美的尊严。在德国哲学中反复出现的德意志民族是高于一切的“优等民族”的说法反映了在落后状态下民族的自卑与自负，企图通过外界的超常行为和努力来获得精神上的平静和抚慰。这是德国人憧憬的未来，也是这台战争机器的血液和灵魂。德国

人的这种思想或多或少不同程度不同意义上滋润了其他欧洲人。1914年7月30日，当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一场战火将弥漫欧洲时，丘吉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万事有艰险，万物皆毁灭。我感到有趣、快乐和幸福。这不可怕吗？对我来说，参战完全是引人入胜的事。让上帝原谅我这些丑恶而轻率的情绪吧。”战争就是梦想在将要变为现实时所发生的剧烈冲撞，因为梦想的实现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冲撞尽管由于利害的大小而结成对立的联盟，但依靠权益而结合成的联盟内部又有着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矛盾，使其在不太稳定的向心力中又时时隐现着复杂的离心力，有时，这种力的作用甚至很强大。

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由于三国间力量均衡，各自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离心力更强，矛盾更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领土要求、军事贷款、外交努力。

在对待德国问题上，英法有不同的想法。法国不愿有一只张牙舞爪、胃口很大的雄狮徘徊在床榻之畔。因此，不仅要收复原先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且准备借战争之机，吞并德

国萨尔地区和莱茵河左岸。作为英国，它确实害怕德国濒临英吉利海峡，不愿德国在大陆上称霸，不过，它也绝对不想让法国日益强大起来。德、法势均力敌，互相牵制、对抗，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才是英国的真正目的。当年，德意志民族分裂为众多的小邦国，被周围国家所控制的时候，英国的敌人是法国。玫瑰战争，三十年战争……在老一辈英国人的脑海中并不陌生遥远。历史教科书中赞颂英王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有对法国的强烈鞭挞，这都是由于当时法国势力强大的缘故。在欧洲这块大陆上，缺乏亚洲各国外交中那种简单明了色彩鲜明的做法，它显得复杂、诡秘，更多的是英国外交史上惯用的两面手法。所以，英国坚决反对法国吞并德国本土。在中近东地区，接踵而至的英法资本家都以此地为天府，当“利益均沾”的原则未出笼之前，在表达各自的想法时，缺乏明智的圆润的动听的外交辞令，但任何一方都不允许对方多获得一分利益。英国想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地区划归英王陛下的势力范围，法国是不会答应的。

而对波斯的争夺又引起了英国和俄国的矛

盾。俄国在远东谋取利益的同时，又把触角伸向中东近东，它梦想建起一个成吉思汗式的帝国，胃口很大，领土要求极强烈。当然，英国不愿意它在中东有庞大的势力，对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以及全盘构想形成威胁。大战伊始，波斯宣布中立。而俄国借口直接经过波斯，便于包围和打击土耳其。俄军进驻波斯，引起英国的不满。外交大臣格雷提出严正警告，并密切注视俄军的行动。

至于黄金水道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更是协约国矛盾的焦点，各国在这里都倾注了足够多的关心和外交努力，而1915年英法海军远征达达尼尔海峡更是这盘棋中重要的一步。但战争的局势表明，惹怒任何一方从而破坏协约，对谁都不利，尤其是对于英法而言。俄国时时提出退出战争的要挟，的确不容忽视，它们不愿失去这样一个庞大的战争伙伴。如果俄国与德国结伴将是为虎添翼，连想一想这一点都令人感到恐怖。为了笼络俄国，不使其中途退出战争，英国政府向俄国许诺：如果德国被击败，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的命运“将按照俄国的利益来进行裁决”，后来又说

“应在俄国的同意下来解决”。玩弄外交辞令，借以掩盖其真正意图。俄国对达达尼尔海战带来的刺激是很敏感的，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威胁英法：他将辞职，使俄国政府“有可能任命某个忠于德、奥、俄三皇同盟旧体系”的人来取代他，以要求英法“将海峡交给俄国”。由于达达尼尔战役的失败，也出于英法的权宜之计，后来，英法勉强同意了俄国的要求。

在对待中立国，特别是吸收中立国参战的问题上，俄国对于英国牺牲他人利益为诱饵的做法深表不满。

在筹备军费、战争贷款问题上，英俄、法俄、英法之间亦彼此抱怨，互相争吵。俄国由于经济落后，战时军费开支庞大，国库入不敷出。而英国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不会放弃这个借贷机会以控制俄国的。它的贷款条件苛刻，要求俄国提交相当数量的黄金作为债务保证，把战争贷款作为占有沙俄黄金储备的手段。1915年1月，在巴黎举行的英法俄三国财政大臣会议上，英国以维持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为借口，要求俄国向该银行交纳600万英镑黄金。1916年7月，在伦敦举行的财政大臣会议上，当俄国财政

大臣巴尔克向英国大臣麦克唐纳谈到借款问题时，后者回答说：“您给我30%的黄金，我给你100%的贷款，否则不行。”法国在战时为筹措资金，也向英国举债。1916年8月，法国向英借款1.5亿英镑，就向其交纳了5000万法郎的黄金。英国在协约国的财政经济关系上起支配作用，它不仅是俄、意、法等国的债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军事订货。美国垄断资本家是协约国的军火供应商，在它未正式参战以前，英国则扮演了掮客的角色。尤其是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阻断了各国的贸易来源，以及英国的海上封锁，都促进了各国对英国的依赖，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矛盾。

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是多种多样的。而解决的办法唯有一个，即通过圆桌旁面红耳赤、唇枪舌剑的争吵，最后达成令各方均较为“满意”的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伴随前方的滚滚硝烟，协约各国关于战后瓜分世界的密约不断出笼，给战争的残酷性留下了“充满希望的温馨的一面。”1914年9月，战火刚刚燃起，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就迫不及待地抛出分割德国的殖民地的方案，其海外殖民地由英、法、日三国

瓜分。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集团，并迫使中国成为协约国的炮灰。它不向欧洲派出一兵一卒，却乘机掠夺德在远东地区及太平洋岛屿的殖民地。首先，依仗其在远东的便利条件，迅速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据为己有，为日后对华侵略作铺垫。1917年2月与英国秘密签约，以赤道为界线，把德国殖民地与英国南北分领，并划定了法、俄、意等在战后欧洲的领土所得。1915年春，英、法、俄签订了瓜分土耳其的第一个秘密协定。1916年，法俄又签订了一个瓜分土耳其的协定，英法也签署了类似的协定，三方在土耳其问题上达成了谅解，而谅解的基础在于平分秋色——削弱德奥以满足自己的要求。法俄对此有共同的愿望，为此双方背着其它国家秘密商定：法国同意战争结束时，俄国可以决定同奥国、德国之间的边界；俄国则支持法国占有德国的萨尔地区并在莱茵河畔建立一个中立国。

庞大落后而未沦落为殖民地的国家就剩中国了。在很长时间里，她对于西方人是神秘的，充满了魅力。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

大门，列强初识伊人。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圆明园内的奇珍异宝使西方各国大开眼界，爱不释手，从而更注定了中国这个巨大宝藏是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的。虽然1905年俄国新败于日本，虽然欧洲战火正炽，俄国仍不会忘记在远东的扩张。1916年6月，俄国外交大臣和日本大使本野一郎，在彼得格勒签订了俄日协定和俄日秘密协约。前者规定：为维护俄日在远东的“领土权益”和“特殊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后者则谋求“使中国不落入有敌视俄国或日本之可能的任何第三国政治势力的控制之下”，把中国作为俄日的宰割对象，通过两国联盟来建立它们在远东的霸权，防止英国在华势力的增长。这就是现代外交中出现的新的复杂的情况。列宁指出，这个秘密条约“锋芒不仅指向中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向英国”，而正是后者才是其攻击的主要目标，中国只是其殒上鱼肉，它无权说“不”。

比起协约国之间矛盾的错综复杂，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无论就财政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来说，德国远远超过它的任何一个同盟国，它在全盟中完全处于

支配地位。奥匈、土、保只不过是它的附庸。它有权逼迫盟友做出让步。它强迫奥匈对意大利在领土上做出让步以拉拢意大利，而在波兰领土归属上，德奥则发生激烈争执。罗马尼亚被占领后，德国不愿让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为奥匈军队所占领，而要将罗马尼亚的粮食和产油地攫为己有，这些皆引起双方的矛盾。保加利亚与奥匈在争夺塞尔维亚的问题上存在激烈矛盾，保加利亚不以获得马其顿地区为满足，而要求平分秋色，同时，保加利亚对于德奥食言，不把许诺给它的罗马尼亚的南布罗迦地区给它而深表愤懑，实际上德奥都想把这一地区划归己有。在德国压力下，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两国对界线修改的条约并未掩盖双方的矛盾，保加利亚不满足仅得到2000平方公里的小片土地，而土耳其割让也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战争与和平

19世纪至20世纪初，笼罩欧洲的政治经济气氛不是和平，而是腥风血雨的战争。人们渴望以一种充满刺激的生活打破传统，铲除传统遗

留下的滓渣，为此甚至准备了必要的牺牲，“战争的代价不会比战争所能获得的更大”成为一句安慰自己、抚慰内心、面对即将来临的可怕变动的圣经箴言。一方是前方不断开辟的战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在较量，另一方是国家内部风云涌动的革命运动，下层人民在对上层统治者要求权利和生存的条件。不论是哪一个侧面都与和平的温馨格格不入。而到了1916年，前方战事正酣，各参战国正在为了实现梦想甘愿牺牲的时候，以德俄为主要倡导者，却出现了一股“反动的逆流”。一时间，在公众的舆论中，“和平”甚嚣尘上，谈判桌上，坐在对面的对手打出了“和平”这张牌。“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和平”，列宁这样概括。

和平需要和平的条件，正如战争一触即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它一爆发，就象逃离潘多拉盒的恶魔，无拘无束，失去了控制。尽管人们对战争的后果做了最彻底最勇敢的可怕预料，尽管人们如何以最可能有的冷酷心肠和最缺乏感情的理智来看待这场战争，但战争的实际仍然令人目瞪口呆，大开眼界。辛苦经营几代的田庄被毁，古老的城堡变成一片废墟，后方人艰难度

日、日夜操劳所换来的枪炮化作战场上阵阵硝烟，昔日的繁荣变得满目疮痍，两年中伤亡1000万人，战争资源象汹涌的河水快速流走，各国均疲惫不堪，难于支撑，继续战争困难重重。尤其是德国，战争计划一再受挫，两面受敌，英海军四面封锁，胜利遥遥无期，但它在战争中掠夺的土地财物最多，在这个时候结束战争时机最宜，还可以利用仍然强大的军队在谈判桌上捞到更多的好处。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而且与英法矛盾重重，在宫廷内部不乏亲德分子，他们早有与德媾和的思想。因此1916年的“和平攻势”以德国和俄国表现得更主动更勤勉。

早在1914年9月5日，英、法、俄三国就签订协定，规定每个签约国“事先未征得缔约盟国其它各方的同意”，不能与敌方“单独媾和”，不能单独退出战争。但一纸空文如何抵得上生死攸关的权益，单独媾和的阴魂始终伴随战争，不肯轻易散去。当1915年俄国在东线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惨重的失败，英法达达尼尔海战不时刺激它那敏感的神经的时候，当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满含热泪，激昂地对法国大使说“为协

约国牺牲是值得的”的时候……德国首相贝特曼通过丹麦国王的朋友安德生到彼得格勒，带去了“和平”的信息：结束两线作战，打败法国这个民族仇敌，结束德国与俄的对立，就象当年普鲁士王与亚历山大一世亲密合作打击拿破仑一样。后来，德国还通过俄国皇宫里一女侍官向尼古拉二世转递了三封信，表示签订和约的愿望。

德国暗送秋波正中沙皇的下怀，但俄国在这件事上也不得不具备应有的谨慎，不敢在条件尚未成熟时公开行动，只好采取秘密的方式同德国接触。1916年初，沙皇任命亲德分子斯提尤尔美尔为大臣会议主席，使沙皇宫廷中亲德派占上风。主张继续作战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与英法关系密切，极力反对秘密媾和。1916年7月萨被迫辞职，由斯提尤尔美尔兼任外交大臣，为俄德接触创造了有利条件。所谓秘密的方式就是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非官方接触，这是一种外交上的试探。

同年，德国非官方代表银行家瓦尔堡同俄国国家杜马副主席普罗托波波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会晤，讨论俄德签订和约的条件。事

后，普罗托波波夫将这次会谈的情况告诉了杜马的其他代表，并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报告了全部情况，得到沙皇的默许和支持。到1916年下半年，“从英俄的反德联盟到德俄的反英联盟的转变”更趋明显。

在协约国内部也出现了主和派。1916年11月，英国保守党人兰斯多恩在他的秘密备忘录中认为，英国生活遭受的破坏、人力的损失和财政的危机情况，需要好几代人才能恢复，因此，他要求尽速媾和。在法国内部，不仅有人主张同奥匈进行和平谈判，而且曾一度发生了被称为“破坏运动”的亲德事件。前总理茹卡约等人反映了与德国银行、煤炭和冶金卡特尔有密切关系的那些法国工业界人士的情绪，他们认为战争过分地加强了英国的地位，损害了法国的利益，要求与德国单独媾和。但利益冲突太甚，建立在谎言和虚假基础上的和平宣言很快淹没在贪婪和私欲的污水之中。

1916年11月5日，德奥发表了关于建立“独立”波兰国的宣言，这个波兰包括德国用武力从俄国手中夺来的几个省份，其目的是为了把这块土地用“合法”的形式固定在德奥的统治下。

这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所不能接受的。俄国在宣布德奥宣言无效的同时，两国的谈判也就此中断，斯提尤尔美尔甚至被指责有叛国行为，免除了他的职务。政府中主战派势力抬头。

单独的秘密媾和流产了。德国首相贝特曼这个玩弄和平欺骗的老手，又使出新的伎俩。1916年12月，他利用德军在罗马尼亚胜利的机会，迫不及待地以德奥土保四国名义向中立国、协约国和罗马教皇发出照会，表示自己的媾和“诚意”，愿正式与协约国谈判。贝特曼写给兴登堡的信中说，他要利用和平会议分裂协约国，设想只要与法俄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单独媾和，德国就能战胜其它国家。如果这一建议遭到拒绝，德国就可以在世界舆论面前把战争责任推给对方。因此，照会对于被它们占领的比、塞、法等国的领土避而不谈，却大声疾呼“要保障本国人民的生存、荣誉和发展的自由”，并且假惺惺地说“要恢复持久和平”，“结束毫无意义的流血牺牲”，建议在中立国荷兰首都海牙召开和会。

德国人的严肃性表现了一种自命不凡的特性。它在世界史上经历了痛苦悲观，经历了顽固的努力，它绝望地向别人学习，教育自己，如今

要卷起袖子征服世界，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上帝似乎并不垂青于它，似乎它经历的挫折还不够，在它前进的征途上步步充满了荆棘和失意。

协约国很快识破了德国的阴谋。在揭露德国的同时，它们玩弄了一套比德国更为狡猾的外交手腕。12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这个和平使者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插手于这场和平骗局，声称要“试探一下水的深度”，以便所有的中立国和交战国都能知道是否已经靠近那“和平的港口”，他发出一份停战照会，要求各交战国提出自己的媾和条件和对战后和平的保证。

德国认为威尔逊的目的在于使德国接受有利于美国的和平，便在复照中提出“和平的达成应当用参战国直接谈判的方法”而拒绝美国调停。

德国的犹豫不决使协约国改变了起初对威尔逊和平倡议的不满。1917年1月7日协约国违背自己的初衷，对威尔逊的建议表示同意，并针对德国提出了自己的具体和平条件：恢复比利时、塞尔维亚的独立，德国撤出法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并支付赔款，“解放”受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压迫的各民族等。这是德国不能接受的，等于

让德国承认战败而任人摆布。这样，协约国打着“人道”、“自由”、“民族平等”的幌子，把破坏中立国调解的责任推给了德国。进而，双方的和平攻势暂时偃旗息鼓。

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发动一场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并不是善良的人们的智力所能理解了，而是历史发展的多方面综合的结果。战争与和平这两个对立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应该用两句现成的语录来概括：“没有胜利的和平”，有的只是“胜利者的和平”。战争还得继续。

第九章 山姆大叔来了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看到太多的偶然性，似乎是这些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其实，各种各样的偶然只是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必然，千变万化的世界表象似乎是无序的，但真正起作用的往往还是规律。关于和平的喋喋絮语还未从人们耳边完全消失，德国就于1917年1月9日做出了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许多书本的记载告诉我们，正是这一偶然事件促使美国参战。而头脑清醒的人们大概不会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偶然”，美国就会保持其“超然物外”的态度。不止一个人指出：无限制潜艇战只不过给早已做好战争准备的威尔逊提供了一个足以说服美国人、欧洲人乃至全世界的重要论据。

南方博士

1902年10月25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装饰豪华的礼堂里正在进行一次被美国舆论称为“美国大学历史上群贤毕至、冠盖云集的空前盛会”。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当时美国最著名的风云人物，作家马克·吐温，威廉斯·豪威尔斯，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华尔街巨擘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老摩根），这位在美国政治经济界能够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也乘专车特地赶来。人们都是为了参加伍德罗·威尔逊先生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一职的典礼。不知其中是否有人预感到威尔逊日后会成为一个备受瞩目、备受争议的人物。

在美国众多总统画像中认出威尔逊并不难。象林肯一样清瘦的面庞上架着一副眼镜，同样象林肯一样，脸上的表情常常显现出一种百折不回的决心。这位任期几乎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全过程的美国第28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博士学衔的白宫主人，也是自南北战争以来第一个出生于南方和由南方推选出来的

总统。他是弗吉尼亚一个有着苏格兰血统的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先后受过12年的高等教育。这样的个人简历使其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时而被人认为是传道的圣者，时而又被人当做一位认真严肃的教授。

的确，威尔逊是以教授的身分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在美国，一所重要大学的校长是具有很高的声望并对社会有相当影响的，尤其在这所最贵族化的古老大学所进行的一些具有民主意识的改革，包括反对大学本科学生俱乐部那种过分排外的特权制度，为开明的教授和一般民众所拥护，使其赢得了很大的名声。与此同时，他那独立不羁、桀骜不驯的性格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极端自信，并以头脑清晰自傲，对于微小的误解都感到不耐烦。因此他要求别人对他绝对忠诚，不得有半点差错，这样他的朋友很少。据此，我们可以勾画出一个睿智、偏执、怪癖而具特色的老教授形象。谁说得清，美国人为什么在本世纪初选择他做了总统？

1913年3月4日，威尔逊就任美国总统。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优秀教授所拥有的最好的品质：仪表堂堂、嗓音悦耳、语言严谨……他虔

诚地宣了誓，吻一吻《圣经》。人们为他的风度所折服，从他身上似乎看到了未来的美好影子。选择一位教授当自己国家的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人们不禁问道：一位擅长在讲台上口若悬河的教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吗？他后来的最大政敌，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说，“威尔逊在内政方面的措施是坚定的，但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是畏首畏尾”。“为了了解威尔逊，我们必须记住，他是一个长老会教徒，他自信受了上帝的启示，而且也象他父亲一样，始终没有发过财。他对企业界既无好感，也不尊敬”。

新政府的目标很快就明确了：它要把大多数人民从大企业的过分控制下解放出来，要把个人从各种形式的专制下解救出来。为了这个目标，这位从南方风格的保守主义影子下走出来的威尔逊，把热心的改革家都拉到自己周围来。制订联邦所得税法，确定累进税的原则，建立联邦储备体系，加强美国金融资本海外的竞争能力，制定反托拉斯法，规定罢工是合法的，以及限制使用童工的法律等等，这些改革使人们改变了对他的疑虑，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老练

的政治家，有效的实干家。

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看做一个头戴草帽，脖子围着红色围巾，腰挂左轮手枪，手持索套的牛仔形象，也就是山姆的原型，这是一个西部拓荒者的形象。威尔逊就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自由的拓荒者，举起斧头砍掉那种种恶习所堆积成的大树。在他的一生中，喜欢绕过传统的界限，把他的精力和魅力不是用在说服那些记者和参议院的议员们上，而往往是越过他们，直接到群众中去，到那群不能反驳他，并对他那玄妙的说教心悦诚服的人们中去。之所以如此，不知是因为他不习惯国会中的气氛，对议员们有某种成见，还是由于他欣赏自己的教授形象，更喜欢向人们传经布道？也许说是后者更贴切，因为他的说教往往更迎合普通人的心理。威尔逊热切希望他的总统任期是一个改革与和平的时期，在就职前，他曾对普林斯顿大学一个老朋友说：“如果我的政府将主要从事外交事务的话，那真是造化弄人了。”

在他出任美国总统的第二年，一场空前的战火在欧洲熊熊燃起，造化的确弄人了。一场欧洲大战打碎了威尔逊的美梦，使他不能对外界

的事务保持一种传统的漠视。

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可以用“中立”这个词概括，如华盛顿所说：“我们的正确政策就是避免同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建立持久的同盟。”到1815年，孤立主义在美国已经形成了。美国在这把巨伞下，开拓西部疆土，专心致志于本身的发展，对欧洲的风云变幻兴味索然。“门罗主义”是对传统的自我孤立的背叛，它把美洲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允许欧洲染指，美国才真正有了外交，这是它走向世界的开始。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下述见解的人：象他的国家这样一个强国，迟早必须承担世界范围的责任。1901年9月2日，他在明尼苏达州博览会上所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说：“常言说得好，‘说话婉转，手持大棒，你就会成功’。如果美国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又如果同时我们有一支训练有素、足以胜任的海军的话，那么门罗主义就会奏效了。”他努力要带领美国民众告别美国的传统，插手世界事务了。

威尔逊对于欧洲的了解要比罗斯福差得多，他只是作为一个游客偶尔到过欧洲。他很不熟悉欧洲的历史，那篇使他获得博士学位的论

文叫做“国会政治”。他是内政上的“行家里手”，对于外交则不甚了了。但是，美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世界的形势不允许他斩断现实、回归过去的孤立，于是他以自己的风格处理紧迫的外交事务。他既不要过去那个自私自利的孤立主义，也不要罗斯福的现实主义，更不想要他的前任塔夫脱的“金元外交”，他插手世界事务的方式独具特色。喜欢他拥护他的人说他是真情实意，讨厌他反对他的人说他是装模作样。反正出现在世界面前的他是一个竭力拯救欧洲于水火的耶稣圣者形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外交中打出了基于正义的旗号。他认为“自己比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更懂得如何促进其它国家的和平与幸福”。于是，他摒弃传统的外交，宣传只有道义的力量才能引导世界走出邪恶。

他的这种观点一开始就遭到那些现实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说：这在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里倒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想法，但我们的世界并不尽善尽美，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傲慢、恐惧特别是利益比爱和正义起着更大的作用。

所谓基于道义的威尔逊外交并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威

尔逊干涉世界事务，突出美国在世界外交中地位的一种新手法。其目的在于象基督控制当年欧洲一样取得欧洲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的思想上的追随。他在就职后仅一周就专门发表了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声明，宣称他的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培植中南美姊妹国家的友谊和信任”。把拉丁美洲当做美国的后院是美国自门罗以来各届总统的共识。威尔逊也不例外，并且大大超过他的前任。如1915年9月，他通过一项条约，把海地沦为美国的保护国。在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中，他又派军队干涉。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夸克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想主义的威尔逊使用武力干涉的大棒比任何其他美国总统都习以为常。”

1913年3月18日，威尔逊又发表一个对华政策的声明，取消为美国银行家参加对华贷款的国际银行团提供政府保证，宣称：“我们的利益是门户开放——友谊和互利的门户——的利益，这是我们愿意进的唯一门户。”美国大肆宣扬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实际上是威尔逊在不谙外交的表现背后一个最狡诈的手段。美国这个在新大陆后起的国家同德国一样，发

展起来以后发现世界上的殖民地已被英、法等
国瓜分占有殆尽，为了挤进瓜分行列，为后来者
争得一席之地，只好耍出这个貌似人道合理的
伎俩，实际上是为美国争得殖民地提供一个冠
冕堂皇的借口。美、德两国由于历史、民族状况
不同，在处理同一件事、表达同一愿望上采取了
相反的两策略。德国人选择了战争，以强力掠
夺，美国则选择了舆论的力量，以“道义”的说
教来劝勉人们给后来者同样生存的条件。由于
人们往往被粗鲁者弄得胆颤心惊，从而也就忽
略了温文尔雅的掠夺者的阴谋。

威尔逊1916年以一句最动人的话“威尔逊
使美国免于战争”得以连任总统，但第二年就将
美国带入战争。

这意味着战争

美国人有一种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即骨子
里、灵魂深处对那种打破传统、追求平等的思想
的景仰。这种品质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的人民
所无法学到和模仿的，因为它是孕育于美国
那独特的历史中的。当五月花号载着第一批英

国人来到这块原属于印第安人所有的大陆上时，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移民开始了。在一个世纪中，这块大陆很快被欧洲居民所占领。这些移民最初大多来自英、法、德，多是为了逃避异端迫害和政治迫害远渡重洋而来到这块充满自由幻想的大陆上的，这是一群渴望自由、渴望权力、渴望财富的富有进取精神的人，他们来到这块大陆就是为了摆脱传统的束缚，包括思想、心灵以及人身自由上的束缚。这些欧洲各地各种信仰、各种语言、各种生活习俗的人们要想在一块大陆上共同生活下去，就必须摒弃原有的界线、原有的思想观念，而且开辟美洲大陆上这块荒园也需要他们建立一种新型的思想信仰，以适合新的生活环境。因此，不论何种民族，何种国家的移民，只要一踏上这块大陆就可以宣称“我是美国人”。1886~1924年几乎连任38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的塞缪尔·冈珀斯在同法国政治家爱德华·埃里奥谈话时说：“我有我自己的哲学，我自己的梦想，但是，我首先希望能逐年增进工人的福利，我们不问这个工人的政治观点，也不问他的宗教信仰。”这就是典型美国人的典型思想。他们认为除了发展自己的经济

以外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种力量上的浪费，可以想象，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在关心他人、建立良好与真诚友谊方面会显得怎样漫不经心和缺乏热情。

美国人喜欢超然于与己无关的事物之外，这是美国历史上那种孤立外交的基础。但是，绝不会放弃任何一次为自己谋取福利和财富的机会也同样是美国人的特点。威尔逊在这一点上绝不脱离群众。8月3日，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发表与战争有关的谈话，他说，他想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自豪感：美国“可以随时援助全世界”，并说他相信美国“这样做”可以“获得不朽的崇高荣誉”。8月19日，他又发表告美国人民书，要美国人民“在思想和行动上同样做到不偏不倚”。于是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绝对”中立的对外贸易，它不仅同协约国方面大做贸易，提供军火、物资、生活用品等等，同时又向德国输出货物。以致于当英国海军在海上实行封锁，大大影响它对德国的外贸输出时，美国曾与英国发生矛盾。但是它很快看到，对协约国贸易的飞速上升，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德贸易停滞的损失，对于最初那种违反原则

的行为则默许了。到最后，美国成为协约国的粮库、军火库和银行，并和协约国的胜利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协约国失败，美国的债务则化为乌有，这被许多历史学家当做美国最后参加协约国作战的一个原因。

美国在实行“中立”政策期间，对外贸易额显著增长。1914年输出额是23亿美元，1916年约为43亿美元，增长83%。同一时期，输入额也由19亿美元增至22亿美元，顺差由4.3亿美元增至20余亿美元，即增加了3.67倍。美国不仅输出额逐年增加，而且由原来大量出口农产品变为大量出口工业品，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国内工农业发展，钢铁、汽车、武器、造船、冶金、化工等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更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威尔逊的朋友和顾问霍斯上校说，在同一时期里，美国越来越强，交战各国越来越弱了，因此，就等于美国的力量在成倍地增长。美国已经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现实的利益，使美国人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感到了“中立”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使他们认识到“和平、中立”的招牌是多么可贵。

知道一点美国历史的人，耳闻目睹战争初

期威尔逊政府“和平”、“中立”宣传的人很难想象，美国人会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美国人会在无谓的战争中消耗经济实力，但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富翁们的利益，决定了美国这样的大国不会在大型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上永远局外中立。它会有自己的倾向性的。正如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说，“一个政府能恪守中立，但人却不能恪守中立”，他本人就是一个全心全意拥护协约国的人。政府的计划则是由人制定出来的，不可能完全摆脱个人的影响，特别是这个政府的元首所持的个人原则立场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威尔逊的文化根源和他的政治哲学跟美国生活中大多数有影响的人士一样，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经验和法国的革命。他也同许多美国上层人士一样，对德国人那种刻板的处事方式很不欣赏。1914年8月30日，战争在比利时进行一个月之后，豪斯上校有这样一段记载：总统“对德国在这次战争中所作所为的谴责甚至较我为甚，……他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德国获胜，那就会改变我们的文化进程，使美国成为一个军人国家”。几天以后，斯普林—赖斯报道说，威尔逊曾向他“神情严肃地”指

出，“如果德国的事业在目前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美国就势必要放弃它现在的理想而尽全力于防务，这将意味着美国现行政体的结束”。因此美国人也同其他欧洲人一样，惧怕气势汹汹的德国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这种思想促使它去扼制这种恐惧的来源。

因此，在战争一开始，美国就积极为参战作准备。大战初期，美国陆军只有25万人，这显然无法保障必要时采取行动的需要。1915年12月7日，威尔逊向国会送交了一份咨文，建议：增加陆军，扩大舰队和增加海军人员，建造商船、军舰，建立咨询委员会，以开发国内一切资源。1916年国会通过造舰计划，规定在3年内建造26艘各种不同类型的军舰。1916年6月3日，国会批准了国防法，规定增加常备军及国民警卫队，在各专科学校及大学内设立预备军官训练团，拨款2000万美元生产硝酸盐，供应火药工业部门。1916年8月29日，威尔逊签署了海军拨款法案，规定在3年内共拨款3.13亿美元，作为建造战舰、潜水艇、鱼雷艇及兴建生产铁甲舰和炮弹工厂的经费。

战争的准备在加紧进行，和平的宣言也不

忘高唱。威尔逊发出照会，以仲裁人的腔调倡言和平，结果在德国人那碰了一鼻子灰。虽然两个月后协约国响应它，提出一个“和平方案”，但美国人也看出最初英法是不打算认这壶酒钱的。如果自己不适时参战，战后世界将与美国无缘，美国就会对这个世界永远袖手旁观。这不符合日益强大的美国利益，大亨们有了紧迫的危机感。于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就寻找机会参战了。1917年初，美国获悉德国将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就决定以此为口实，对德宣战。1917年1月31日，德国向美国递交一份备忘录，宣布从2月1日起，德国再次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德国此举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加入协约国集团，不愿给美国人与德国敌对的机会，但是先入为主的威尔逊马上说：“这意谓着战争。”2月3日断绝与德国外交往来。这时，相继出现的两个事件使美国舆论大哗，煽得群众反德情绪日甚一日。一是由英国间谍提供截获的关于德国勾结墨西哥反美的情报，对美国人来说，格外刺眼的是德国人竟把美国的土地作囊中之物，许诺把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阿利桑那归还墨西哥；二是2月3日到4月6日，美国的10艘船只被德国潜艇击沉。美国公众

面对德国人给造成的财产和生命的巨大损失以及即将出现的国土丧失，怒不可遏，美国政府利用这一情绪，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于4月4日和6日通过对德宣战决议案，12月7日对奥匈宣战。

当两大军事集团打得筋疲力竭之时，美国的参战对大战局势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许多原来保持中立的国家，主要是一些美洲国家，受到美国的影响，随之参加到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扩大了协约国的阵营，壮大了它的声势。美国的鱼雷艇协同英舰队进行海战，数十艘驱逐舰投入反潜战斗，加速了德军无限制潜艇战的破产。自1917年5月28日潘兴将军率军在协约国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以上帝的使者身分抵达法国起，陆续派往欧洲的部队达200万人。其中一部份参加战斗，直接攻击德军，一部分承担后勤服务、后方保卫任务，大批英法军得以抽出，开赴前线。

参战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国提供给协约国集团的军火和各种物资及贷款总额约七、八十亿美元。可以说，美国的参战对于协约国的胜利有重大意义。当然，参战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向它借款，

老大帝国英国竟欠它44亿美元的巨额债款，美国一下子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它掌握了大量的世界黄金储备，在金融市场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200万军队和300多亿美元战时支出，换来了凡尔赛和会上三巨头之一的地位。

从此，山姆大叔开始了它插手国际事务的历史，并随着经济、军事、政治等实力的飞速发展，逐渐取得对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的主导地位。

第十章 革命幽灵

波兰银行家伊万·S·布洛克，是这场大战爆发前很久就预见到它的特点和规模的极少数人之一。他说：“工业大国之间的战争不过是相互毁灭，……未来战争……是许多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土崩瓦解。”他的这种真知灼见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充分证实。残酷的战争教育了人们，也孕育着革命。随着前线战势的残酷性不断加剧，在后方，在发动战争的基地，革命的幽灵如同泄地水银，好似变形游魂，它的活动消蚀着战争机器的部件，打击着战争狂人的要害，为世界带来新的转机。

黑暗1917

当交战双方玩弄和平阴谋的时候，所有人

仍魂系战场。1917年的战场只不过是地狱的缩影。那是整个大战期间最缺少希望，最缺乏生机的一段，它是欧洲最黑暗的一段，象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人们心头。

与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有转折性里程碑意义的凡尔登战役为协约国带来了通往胜利的喜悦，勿宁说它只是把协约集团从对中欧雄狮德国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在克服恐惧的过程中，也增添了勇敢地拉住胜利女神之手的信心和决心，这是一种经历持久却在瞬间突变的结果。正是这种心理上远胜于实际上的突变，给了协约各国识破和拒绝德国和平计划的勇气。

德国人这个在近现代历史上很少能把握住心理平衡的民族，当愤怒、嫉妒、梦想、野心等等要素交互混合成一种难以控制的自负的时候，似乎从未摆脱这样一种怪圈，从失望的谷底挣扎出来。由于种种原因，当它向“理想”的高峰攀登的时候，往往又重新摔入更深的渊涧，而新的谷底又成为这个倔强精悍的民族令人惊异的艰苦奋斗的起点，但这个点只不过是新的梦想遭到毁灭的又一个里程碑。这就是近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在德意志民族身上

看到的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两次世界大战带给我们最直接最抽象的描绘。因此，我们在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不久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谓的德国的失败只不过是它那种不切实际的、拿破仑式的世界理想的幻灭而已。如果问，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哪里？不妨说失败在它那过于狂妄、连上帝皆避退三舍的天下归一的庞大计划上。当德国人叫嚣“世界只有依靠德意志才能得救”，“我们是地球上的盐”时，也许已经触怒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永恒主宰正义。

历史不允许有假设，如果历史给我们假设的权利，当年那个中欧德国如果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德意志民族，如果它善良、勤劳，又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如果它的心理健康成熟，那它就能正确对待别人，正确对待周围的世界，正确对待荣辱胜败，近代的世界历史或许就会重写。另外，希腊人认为性格决定命运，或许德意志民族真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性格，使它兴于此又毁于此。

如果说凡尔登战役的胜负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结局，我们也只能理解为是德国

雄心勃勃的计划遭到了破产。而在前线，协约国在战役战术上并没有多少转机。相反，从1917年的战况来看，协约国似乎离它所希望的胜利彼岸仍然很远。如果说1915至1916年是交战双方在谁将赢得这场战争的问题上处于摸索阶段，那么1917年则是协约国心中怀着胜利的曙光，在通往胜利的途中经受最痛苦的煎熬。1917年的黑暗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黑暗的1917的调色板上有被讥为“尼维尔的屠场”这样浓重的一笔。1916年12月，法国政府撤掉霞飞法军总司令的职务，代之以罗贝尔·乔治·尼维尔。尼维尔在刚刚结束的凡尔登战役中初露头角，选择他为总司令反映了法国政府急欲取得战争胜利的愿望，而宁愿把一位具有打防御战能力、具有最难能可贵的坚韧不拔的品质的霞飞弃之不用。的确，尼维尔“不负众望”，以他那初出茅庐的勇气，一上任便计划对努瓦荣突出部的南北两翼发动攻击。计划由英军攻打松姆河以北，法军攻打松姆河以南，吸引敌人，而由法军在兰斯和苏瓦松之间发动主攻，企图一举突破德军阵线，并将他们赶过莱茵河，迅速结束战争。1917年在协约国方面，毕其

一功于一役是军事上的主导思想。因此，英国不惜大量增派赴欧洲大陆的远征军，兵力已达120万人，加上法国的260万，比利时10万，西线兵力共约400万人，还有各种类型大炮1.1万门，飞机1000架，坦克200辆。但是协约国之间由来已久的行动不协调的弊端终未得到根本改进。尤其是在西线的英、法司令部之间，各国利害关系差异，不同的利益追求，已为不协调投下了抹不掉的阴影。而司令官之间个人的性格冲突，根深蒂固的成见以及行动思想上的差异更为这种不合作雪上加霜。

尼维尔这个在我们的史籍中名不见经传的昙花一现的人物，他那骄横跋扈的处事方式并不比他的前任表现得更好，甚至是更差。他与英国远征军司令海格的矛盾达到了尖锐化程度，以致于1917年1月至3月不得不专门就英法双方的关系做特别的调解，以保证将来必不可少的共同行动。就在这段宝贵时间里，德国人作了某种军事上的调整，使尼维尔的计划处于无的放矢的状态。

德国由于战争消耗严重；到1917年1月在西线仅有250万人，炮2431门，飞机640架，大大少

于协约国。据此，德国主动从努瓦荣突出部撤退，从2月25日到4月5日，德军撤到有名的兴登堡防线，缩短了战线，并且腾出13个师留做后备，这样，使尼维尔精心策划的牵制战落空。

但尼维尔计划不变，一方面英军在阿拉斯进攻，另一方面，4月6日，54个师的法军在敌人正面展开主攻。由于地形险恶，德军又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法军从进攻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法军出动约150辆坦克，被击毁击伤132辆。但尼维尔并不甘心，继续用士兵的生命去陪祭他那不切实际的计划。到4月末，10万名法国士兵的生命就被埋葬在这块被讥为“尼维尔屠场”的土地上，尼维尔也如蹩脚的滑稽演员，结束了他在法国历史上不光彩的表演。贝当开始了他日后决定法国命运的历史，继任法军总司令。

1917年英国也一改以往缩手缩脚、被利害得失所羁绊的做法，主动寻找战机，从而也就为黑暗1917增添了新的色彩。6月7日，英军开始了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但不知是由于疏忽或是行动上的差异，英军首先对伊普尔南边的制高点麦辛山发起进攻，于当日攻克，而对伊普尔突出

部的进攻迟至7月31日才发动，大概是遵循“不打无备之师”的中国古训等待敌人各就各位吧。在进攻开始时，它按大战以来的惯例，对阵地进行10余天的炮击，战场上弹坑密布，面目皆非，非常不利于展开进攻。天行有道，不从人愿，从英军发动进攻当晚起，天气突变，一连14天的大雨，战场成了一片泽国，英军在同敌人斗争的同时，还要与大自然作无情的搏斗。英军深陷泥水中。德军使用了毒气，又用飞机扫射，给英军以很大杀伤，至11月战斗停止，英军损失约40万，德军损失24万。英军虽然有所进展，但未能突破德军防线。

1917年冬，自11月20日至12月7日，海格又发动了康布雷战役。这次战役对双方的影响并不大，但它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由于它在战术上有新的发展，对后来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首先，英军打破惯例，没有预先的炮火准备，而是突然发起进攻。其次，这次战役中，第一次大批使用坦克为先导，对敌人阵线进行突袭，同时用飞机轰击敌人炮兵和指挥部，步兵紧随其后，这次步兵、炮兵、飞机、坦克协同作战的初次尝试，开立体作战之

先河。但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新的战术一样，由于缺乏后备力量，这次战役未能扩大战果，德军一反攻，使战局又陷入僵持状态。

与此同时，意大利在卡波雷托的败绩以及俄军在里加的退却又把黑暗带到了东线、带到了意大利。意大利同奥匈一样，是交战双方的薄弱环节，但不幸的是这两个弱者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旗鼓相当的对手，因此在战场上仍然显示出壮烈、艰难。意大利在1917年初并未遵协约国的协议，配合英、法在西线的行动，直到5月12日才开始在伊崇河一线展开进攻。意军强渡成功，继续推进。奥军穷于应付，损伤日多，急忙向德军求援。奥匈军力孱弱，没有独立作战能力，一有祸事临头，就向盟主呼救，德军计划常常为之打乱，虽满心烦怨，也不能不予理睬，德奥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军派出7个师，在卡波雷托对意军展开猛烈攻势。在敌人毒气炮弹和大炮轰击下，意军防御工事很快土崩瓦解。德步兵紧接冲锋，10月23日攻占卡波雷托，意兵溃不成军。

协约国方面，尤其是英法对意大利的失败大为震惊，福煦亲自来到意大利，并开始调集援

军。到12月底，才顶住德奥的进攻势头。意军损失46万人，战线西移100公里。这是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经历了二月革命的俄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为转移矛盾，不顾国内舆论和前线士兵的反对，继续全力备战，意欲发动大规模进攻。德国则想趁俄国人心动荡，局势混乱之机，打败俄军，赢得东线胜利。7月，在加里西亚双方进行了一个月的激烈战斗。7月1日，俄国在西南战线向奥匈发起进攻，中路主攻格利纳内和莱姆堡，进展不大。后在德奥反攻下，仓惶退却，上任不久的布鲁西洛夫也丢掉了总司令的职务。德奥乘胜追去，决心打垮俄国。

8月德军在里加湾地区开始了新的攻势。这里直接威胁到俄国首都彼得格勒。由于防御松弛，再加上前线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秘密策划放弃里加，以德军的威胁迫使临时政府让步，以图实行军事独裁，到9月份，俄军在未作认真抵抗的情况下放弃里加。这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最不光彩的一役。不久，十月革命爆发。

还我儿子

1815年6月，在滑铁卢战败的拿破仑又一次退位，将被终身流放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当车子驶过巴黎街头，成千上万的妇女拥上前去，捶打车窗，哭喊着“还我儿子”。“还我儿子”，这是母亲们对被战争夺去生命的亲子的深切追念，更是对那吃人战争的控诉。

中国有句古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是在近代欧洲，莫扎特那著名的咏叹调“男子汉应该去当兵，不要天天在家谈爱情”的词句似乎把当兵当做一件最具有雄心壮志、最充满理想的事业。当德国哲学中那最著名的观念“战争是改变堕落生活的必要手段”提出来以后，曾经“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欧洲大陆得到众多的响应。于是一夜之间，家家儿郎上战场，离妻别母的士兵并不具有更多的悲哀，如果不是怀有对未来美好的生活蓝图的憧憬，至少也平添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概。

人们在对待战争这个问题上往往把两种互相矛盾、永难调合的观点非常自然轻松的混同

一体：战争是一种最具冷酷无情手段、肆意破坏人们精心经营的一切的东西，但是战争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意外之喜又使人不能自禁地向往之。于是战场上的胜利者被奉为战神，各种各样色彩斑斓的桂冠都被狂热的人们捧上了战神的头顶。如果人们象对待瘟神一样去憎恨战争，就不应该对战争的胜败荣辱大喜大悲。概括地说，正是对凯旋归来英雄的渴望以及那种不可抑制的狂热崇拜导致了一个又一个遭受失败后难以自拔的痛苦和悲伤。人类无法理智地把这两种感情做稍许的修正，也就永远难以逃脱战争恶魔的摆布。

充满感情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虽然真理的绝对性仍然是一个无法探知的陷阱，但是观察历史事件时的感情成见往往引导人们偏离真理的航道。一个历史学家要把握住其中的尺度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也与我们这个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在凯旋而激起的狂热场面中，在成千上万热泪盈眶的人群中的一个思虑重重落落寡欢、甚至是满脸忧戚的人似乎是一种离经叛道。人类并不需要这种冷静和理智。但是当成千上万的士兵的生命被战争无情摧毁的时

候，我们捡起这种明智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处。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句中国古诗形象地描写了后方妻子送别奔赴前线的丈夫以后，那种魂牵梦绕的思念，以及由这种思念反衬出的战争带给各个家庭的深重灾难。当亲人们倚门翘望前方胜利的捷报、亲人凯旋的身影时，殊不知他们等来的是亲人战死疆场的噩耗、亲人浸冶血土的尸骨。

大战期间，各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俄国40%的男子被征调入伍。“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子，村里的壮丁都被征发到前线去了，这些人一般都没有回到他们的村里。”法国农村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原有560万，到1916年底，仅剩下300万。意大利农村成年人口在大战期间也减少了一半。仅1916年凡尔登战役和松姆河战役就吞噬了约200万人的生命。德国遭受的损失最大，差不多没有一个家庭不带黑纱。幸存的士兵躺在泥地里和战壕里忍饥挨饿。

战争经过了3年，仍然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人们逐渐从战初那种狂热和幻想中醒悟过来，美国人汉森·W·鲍德温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参战国从来没有为如此渺小的利益投

下如此巨大赌注”的战争。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未给人们带来预想的利益，战场成为巨大的绞肉机。后方人对政府这种视人生命如草芥的作法尤为愤慨。而前线的士兵心里充满极度的苦闷。不断有人开小差，抗拒命令，甚至举行起义。据法国官方统计，到1917年6月底，违抗军令的有75个步兵团，23个轻骑兵营，12个炮兵团。1915年有2433名士兵开小差，1917年增加到21171人。在法国的香槟段战线，只有两个师可以完全依靠，在某些地方的战壕里几乎无人守卫。人们把政府称为屠杀士兵的“刽子手”，提出了“把厂主送到前线去，让士兵返回家园”的口号。

“今天整日无面包”

与前线流血牺牲的同时，在后方，老百姓却为生活的困苦所折磨。人们渴望通过战争、通过不惜牺牲掉亲人生命的壮举来改变现实境遇的梦想如水月镜花般破灭了。不仅如此，原有的生活水准一落千丈。

各交战国为了适应日益沉重的战争需要，

把整个国民经济都纳入战争轨道，压缩民用工业，扶植军工生产，机械厂改为生产武器的兵工厂，化工厂改为炸药制造厂。农村由于缺乏劳动力，加上战乱的影响，大片耕地荒芜，粮食大幅度减产。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从1915年起，各国开始对粮食、肉类、食油、衣服、靴鞋、煤炭、煤油等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度。结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量比战前减少1/2至2/3，饥饿威胁着广大人民，食品供应极度紧张。1916年10月，英国只有4个月存粮，德国在1916年4月每天的面包配给量从160克降至120克。由于粮食缺乏，不得不用芜菁充饥，因此，1916年冬天被德国人称为“芜菁的冬天”。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粮食的配给量还不足一个成年人正常需要量的一半。在这种艰苦的岁月里，德国境内大约有100万老人、妇女、儿童死于饥饿。在俄国，1917年1月底，彼得格勒仅存有10天的面包，3天的食油，肉类供应则完全中断。莫斯科的面包房门口经常出现“今天整日无面包”的告示。为了买一小块面包，意大利人每天要排队等待四、五个小时之久。

饥饿并不是后方唯一的困难。政府和资本

家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中，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用反动法令和武力把工人固定在工厂，剥夺其人身自由，无限制地加班加点，甚至取消星期日。1914~1915年，英国通过“关于保护王国”的法令，在国家监督的企业里严禁罢工。1916年12月5日，德国工会通过所谓“为祖国辅助服役”法令，规定男子从17岁至60岁实行劳动义务制，禁止罢工和随意流动，谁拒绝工作，谁就受到严厉的惩罚，把他送到最具危险性的前线。意大利政府在军火企业中实行兵营制。沙皇俄国劳动时间甚至延长到16小时。不仅如此，妇女和童工也被迫承担起沉重的工业劳动，整个帝国的后方变成了囚禁劳动人民的军事苦役监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家、工厂主在战争中大发横财。战争加剧了垄断的进一步形成，借助国家的权力，强制实行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垄断资本家靠国家的军事订货领取政府津贴，获得廉价原料、燃料、电力和其它物资，攫取暴利。德国最大的军火钢铁工业垄断组织克虏伯公司1913年的纯利大约为3400万马克，1915年增加到8600万马克。英国的英伊石油公

司1914年的纯利为2.7万英镑，1917年增加到34.4万英镑，到1918年已达110万英镑。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提高物价，降低工人工资，发放公债，用工资比较低廉的半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尤其是妇女，与男子担负同等的劳动，但工资大约只及男子的一半。资本家还垄断军火贸易，从中渔利。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据1917年4月19日《民国日报》揭露，德国资本家竟在士兵的尸体上打主意赚钱，成立了所谓“利用死尸有限公司”，于德比边境森林开设了尸体炼油厂，炼出油后，剩余骨肉来喂猪，做肥料、制皂等，从中捞取大量利润。

真理的暗道

当最初的幻想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粉碎之后，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群众在苦闷和彷徨中不断问自己：这场流血的战争到底为谁打的，我们在为谁而战？而且普通群众也急需一种新的哲学理论，一种新的指导方针作为行动指南以渡过眼前的困苦。同时，在欧洲人民中间也急切

需要一种新的理想代替已破灭的梦想。这些历史重任无疑都落在了第二国际领导者的身上。在这些问题上，第二国际内部不同意见的论争伴随了大战始终，而且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领导人内部分歧之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称得上空前绝后。

民族是什么，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对待民族问题，这是第二国际分歧最大，且最具有关键性的问题。对于一个奉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国际共产主义者来说怎样看待民族、自我、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第二国际裂开了日后永难愈合的缝隙。1907年，在欧洲上空战争乌云密布、日见其浓的情况下，第二国际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大会，主要议题是对待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态度问题。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在会上提出了那著名的口号：“对人类的爱，一分钟都不能阻止我做一个好的德国人。”法国代表饶勒斯、瓦尔扬则主张被威胁的民族有义务“保卫他们的独立和自主，并有权请求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这样就把大战理解为一场民族间的冲突，掩盖了战争的阶级根源，而这正是

各国发动战争的漂亮借口。这次大会右派机会主义占了多数，国际无产阶级的著名活动家倍倍尔起草了一份决议草案，虽然也指出了战争是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战争才能停止，但它同时又从形式上把战争分为“进攻的”和“防御的”两种，从而就滑入了右派机会主义的车辙。列宁第一次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出席第二国际会议。在会上，他团结左派，同机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第一次提出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无产阶级反对战争的目的不是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在这次会议上，机会主义和革命左派之间就战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无法弥合的分歧，注定了第二国际日后各派分道扬镳的命运。

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中就出现了机会主义，其根源在于这一时期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繁荣，殖民地领土不断扩大，垄断利润不断提高，几乎所有工人运动的领袖被这种暂时的繁荣所迷惑，于是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

即将崩溃的理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为机会主义路线所控制，其中尤以德国著名的社会党领袖伯恩斯坦为代表，他是这一时期机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很早以前，恩格斯就指出他缺乏自信心的毛病，同时又非常欣赏他“在理论上思路开阔，而且敏锐机智”，因此于1893年7月29日指定他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之一。但伯恩斯坦思想中永远也未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他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初步信仰到怀疑，最后提出全面修正的过程。恩格斯逝世后，许多机会主义者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伯恩斯坦更是公开站出来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进行社会改良。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认为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消灭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根据，资产阶级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它既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则

是“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从而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准则。在机会主义者看来，这并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补充。伯恩斯坦还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完全“用不着炸毁”，“只需要继续发展”，所以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要集中于“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最高级的制度”，用点滴的改良即可从资本主义过渡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一些社会党人所利用，使其与资产阶级勾结名正言顺。列宁指出：“十九世纪末叶的客观条件格外助长了机会主义，使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当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资产阶级逐渐改变了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这一方面基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与资本主义发展趋于稳定的状况有关。策略改变的突出之处就是从剥削本国无产阶级和掠夺殖民地所攫取的巨量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收买工人，从而形成一个脱离工人阶级基本群众

的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阶层，这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最可耻的分化瓦解。工人官僚的工资比普通工人高七、八倍以上，人数不断增加，这些人无论从待遇、生活方式或世界观来说，都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工人阶级的代表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利用工人领袖的护身符，成为工人运动中的隐身人。他们是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除了经济上的收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利用特权和小恩小惠拉拢工人的上层，吸收他们进入内阁，担任内阁或军事工业委员会、议会和种种委员会内的安稳的肥缺。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获取这种肥缺几乎把全部精力贯注到议会活动中。法国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埃蒂耶纳·米勒兰第一个参加了资产阶级的内阁，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代表人物。这位因善于辞令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很早就因为他的辩护词是为了说服人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赢得了一些资产阶级人士对他的钦佩。在工人运动中他似乎站在工人一边，但同其他国

家机会主义者一样，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争取议会选票上，以期“为工人”谋取福利。1896年5月在社会主义各派举行的巴黎圣芒德多勒门餐厅宴会上，米勒兰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应“具有一个心灵，一种思想，一种行动”。在会上，他用那充满魅力的说服力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即“圣芒德纲领”：“国家进行干预，使各种形式的生产和交换手段，按其成熟到可为社会所占有的程度，逐步从资本主义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通过普选获得国家权力”。这一纲领为米勒兰主义即入阁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得到不少社会主义温和派的拥护。从此他们即开始争取入阁的孜孜不倦的努力。1899年，米勒兰出任内阁中的商业部长，与拿破仑第三的副官、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费将军共事。米勒兰主义被称为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大会上，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草案，认为入阁“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个原则问题，从而对米勒兰的入阁给予肯定。在此以后，机会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舞台上甚嚣尘上，形成一股极强的逆流。国际社会党执行主席、比利时社会党领袖王德威尔得出任司法部长，丹麦社会民

主党领袖斯陶宁格充任丹麦不管部部长。到1916年11月，整整10个社会党人的领袖在资产阶级政府里担任部长职务，企图以此保证工人和资本家的“合作”。

实际上，阶级矛盾具有着绝对的不可调和性。打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旗号进入内阁的各国社会党领袖们，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以保住自己的利益，很快与资产阶级取得了妥协，不但没有为工人阶级争得一份权利，而且很快叛变革命、镇压革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成为资产阶级的走卒和帮凶。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更是为资产阶级政府发动战争摇旗呐喊。德国的社会党人在这一行动上走在前列。1914年8月1日，社会党人召开会议，会议要求工人停止当时正在进行的一切罢工斗争，号召250万成员在战争中支持政府，声称：“在危急存亡之秋，我们不会抛弃祖国。”1919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的恶果昭然于世时，伯恩斯坦公开承认，1914年8月4日投票赞成政府军事预算是错误的，他说：“8月3～4日是我政治生活中最黑暗的日子，我的观点、我们的投票对我们的人民和文明世界都是

灾难。如果我们曾说‘不’，就象我们有权说的……德国人民一定不会被杀害或变成残废。”从这一点上也许可以看到伯恩斯坦还称得上是一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探索者，虽然他探索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但是比起米勒兰最后的完全变节则有实质上的差别。在战争前夕及战初，米勒兰二度出任法国军事部长，他在为军国主义效尽犬马之劳的同时，曾对冶金工人说：“不再有工人的权利，不再有社会立法，只有战争。”这样，在米勒兰主义中已完全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子，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完全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

他就是列宁

1907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克拉拉·蔡特金第一次见到列宁，罗莎·卢森堡满怀崇敬地指给她说：“仔细瞧瞧那个人，他就是列宁，”他有“翻江倒海的雄图，”任何情况下他都“决不会屈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没有列宁，就没有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这位

以他那著名的前额和著名的手势，以及他那永不懈怠的精力和热情给所有见过或接触过他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的形象本身就给人以一种向上的力量。就是他，领导第二国际占少数的左派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成功地加以发展，使其适应新的历史现实。把马克思主义由一种科学理论变为人类的伟大社会实践。因此，列宁不仅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和共产主义卓越的政治活动家。

自从恩格斯逝世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国际中的左派居于少数，除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等，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得以通过这个曲折幽暗的巷道。当军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獗、战争恶魔即将出笼的时候，卢森堡站在反对军国主义的最前列，提出“不给军国主义一个兵、一文钱”。在1912年11月第二国际巴塞尔大会上，蔡特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她说：“当我们妇女和母亲们起来反对大规模屠杀时，那么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自私、怯懦

而不能为伟大的目标和理想做出巨大的牺牲。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过生活的艰苦磨炼，我们在这个制度下变成了女战士……因此，如果争取自由的事业需要的话，我们会进行战斗和牺牲。”蔡特金的态度正是左派的态度，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法宝。

实际上，同其它任何学说一样，马克思主义都是在不断接受挑战，不断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中成熟发展起来。马克思同巴枯宁的斗争，同拉萨尔的斗争，斗争的胜利则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成熟。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拒绝各种“异端”思潮，相反，它的战斗性决定了它视这种交锋为一种磨炼。

列宁以敏锐的头脑、犀利的语言在第二国际处于分裂的惊涛骇浪中奋勇搏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实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从而否定了机会主义关于战争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性质的观点，指出第一次世界

大战对双方来讲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

战争爆发后，第二国际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对待这场战争采取什么态度，成了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也把列宁为首的左派的斗争任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对于机会主义提出的“保卫祖国”、“国内和平”的观点，列宁在揭露和谴责欧洲各主要国家社会党领袖们的背叛行径的同时，提出了“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行动口号，并宣告“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政治上的破产”，从而扭转了恩格斯逝世后各国社会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工人运动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列宁根据新的世界发展形势，在他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不平衡的产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料和殖民地的争夺的结果，这场大战将会使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削弱，造成一种新的不平衡，不平衡的结果在帝国主义阵线会出现一些薄弱环节。正是这种薄弱环节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

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列宁的这一理论，为各国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使无产阶级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列宁的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对于遭到战争和军国主义困苦的各国人民是一种鼓舞。列宁指出，摆脱战争的唯一出路就是要掉转枪口，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权。他号召士兵在前线战壕联欢，工农群众在后方进行罢工、示威游行等反战活动，而各社会党人的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坚决果断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直至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同时，列宁也针对机会主义利用议会斗争的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指出：斗争既要坚决，但也要有策略，“今天交给你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组织，用它来打击敌人，而不是为了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死抓住安乐椅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剥夺了你的选票而交给你枪枝和最新式的高射炮，那你就把这些屠

杀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使用这些十分有利的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来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

经过以列宁为首的左派的不懈努力，也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国革命党人组织本国人民进行了反战争、反饥饿、反政府的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始终。不过战初由于机会主义思潮的干扰，各国社会党人的有意破坏，许多先进工人被政府送上前线，斗争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到1915年以后，战争的弊端不断在人民群众中唤起思想上的觉醒，加上左派不断努力，各国的革命运动才日益高涨。左派领导人站在斗争的前列，不顾个人的荣辱牺牲，积极投入到斗争的洪流中去。1915年10月30日，在柏林有数百名妇女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楼前示威，要求纠正党的政策。群众对机会主义者的行径十分憎恨，当艾伯特·谢德曼等头面人物出现时，甚至有几个妇女拿着伞向他们冲去。1916年5月1日，李卜克内西在柏林波茨坦广场组织了几千人的集会，反动派不顾“民主”的伪装，剥夺了李卜克内西的议员不可侵犯的权利，指使警察

把他抓走，送交军事法庭。在法庭上，李卜克内西临危不惧，义正辞严地声明：“我在这里是控告，而不是辩护。不是国内和平，而是国内战争——这就是我的口号。”各国的罢工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革命的热潮。

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前线不断溃退，沙皇专制的腐朽，使俄国社会遭受战争的苦难比其它国家更严重。资产阶级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1916年底阴谋发动一次旨在废掉尼古拉二世的宫廷政变，但未成功。1917年彼得格勒工人为纪念1905年“流血星期日”举行了罢工，并召开群众大会，示威游行。3月11日，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局号召下，工人的罢工变成了武装起义。12日，彼得格勒驻军起义。尼古拉二世慌了手脚，命令军队“着令于明日，将京都骚乱悉行制止”。但由于布尔什维克长期的工作和群众运动的影响，军队转向人民。

当晚，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尼古拉二世一家被囚禁皇村，十月革命胜利后，又转移到叶卡捷林堡，1918年6月17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紧急情况下，被处死。

但是胜利后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没有给人民以和平、土地和面包，而是继承了沙皇政府的衣钵，继续进行战争，成了一个新的反革命反人民的政府。这时候，一直密切注视俄国革命形势的列宁，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重重阻挠，于1917年4月16日从瑞士回到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汇集会到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渴望这位领袖领导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车站上，列宁发表了演说，号召广大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第二天，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为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新的斗争方向，指出了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现在是第二阶段，即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作好了必要的理论准备。“革命幽灵”即将在这个世界上展现它那巨大威力。

第十一章 无可奈何 花落去

战争进行3年多，各交战国都陷入不可解脱的困境。巨额的军费开支、大量的兵员伤亡、此起彼伏的人民反战斗争……这一切的一切，使各国统治者焦头烂额，内部矛盾重重，众叛亲离。

造成人类空前浩劫的战争将要引发人类史上开天辟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伟大的人民革命将导致战争的结束，战争的恶魔将收起它那肆虐的翅膀，世界将恢复往日的宁静。但那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大大改变了的世界。事情的结果显然违背了战争发动者的初衷，可是面对社会发展规律造就的现实，他们只有徒唤奈何的份

了。

丧钟为谁而鸣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一个创世纪的钟声在彼得格勒敲响，它传遍欧洲，传遍世界。它宣布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开始了。

列宁的《四月提纲》为俄国工人阶级指明了新的方向，从而也宣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站在对立的立场。为了拯救俄国，拯救俄国人民，临时政府已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目标。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声明，保证履行沙皇政府对协约国承担的义务，坚决把战争进行到胜利。在布尔什维克的教育下，对帝国主义战争深恶痛绝的工人和士兵们很快集合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临时政府被迫撤掉米留可夫等人的职务，新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危机开始了。

7月1日，50万群众大会游行，“打倒战争！”“打倒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响彻彼得格勒上空。列宁称其为俄国历史上“一个转变的日子”。7月14日，临时

I

政府又在西南战线发起进攻，企图用进攻的胜利转移群众的视线，进而绞杀革命。结果适得其反，进攻失败，6万人阵亡。噩耗传来不啻给人民群众的反战斗争添加了催化剂，给反政府运动的烈火加上大抱的干柴。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水兵手持武器，自发地举行游行。革命形势的发展突飞猛进，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所能允许的范围。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利用这有利时机参加并把它引导成有组织的反战示威。7月17日，50万人走上街头，彼得格勒到处涌动着反对政府的人流。至此，临时政府撕下它那伪善欺骗的面具，公开镇压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被封闭，大批革命者遭到逮捕，列宁遭到通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在他的隐蔽地——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里，写下了不朽的著作《国家与革命》。

这一被历史称为“七月流血”的事件，如果说使人民看到了临时政府的真面目，不如说人民群众从血与火的洗礼中，认识到只有靠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政权，才能真正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形势酝酿成熟了。

10月20日（俄历10月7日），列宁回到彼得格

勒，俄历10月25日，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了。晨钟响过，工人和士兵迅速地占领了彼得格勒的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局、国家银行和政府各部。起义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鸣笛，炮弹呼啸着轰击着资产阶级政府的堡垒——冬宫。革命武装经过激战，深夜2点全部占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宣告十月革命胜利，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着，在莫斯科和全国各地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胜利诞生了。在世界上第一次为资本主义政权敲响了丧钟。钟声里，资产阶级风花雪月的幻想遭到了最无情的毁灭。

争取大多数人类平等幸福的生活再不是理想中的海市蜃楼，它是几千年来人类美好渴望的实现，宇宙的子夜终于回到了那纯朴、高级的人生境界。在上帝慈祥的目光注视下，人人都成为他宠爱的生灵。这是人类精神上第一次彻底解放，第一次生活在平等、祥和的气氛中，去享受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这无异于人间的伊甸园，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它预示着人类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俄国人民勇敢

地为那个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合理要求、无法保障人们最起码的天然权利的世界敲响了丧钟。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在这震聋耳欲的钟声中瑟瑟发抖。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战时一种理论上的总方针。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不仅为资产阶级政权敲响丧钟，也为帝国主义战争敲响了丧钟。为了巩固新兴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把人民从战争的困苦中解放出来，布尔什维克党决定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于是向各参战国提出立即开始进行公正的民主的和平谈判。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宣读了《和平法令》，提出立即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同时，公布无条件地废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同英、法、意等国所缔结的，企图大战结束后兼并领土、瓜分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约。

苏维埃的和平建设遭到协约国统治者的拒绝，他们之中最有远见的代表人物明白，缔结和约将有助于维护和巩固俄国革命的成果。自从十月革命爆发，俄国成立苏维埃政权，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就强烈地感到它具有的巨大

威力，这种威力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战争瘟疫等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危害。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以不能容忍的眼光来看待苏维埃政权，并试图加以迫害。英国劳合—乔治说：“关于俄国革命是否具有法国革命那样的影响，或者它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影响更大的问题，取决于一点，即革命领袖们能否做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将其运动继续下去，或者是革命的能量未被耗尽，而战争却使它偏离自己的目的。如果俄国不再参加战争，那么革命将成为决定世界各国人民大众命运最大的因素之一，而人类总有一天势必会观察到或经受这种命运。”这是一种对苏维埃政权刻骨铭心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促使它希望通过继续下去的战争来摧毁革命力量。

协约国拒绝和平法令，还出于一种纯粹军事上考虑，丘吉尔说：“俄国尽管一败涂地，伤亡惨重，但仍然是一个忠实而强大的盟国。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俄国在其各条战线上牵制着敌人全部师的一半以上，而在这场斗争中，它所死去的人数比所有其它盟国加起来还多。”这也是英法与俄结盟来打这场战争的最初最根本的动机，也是在战时对俄国做出某种承诺的真正

原因。因此它不会轻易放开俄国这只关系重大的手。因此，它在对苏维埃政权强烈呼吁保持缄默的前提下，极力怂恿和支持俄国内的社会党人，包括俄军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最高司令杜鹤宁将军。

在这种形势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断然决定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单方面与德国进行和平谈判。12月22日，苏俄代表与德、奥、保、土代表团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举行正式的和平谈判。苏俄代表团团长越飞根据《和平法令》提出6点原则，包括：不得强行兼并在战争期间占领的土地，占领军应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保证各民族的政治独立以及法律权利，交战国的任何一方均不承担向对方支付所谓战费的义务。

德国一方面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战争果实，因此，在表示允诺的同时，又附带提出：德国只有在其它参战国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苏俄的建议，这样就否定了苏俄的建议。德国代表霍夫曼声明：德国原则上同意不割地的和约，但不能撤出包括占领的波兰、立陶宛和库尔斯。

对于德国的刁难和讹诈，布尔什维克为了新兴政权不致夭折，坚持缔结和约的原则，并准备做出某些必要的妥协。列宁说：“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入伙分赃，”这是一种策略上的灵活性，一种形式上退却的进攻。但是列宁的设想遭到党内资产阶级分子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破坏。身居苏维埃代表团团长职位的托洛茨基置列宁建议于不顾，声明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在德国所要求的条件下签订和约，但又私下向德方透露苏维埃决定不进行战争，继续复员自己的军队。这是一种对革命政权的背叛和对自己人格的贩卖。

1918年2月18日，德国以苏俄不接受它的条件为借口，发动进攻。虽经苏联红军的努力，挫败了德国的进攻，但也使谈判更不利于苏维埃政权。

3月3日，苏维埃代表团被迫接受德国的最后通牒，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同意俄国放弃波兰、立陶宛、库尔兰·里夫兰和爱沙尼亚。在高加索地区，俄军撤出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撤出芬兰以及乌克兰，承认芬兰、乌克兰独立。此外，俄军完全复员。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的补充条款中，又规定苏俄要偿付德国60亿马克。这明显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掠夺性条约，是一种对新兴的苏维埃政权的赤裸裸的讹诈，但它却使这个新兴的政权赢得了和平和发展壮大成熟的环境，从而为后来抵抗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积蓄了力量。

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世界工人阶级做出了榜样，德国的无产者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动革命，推翻索亨霍伦王朝，使《布列斯特条约》变成一张废纸，以实际行动向新纪元的开拓者致以敬意。但在1918年开始的时候，德军最高统帅部仍控制着局势，代表着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有心与协约国决一雌雄。

鱼死网破

1917年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各国都已精疲力尽，但交战双方的侵略野心丝毫未减。1918年，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俄国退出战争后，德奥军队与英法军队相比占有优势，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夏季打败英法，取得胜利。为此，德国统帅部大肆调兵遣将，到1918年3月，同盟国在西线集结197个步兵师，飞机3000架。当时协约国方面在西线有167个师，3800架飞机，但坦克大大超过同盟国，为900:200。

在整个大战期间，德国人永远比其它国家更乐于运用他们那聪明的头脑，也就决定了他们从不放过每一次进攻、争取主动的机会。兴登堡和鲁道夫认为西线的主要对手是英法联军，而英军显得更为软弱，“这是一支小型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格的职业军队，有高度的自身团结精神，装备优良，士兵快活、可靠、沉着”。但英军有一个的致命的弱点，正是这点被精明的德国人所洞察，即军官中多“毕林普上校”式的人物，他们大多勇敢、忠诚，然而落后、缺乏想象力。

因此英军作战缺乏应有的灵活性，直接表现为3年多来英军始终将主力集中在海岸一带，从而也就失去了主动寻找战机、与法军密切配合的可能。1918年英军主要集中在从海岸至圣康坦一线的北翼上，在康布雷地区只有一支比较弱小的队伍，在康布雷南面的兵力则更少。因此德军认为，只要从东北方用一支部队进行攻击，便可击溃英军。于是德国制定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知是第几个雄心勃勃的妙计：先击败英军，占领法国海岸，切断英远征军与其本土的联系，从而迫使它投降，然后集全力围困法军，并将其消灭。德国统帅部又一次被这个精心策划的妙计所自我陶醉，并且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入此计划的实施。但这些唯心主义者对形势的估计是不切实际的，其设计的军事行动不过是困兽之斗。

德军把大本营移驻斯巴，从1918年3~7月发动了5次大的进攻。德军第一次进攻的矛头直指阿拉斯至拉费尔一线的英军，主攻方向是亚眠，选定英法军的结合部作为突破口。德军投入战斗65个师，7000门大炮，1000架飞机。处于防御地位的英法军只有36个师，3000门炮和500架

飞机。

3月21日战斗开始，当天，英军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次日，德军在右翼和中路左翼分别占据了對方的第二、三道防线。第三天，英军勉强在左边守住了第三道防线，中路由右翼却节节败退。德国人收获颇丰，有的甚至达到了松姆河畔，远程大炮的几发炮弹竟然落到了巴黎，给法国首都带来一阵骚乱。英军且战且退，日耳曼人无法取得重大进展。陆续到达的英国增援部队终于堵住了缺口，最后，在松姆河一线形成一道新的防线。

德军没有实现计划中隔断英法联系、摧毁英军的目标，他们向前推进不少，距亚眠只有7英里，但他们也迫使协约国做到了长达4年未能做到的大事：建立协约国统一的司令部。协约国内各行其是，尤其是英法在西线的互不配合，由此在双方共同建立的防线上不断出现一个个缺口，英法联军的交合处成为这种不配合所引起的最明显最生动的尴尬。协约国为解决这种尴尬曾力图协调彼此的行动，但结果是收效甚微。而今，当德军从这个缺口突入，几乎将英法军队几年的努力毁于一旦的关键时期，3月26日，费

迪南·福煦将军成为西线英法两军的协调员，4月3日又任命他为法境各协约国军队总司令，这个结果是协约国打了无数败仗、受到无数创伤换来的。这为1918年早日结束战争、协约国转入大反攻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当时的形势对协约国很不利。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前线伤亡惨重，士气沮丧。在法国，以前总理卡约为代表，形成一种议和的潮流，主张实现“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在这紧急关头，素以“左派”闻名的克列蒙梭被普安卡雷总统请了出来，任命这位76岁的铁腕人物身兼总理和陆军部长重任。3月8日，在众议院的参政会上，克列蒙梭发表了极富感染力的演说：“我的对内政策是：我要作战。我的对外政策是：我要作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要作战……而且我将不断作战直至最后一息。”克列蒙梭组阁，确立了反动的独裁制度，这种意志加决心的力量可算是1918年协约国粉碎德国5次殊死进攻的不败法宝。战后法国参议院一致通过法令，确认了他的功绩，指出“乔治·克列蒙梭作为公民、总理兼陆军部长，为祖国立下了伟大的功勋。”他被称为“胜利之父”。资产阶级

感谢他率领法国渡过黎明前的黑暗，迎来胜利。

4月9日，德国又开始了它的第二次进攻。德国军队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官的英勇果断，以及战术上娴熟老练，使它可以利用一切有利战机来服务于它那一个个明确的目标。但是经过3年多的消耗，原来借以支撑其强大军事机器的雄厚储备力量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象德国这样孤军深入敌人腹地，始终是自古以来用兵的一大忌讳。克劳塞维茨认为把战场迅速转移到敌人国土，利用敌人的资源支撑一场战争的著名论断，经过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似乎显示出了它的幼稚可笑。战初，德国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使其失去了打一场速决战的可能性，德国早就失去了速战速胜的可能，而一场持续几年之久的战争又带来许多新问题。德国的统帅们在克劳塞维茨的经典中找不出现成的答案，不断犯着各种错误。现在摆在德军统帅部面前的一个比以前的错误更难补救的是它一直忽视考虑的经济问题，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德国通过布列斯特和约获得乌克兰、波兰等国的资源对于现时的德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靠缴获敌人战利品解决燃眉之急，

得到的是短暂的满足。因此，德国那凌厉的攻势缓慢下来。

与此同时，英国海格将军下达了著名的“身陷绝境”的命令：“除了决一死战别无选择，每一阵地均须固守到最后一兵一卒……我们身陷绝境并相信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每一个人都必须战斗到底。”素以绅士风度而自豪的英国人终于放下那传统的矜持。

福煦将军又一次拿出他那百试百灵的法宝，“不许他们通过”又一次成为战斗口号，又一次挖掘出法国民族那谜一样玄妙、令人难解的意志的力量。

美国的潘兴将军也率领那著名的第二、三师美军越过大西洋，来与协约国并肩作战了。

4月、5月、6月、7月，德军几乎不停顿地凶猛进攻。每一步蹒跚前行都付出巨大代价，损失了几十万人，推进了几十公里，后备的兵员、军需物资消耗殆尽，继续战争近乎痴人之言，只好在7月中旬不情愿地停顿下来。

协约国其实也是疲惫不堪，不过美国的参与犹如给它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向同盟国总结算的时机到了。7月18日，协约国联合指挥部调

动以法军为主的4个集团军(包括美军8个师,英军4个师,意大利2个师),攻打德军占据的马恩河突出部。将近20天的殊死拼斗,德军最终放弃阵地,退回马恩河。协约国第一次通过战斗实现重大军事进攻目标,德7个师全军覆没。鲁登道夫后来不无伤感地声称“8月8日是这次大战史上德军最黑暗的日子”。其实这只是德军黑暗命运的开端,德军士兵第一次大批开小差,开赴前线的预备队受到向后方狼狈溃退的队伍的大声嘲笑。铁的纪律,这个德军最大的优点削弱了。当1914年德军被阻滞于马恩河时,士兵们已经认识到所谓叶落凯旋的许诺不过是一种骗局,靠不断的幻想支撑3年,在战壕里忍饥挨饿,以及受到种种惨无人道的精神刺激,许多人从心理到肉体都已达到了所能忍耐的最大极限。因此这种溃逃如一泻千里的洪流势不可挡,从而冲垮了德国军国主义原以为是坚不可摧的梦想。

8月8日,协约国以英军为主力,对亚眠突出地带发动进攻。德军事先有所觉察,尽力加固了防御工事,但是在英军以坦克为先导的强大攻势面前,德军阵地土崩瓦解。

接着联军又夺取了圣米耶尔突出部。处境越来越困难的德军负隅顽抗，在其正面后方从海边至马斯河设三道防线。主要防御阵地是由纵深约7公里梯次配置的几条防线组成，拥有大量混凝土浇灌的筑城工事，多半构筑在能阻碍坦克行动的江河障碍处，即有名的兴登堡防线。9月26日，协约国联军对德军发起了总攻击。美法联军率先在马斯河—阿登森林地区打响。翌日，英军在康布雷—圣康坦地域开始进攻，28日，佛兰德集团军的比、法、英军也对德军发动了攻势。各地段分别发起的全面进攻，将敌人置于毁灭一切的巨钳之中。局势发展很快，9月28日，兴登堡防线全面崩溃，德国败局已定。同时，德、奥、土、保四国结成的同盟雪消冰解。兴登堡防线的存在是同盟国防线的存在，它被突破，预示着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失败的命运。9月29日，土、保无条件投降，11月3日，奥匈帝国也不得不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早在1914年9月，马恩河会战还未结束时，德国总参谋长毛奇在一封信中写道：“情况不佳，巴黎东边的战斗结果对我们不利……战争的开端是那样地充满希望，突然将变成另一种

情况了。我们一定会在东方和西方的战斗中窒息而死。”1917年，富有军事经验的土耳其将军凯末尔访问德国后断言，对德国来说战争是失败了。他们的预言成了历史的事实。

不可一世、雄心勃勃的同盟国就这样灰飞烟灭。德国统治者在愚弄历史的同时，也受到历史无情的嘲弄。它在近现代上演的一幕幕闹剧堪称人类的大悲剧。时至今日，关于文明与落后、繁荣与衰败这种种点缀在世界各个民族生活中的奢侈品，我们人类该怎样去把握，文明该怎样对待落后，落后怎样去争取文明，怎样清除这种差异给我们人类交往带来的种种不便，人类怎样控制那颗自由自在的心灵等等，种种问题几乎难倒了我们，也难倒了不知多少代人。教训不断给我们的精神以鞭挞，但是世俗的死结和烦恼又不时使我们回归我们曾为之流过多少血泪的炼狱。人们从生活中真正学到的太少太少，而就是这点可怜的收获又不时被我们自己难以克服的弱点吞噬得一干二净。无可奈何花落去，也许待人类永远摆脱这种境界，那才是人生中最动人、最具色彩的篇章。

穷寇莫追

威廉二世绝没有想到，自己渴望通过一次大战建立世界帝国的美梦，最后却变成了埋葬自己皇权的坟墓。事实上，自从大战开始就预示着“威廉时代”的结束。战时将军们当政，作为皇帝的他，名义上是德国最高决策人，但权力却在参谋长之手，他无从驾驭战争进程。随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神话的诞生，他们的权限日益扩大，甚至控制了国家的军政大权。鲁登道夫更是越俎代庖，在他的压力下，威廉二世被迫免去贝特曼的首相职务，而委任一个他连名字都不清楚的米歇尔斯。

1918年秋，德军丧失了同盟伙伴，处境更加孤立，西线损失巨大，鲁登道夫哀叹：“部队萎靡不振，被俘人数之多，说明我方战线已极单薄，后备减少了，部队都过度疲劳。这场战争已不能胜利了。”但德统治集团长期欺骗人民，谎报战绩。一旦人民明了3年多战争的真相，德国不但胜利无望，反而要沦为战败国，失望和愤怒情绪笼罩了整个德国。

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首的斯巴达克同

盟适时领导和组织了人民的革命行动。起义不是在国家的中心，而是在边区——基尔开始的。威廉二世曾声称，“以世界政治为任务，以世界强国为目标，以舰队为手段”。起义就发生在舰队上，导火索是德国海军指挥部无视等于送死的事实，命令舰艇开往公海与英国海军决一死战。几万名水兵在生死关头选择了起义，拒绝执行军官的命令。水兵的行动在基尔各界一呼百应，并很快以燎原之势蔓延到德国其它地区。威廉二世无法调前线军队回来镇压起义，急忙从柏林逃往德军设在比利时斯巴的大本营。

在此以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看到大势已去，于9月29日声明停战，并成立一个协约国认可的新政府。10月3日，以马克斯·巴登亲王为核心的内阁成立。这个政府企图通过对协约国的妥协以及对政治的改良来维持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吸收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谢得曼和鲍威尔进入内阁，对外通过德国驻瑞士公使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停战，并通过各种途经多次向美国做出明确的暗示：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斗争中，德国可能是有用的。

美国国务卿兰辛代表总统复照德国政府，

指出协约国不愿同皇帝打交道，也不愿对那些至今仍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妥协”。后者显然是指鲁登道夫和兴登堡，这样，尽管鲁登道夫幻想以暂时的妥协使德军通过休整重新战斗，也不得不无奈地辞职，而兴登堡则由于他的威望保留下来。

在斯巴翘首盼望的德皇威廉二世等来的并不是帝国的转机，11月9日，首相马克斯从柏林来电，要求皇帝退位。兴登堡也来电敦促，并说所有国内军队已经倒戈，政府已无权，李卜克内西准备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威廉二世不相信军队真会背叛自己的“最高统帅”，想做最后的挣扎，他一会儿说要派忠于自己的军队进军柏林，镇压革命；一会儿又说自己要战死沙场，杀身成仁。只有一件事他连想都不去想，那就是放弃皇位。正当他签署发往柏林的电报时，传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马克斯首相已经用急电向全世界宣告“皇帝和皇储已经逊位”。威廉二世异常气恼，高叫“背叛、背叛”。第二天凌晨，他和儿子逃往荷兰。荷兰女王的丈夫亨利亲王是德国人，又与他有姻亲关系，因此威廉父子在荷兰的多恩得以安身。但他们有如丧家之犬，整日坐

卧不安，担心协约国的审判。威廉二世命令随从准备好衣着、车辆，时刻准备乔装亡命他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二世仍不死心，幽居中，他以伐木为消遣，扬言未来的德国的皇帝是他的孙子。在回忆录中把战争责任推给他人：鲁登道夫，无能的外交官等等。1941年，他客死于多恩，临终前当听到纳粹军队攻克克里塔岛的消息时，脸上浮现了一丝笑意并喃喃呓语：“我的军队、我的军队……”带着美梦离开了人世。

而鲁登道夫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英雄也惶惶不可终日。11月16日他饰便服，戴着黑色墨镜化妆逃到瑞典，长期寄寓在他的外祖父家。一位统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那强大军事机器的主要人物，就这样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协约国方面对于德国的停战照会则持不理睬态度，想通过继续进攻，迫使德国接受更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到11月11日，即最后停战协定签订的那一天，协约国军队已经开到安特卫普—马斯，并突破了阵地南段。但是后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协约国摧毁德国的脚步停滞不前，而且德国政府已变成了一条死狗，再不能构成大的

威胁。德国国内革命形势壮大，大有象俄国那样取资产阶级而代之的趋向，这样，苏维埃政权这个资本主义最可怕的敌人就会直接威胁到英法等国。协约国出于对未来的恐惧，不愿失去德国这个天然屏障，因此同意了德国的停战要求。

11月6日，马克斯首相匆忙派外交大臣埃尔兹贝格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法国进行谈判。11月7日晚，德国代表团的汽车打着白旗越过前沿阵地，第二天早晨到达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通车站，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乘坐的行军列车正停在这里。德国人一到，趾高气扬的福煦未与他们握手就问：“你们来干什么，先生们？”德国人回答说：“我们想听听您的停战建议。”福煦为进一步取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权，有意地给德国代表团来了一闷棍，说：“噢，我们没提过任何停战建议，我们很愿意继续打下去！”德国代表无可奈何，不得不低下日耳曼民族那颗“高贵”的头颅，表示无法继续打下去，并且恳求福煦提出停战条件。

以胜利者自居的福煦在他乘坐的火车里与德国代表团开始谈判。11日，那盼望已久的停战协议出笼了，双方代表在这纸协定上划上了具

有历史意义的一笔。而这一笔，是用欧洲以及世界上其它地区多少条生命换来的。这简单的一笔包含了多少荣辱、多少无奈和多少梦想的破灭。协定规定：在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及莱茵河左岸的德军，在15天内撤退完毕。德军还必须全部撤出土耳其、罗马尼亚、奥匈帝国以及非洲殖民地。协议还责成德军继续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其撤军必须经协约国集团“考虑”这些地区的“内部情况”，认为“时机成熟”方可进行，这事实预示着协约国集团将用武力干涉苏俄新兴政权。协定还规定德国必须交出5000门大炮，2.5万挺机枪，3000门迫击炮，1700架飞机，以及5000台火车机车，15万节车皮和5000辆卡车。德国强大的军事机器被打毁、被拆散了，协约国希望它在将来处于瘫痪无用的地位。

当1914年战争开始时，交战双方都抱着必胜的信心，而年轻的德国似乎比其它老牌帝国更具有勃勃野心。谁会想到，1918年站在战败国行列里的会是那让世界人感到震惊和恐惧的德国人。对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民族会比德意志民族具有更炽热的渴求。德国哲学中那种世界统

一于德国的观点已深深溶入德意志民族的血液之中。历史太残酷了！历史哲学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律：胜者总结经验，败者汲取教训。

的确，除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固有的不可克服的问题外，从德国失败的轨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不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德国参谋部制定的目标无限的拿破仑式的战略所提出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是其致命的弱点，除此而外，史里芬计划中对比利时政策的失误，封锁造成的缓慢而无情的经济压力，德军界普遍存在的缺乏循序渐进而总是性急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指导思想，它反映了德国急功近利的野心，对前景的渴望，以及布尔什维克的“破坏”和宣传，人民群众所恒有的那种如潮水般的、在胜利无望情况下产生的厌战心理和对政府的不满……这种种因素的累积使德国丢掉了预料中唾手可得的辉煌。但德国率领它那铁一般的军队同半个世界打了4年仗，它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敢、目标坚定、纪律严明和无与伦比的技术，以及象鲁登道夫这样天才的指挥家、霍夫曼这样的战略家，以及参谋部中的普遍存在的远见卓识，在世人的记忆里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虽然德国

最终以战败而退出战争，但是我们可以毫不隐讳地说，德国军队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优秀军队，即使是世界的联合也不足以克服与其对阵时所引起的心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并未因协约国的胜利而丝毫减轻，相反，它需要不止一代人不断抑制，不断努力。

战争结束了，人们在惊喜之余发现，经过将近4年的洗礼，失去的不仅仅是亲人朋友，肥沃的土地，富饶的家园；失去的不仅仅是几百年苦心经营的繁荣，那象征人类智慧的古堡，大厦的残垣断壁在夕阳中向人们诉说着人类永恒的一个主题：物质的东西可以重建，但精神上曾经拥有的一切却在瞬间消亡。苏格拉底说：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人类苦心探索积累起的一点点精神财富也如川流不息的河水一去不复返了。人们经过悲惨的经历，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绝不会一成不变地固守那原有的理想。人们常常问自己，我们从孜孜以求的目标上得到了多少，而其中有多少真正对我们自己有益？回答是否定的。D·H·劳伦斯为他的同代人写了个言简意赅的总结：“对这一代人类说，以前的一切豪言壮语都一笔勾销了。”

战争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催生了一个新时代和一个新国家，但这个国家尚无力与旧因素抗衡，因此，人类在历尽劫波后仅仅二十年又将面临着新的灾难。

第十二章 世界属于谁

“世界是可塑的，我们能够修订世界地图，人们想把它搞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比欧洲人更相信这句话的永恒性。如果你是位好事而细心的历史学者，就不难发现，自古至今的欧洲地图不断地被肆意涂改，显示出欧洲地图史最动人之处。而每一次改动则代表了一个旧时代的死亡，新时代的开始。到了近代，欧洲人又把他们的这种个性带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世界属于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幅幅不断变迁的地图告诉我们，世界属于时代的强权者，强权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世界的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时代的强者——协约国集团又开始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重新划定世界地图，重建世界新秩序。

镜厅不平静

路易十四绝不会想到他所建筑的借以炫耀法兰西文明的凡尔赛宫镜厅会与日后法兰西民族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荣辱兴衰紧密相连。1870年1月18日，普鲁士战败法国后在这里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这一事件被法国视为奇耻大辱，曾令不止一代人痛不欲生。48年后的一天，即1919年1月18日，又是在这明亮宏伟的镜厅里，法国总统彭加勒以胜利者的口吻，讥讽战败了的德意志帝国“生于不义，当死于耻辱”，从而宣告巴黎和会的召开。

列宁说：“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按照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暂时联合起来的协约国集团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德国之后，内部矛盾很快暴露出来。战场上的血腥厮杀很快被会议桌上的勾心斗角所代替，镜厅的谈判桌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新的战场，但指挥这场战斗的已不是穷兵黩武的将军，而是老练的各国“滑头政客”。和会上各国代表争吵不休，从1919年1月18日至1920年1月20日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这种争吵伴随了

大会始终。和会名义上由32个国家的正式代表1000多人组成，这是一个总统、首相、政治家、外交家、地理学家、银行家、将军等各种人物聚集一堂的盛会。在和会中地位重要的是英、法、美、日、意五国。而为了便于秘密交易，保证这次会议按各国列强的愿望顺利进行，在会议进行中又成立了四巨头会议，即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蒙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四巨头成为会议的核心和主要操纵者，他们在和会上实行独裁。奥兰多实际上也是个配角，他的建议常常被大会置之不理，因此在会议期间，奥兰多也是牢骚满腹，有时只得愤然离开会场，以示不满。因此巴黎和会实际上成了英、法、美三个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

三国首脑作为本国代表，从自身利益出发，从大会一开始就彼此争吵。由于每个代表团都有好几百秘书、地理学家、历史学家、金融家以及其他各种专家协助工作，因此吵得镜厅沸沸扬扬，呈现一片混乱，连记录都是一团糟，分不清正式记录和非正式记录。克列蒙梭忙于争论，谩骂说：“管他妈的什么记录。”出席和会的英国

外交大臣贝尔福在和会召开前就本能地预感到这次会议“势将成为扰乱不安的场所。”争吵、谩骂充盈整个大厅。镜厅中的气氛既不平和也不安静。

发动这场世界大战时所怀有的美好梦想眼看就要在和会中实现，作为战胜者一方的协约各国在经过几年努力赢得了今天的主宰世界的权力的时候，那种原本存在的欲望膨胀起来，谁也不会放弃唾手可得的成果，都希望通过这次和会尽情地实现自己的梦想。造成凡尔赛宫镜厅那气温不断升高的争吵的唯一原因就是这多种梦想所发生的碰撞。如果说各国在关于是否参加大战问题上都显出惯有的犹豫和瞻前顾后的话，那么，如今在镜厅的分赃会议上则丢掉了所有的矜持，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都派出了最精明、最干练的代表，并在这些代表身上寄托了殷殷热望和无限美好的理想。

英国是以首相劳合—乔治为代表。劳合—乔治是个出身下层、靠个人奋斗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缺少上层阶级出身的人所惯有的囿于传统、讲求虚名的特点，在他身上处处

显示出冷静、开明、务实的个性，由于他早期不合传统，敢于向传统的同时又是有碍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积习作斗争，赢得了激进派的美名，从而引起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经反对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很快赢得多数资产阶级的赏识，尤其是他那特有的善于用诺言和微小的让步安抚劳动人民的本领更是在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的社会里所难能可贵的。因此劳合一乔治是当时资产阶级分子中最具有生命力、最狡猾、最具有欺骗性的危险人物。他代表了时代大潮中那批积极上进、不断适应形势的少数有前途的，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利益最忠实的有能力的捍卫者。同时，劳合一乔治还有这部分人所共同拥有的锐利的武器——大胆、辛辣和善辩的口才，他们大多以律师起家，也是资产阶级中有知识有素养的人材。1916年12月6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关键时期，他接任首相，充分说明了他的实力和才能。大战结束后，他更是踌躇满志。1918年12月，他参加大选，提出了“把英国变成一个无愧于战场归来的英雄们的国家”的口号。就是喊着这个口号，他跨进

了镜厅的大门，代表英国资产阶级开始问鼎欧洲大陆。

欧洲大陆的霸权是英国几个世纪的梦想，同时它也不愿放弃它的海上主导地位，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海军势力的增长记忆犹新，痛楚在身，这曾是英德矛盾产生的一个很大因素，同时它也不愿看到任何一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因此，它对于“十四点”中的“海上航行自由”的字眼感到刺目而深恶痛绝。同时它也不愿法国称霸欧洲大陆，使它永远困于孤岛。在这次和会上，劳合—乔治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殖民地问题，这个最早从海外殖民地尝到甜头的老牌帝国主义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扩大它“日不落帝国”版图的机会。因此，在大会中他力主先讨论殖民地问题，从而尽快把它在战争中所获得的德国殖民地以及从土耳其手中夺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地区合法化。

在政界素有“老虎”之称的克列蒙梭率领法国代表团来到镜厅。克列蒙梭与劳合—乔治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也不是出身于正统的资产阶级上层，年轻时也以激进著称，敢于同传统势力作斗争，也敢于改掉上层资产阶级某些不合时

代要求的积习，在以其特有的谋略与手段赢得许多中小资产阶级和下层群众支持的同时，也逐步得到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赏识。他代表了“健康向上”、被时代所磨砺、积极进取的资产阶级集团中有志有为的少数人，是饱受多年陋习所累、重症在身的资产阶级为适应新形势应运而生的延续其生命的新鲜血液。这种人物具有超群的才华，敏锐的头脑，果敢的作风以及思想上的灵活，同时也是任何集团所需或者说所必需的。因此，任何一个统治集团要想发展壮大，追随那变幻莫测的潮流都需要这样一批时代的精英和阶级的捍卫者。他们在为本集团势力奔波的行动上是不遗余力、充满了智慧和才能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对克列蒙梭褒扬有加，而是针对历史现象的一种抽象历史评述。克列蒙梭在法国历史上被视为爱国主义和政治权威的典范，这其中一部分归功于他在巴黎和会上竭尽全力地实现法兰西的梦想。

在近现代史上，在法国人的恶梦中经常被德国这头雄狮搅得彻夜难眠。因此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使其永远无法东山再起，是几代法国人的最大心愿。为了实现这一点，甚至使得它暂

时忘却了其它的利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它的主要矛头指向德国，要求把讨论国界以及赔偿问题作为一系列问题的入手点。克列蒙梭提出最大限度地削弱和肢解德国。其中包括：以莱茵河为法国边界，在该河以东建立一个置于法国直接保护下的莱茵共和国，在德国南部建立一个新的巴伐利亚国，同时夺取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和土耳其的属地。要求德国偿付巨额战争赔款，在欧洲建立一个由法国控制的军事集团，制造所谓的“防疫地带”，对抗苏俄。依了他，可真要把一幅现有的欧洲地图切割得七零八落了。

美国的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不懈努力和 他签署和约后在国内遭到的失败是其他任何人都未曾经历过的。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提出被他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其内容是：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缩减军备，实行民族自治，促使俄国加入“自由国家的社会”，使比利时复国，恢复法国原状，调整意大利边界，奥匈帝国人民自治，国际保证巴尔干诸国独立，分割土耳其帝国，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建立普遍的国际性联合机

构。这就是威尔逊关于世界新蓝图的基本构想。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原则背后，他把商业自由和国际门户开放作为基本的要素，而最终目的是建立国际联盟，通过国际联盟达到由美国控制世界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蓝图对于眼前英、法急待解决的关于战胜国的权利，如索地、赔款等要求则只字未提，这当然引起了英法的不满，对于威尔逊提出的把“十四点”作为和会的基础，英法颇有微辞。克列蒙梭说：“上帝满足十诫，威尔逊这位仁兄却给了我们‘十四点’。”

劳合—乔治则挖苦道：“这位理想主义的总统真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传教士，他的任务是拯救困苦的欧洲异教徒。”但是，威尔逊这娓娓动听的说教却得到一部分群众及弱小国家的欢迎。最后在他不断努力下，和会决定把“十四点”作为和谈的基础。但是，威尔逊的“理想”在和会上遭到了失败。他所谓的新构想被当成不合时务的幻想，不但没有达到借以插手欧洲事务、控制战后世界的目的，反而受到英法等国的愚弄。

在和会上，威尔逊在伪善的“中立”、“自由”、“公正”的幌子下，难于倾售其奸，反而使

他在这些假面具下进退失据，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了建立国联，威尔逊做了巨大的政治让步。

国际盟约最后于4月28日通过。盟约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一种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新形式，即所谓关于对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制度，正是这一条规定完全无视美国的利益所在，宣告了威尔逊外交的彻底失败。规定曰：委任统治地依当地“人民发展的程度、领土之地势、经济之状况及其他类似之情势分为三类：（一）叙利亚、黎巴嫩、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外约旦。（二）多哥、喀麦隆、卢旺达—布隆迪区和坦噶尼喀。（三）西南非洲、新几内亚、那卢、西萨摩亚和赤道以北的太平洋岛屿”。这些地方被英、法、日、比等国以表面上由国联给予的委任国的名义进行统治，而美国则一无所获。这引起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1919年7月，当威尔逊回到美国时，他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国际联盟理想被淹没在谴责、嘲讽的反对声浪中。国会认为威尔逊的努力不过是他人火中取栗。体弱多病的威尔逊为了使他的联盟计划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奋斗到最后一息，可以说，呕心沥血制定出的联盟构

想耗尽了威尔逊政治生命和人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心血和精力。在这方面，威尔逊表现了他身上学者气质中坚持“真理”永不回头的个性。1919年11月19日，参议院进行表决前夕，他发誓“宁肯战败千次，也决不为不光荣的妥协而朝三暮四”。最后，参议院的表决还是令威尔逊大失所望。他对内阁说：“条约死亡了，就躺在那里。我将每天清晨去把鲜花放在它的坟墓上。”他的政治生涯也结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唯一安慰是1920年12月威尔逊在极度沮丧中接受了191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今天，如果我们溯着历史，评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威尔逊，也许会认识到，他作为美国总统远不如作一个理想主义的学者那么适得其所，应付裕如。威尔逊的错误在于他远远地抛那个时代于身后，思想的翅膀穿过了时间的界限，使他的思想表现出充满幻想。他不同于克列蒙梭、劳合—乔治之类。后者站在时代的峰巅，成为时代的引路人。而威尔逊则远远超越时代，尤其是对美国来说。20世纪初的美国远远没有今天的经济、政治实力来成为世界的操纵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它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干预

世界的一个初步尝试，它还没有能力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占有大量殖民地的英、法、日诸国又岂肯统统门户开放，与人公平竞争？一年后，美国利用在战争中奠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不断高速发展实力，经过20几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脱颖而出，变凡尔赛体系为杜鲁门主义，开始了它主宰欧洲、主宰世界的历史。威尔逊在本世纪初，对欧洲问题、对世界政治事务指手划脚，英、法等当然不买他的帐，他没有给本国大亨们带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必然使他们大为光火，将其他抛到一边。威尔逊超越时代的设计，理想主义的世界纲领尤如水月镜花必然为现实碰得粉碎。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威尔逊先生提出的新构想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出一种理想的未来前景。剥去“十四点”污浊的外壳，“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民族自决……”应该说是合理内核。今天已经实现了一些，有一些仍是奋斗目标。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国家呼唤着它。如果有一天，人人都遵奉它，完全实现了它，世界或许真会变个样，从这意义上说，应该感谢这位高瞻远瞩的威尔逊。

和约无和平

1919年6月28日，各战胜国和战败国庄重地签了字，《凡尔赛和约》问世了。但是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世界没有得到长久和平。因为条约本身并不是公正的条约，所以和约并未给欧洲带来和平，危机的隐患自和约形成时就潜伏其中。

凡尔赛和约中的绝大部分条款是关于处理战后的德国问题。对德和约条款的制订是在没有德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违背了和约最基本的原则，决定了条款的不平等性。1919年4月底，以德国外交部长勃洛克道夫为首的德国代表团到达巴黎。5月7日，德国代表被召到凡尔赛宫，法国总理克列蒙梭代表和会将和约全文交给勃洛克道夫，并非常得意地说：“清算的时间到了。你们向我们要和平，我们同意把这和平交给你们。”他并且严厉拒绝德国代表的任何异议。

在和约中，协约国集团把德国作为战争元凶，作为发动这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勃洛克道夫对此坚决反驳，“大家要我们承认唯有我们

应负战争的责任，我本人如果这样承认，那就是我在作欺人之谈。”他承认德国对比利时的进攻有欠公允，但协约国也应为这次大战承担相应的责任。

实际上，这是一个对这次大战如何看待，甚至对战争如何看待的原则问题。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以及矛盾的不可调合，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战争的本身就是希望通过强权暴力的手段达到一种新的均势。因此，从广义上讲，它是时代的产物，而从狭义上讲，它涉及到民族意识、新旧交替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局限等等许多问题。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许更能形象地说明关于一场战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牵涉广泛的战争，从而也就省去了我们的种种猜测，避免我们主观上的片面武断。怎样对待民族间的仇恨，怎样对待历史遗留下的积怨，以及怎样在这个地球上和平共处，保持一种平衡均势？在这种种问题上，我们取得的经验不多，但教训却不少。巴尔干地区长期以来的动荡不安以及外部强权的粗暴干涉将本来剑拔弩张的民族推入敌对的深

渊。法德之间的宿仇，使这两个互为邻里的国家几代人相互敌对，而敌对的结果则是两个民族轮流享受荣辱，也共同饱受战争之苦，从而失去了对欧洲局势的控制能力，为美国干涉欧洲事务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如今欧洲人也许认识到这种历史上的失误，建立一种政治、经济上的合作——欧洲共同体来做事后的补救。“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但历史的错误毕竟让人痛心。巴黎和会对德国的制裁和肢解就是这种错误的一个突出表现。

凡尔赛和约就战前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坦噶尼喀、卢旺达—布隆迪、喀麦隆、多哥、西南非洲、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马利亚纳群岛、萨摩亚、瑙鲁和新几内亚等地做出决定，均交给英、法、日、比和南非联邦等，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人口共计1300万。与此同时，对德国的疆界也做了很大改动。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区由国联直接管理，为期15年，期满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马尔美地和欧本地区划归比利时，什列斯维希的部分地区划归丹麦。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波兹南和波美拉尼亚的部分地区划归波兰，并设立但泽自

由市，上西里西亚划归波兰，而上西里西亚南部的古尔琴区则划归捷克斯洛伐克，至于波罗地海东岸的默麦尔则由国联直接管理。德国丧失了原有国土的1/8，全部人口的1/10。

条约还规定，取消普鲁士的军训制度，解散军官学校，禁止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同时不能拥有空军、海军和坦克，莱茵河区为非军事区，目的在于使德国的那令人敬畏惧怕的军事机器销毁殆尽，处于瘫痪。

对于赔款问题，条约规定：由协约国专门组成一个“赔款委员会”来专门确定赔款数目，限定30年内偿清。后来确定德国的赔款数额为1320亿金马克，以黄金、有价证券、商品和其它实物折价偿付。

在具体问题上，英法美还存在一些分歧。不同意见在于把德国做何种程度的削弱。法国在对德问题上充满了浓烈的感情色彩，主张最大限度地削弱之，但美国，同时也包括英国，面对苏维埃俄国的兴起，主张保留部分德国武装力量，用以对付苏俄。

自从十月革命敲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丧钟，苏维埃俄国就成了协约国最大的劲敌，尤其

是精神思想上对资产阶级所形成的压力更是日甚一日，甚至压过了大战胜利给他们所带来的应有的喜悦。1918年11月11日，就是签订贡比涅协定从而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个晚上，丘吉尔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同劳合—乔治同进晚餐。伦敦市民欢天喜地庆祝战争胜利。丘吉尔形容当晚的情景时写道：街上传来了歌声和人群的欢乐声，但是他和劳合—乔治却神情忧郁，他继续写道：“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不仅如此，劳合—乔治反而清楚地意识到新的，也许是更大的压力，他被两种心情所困扰：“一方面我害怕未来，另一方面我想帮助被打垮的敌人。”这种心情被他带到巴黎和会上。同时，其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大有同感，战争的胜利并未使他们如释重负，认为“在胜利者中间，有一股阻碍公正解决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正在争权夺利”。这股新生力量就是十月革命和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因此，远在大战还未结束前，协约国集团就已经把与苏维埃政权敌对列为最紧要的议事日程。福煦认为不解决俄罗斯问题，“协约国就有失去战争果实的危险”。

在巴黎和会上，确定解决俄罗斯问题有三

种方案，即武装干涉、封锁和谈判。尽管在具体策略上英、法、美之间存在着分歧，但原则上大家是一致的，所以很快达成共识，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派遣俄国战俘支援苏俄境内的白俄军队，利用波兰等国作为进攻苏俄的基地，同时在对德条款中有意保留德国本土的军事设施和德国东线部队，责成德国将本国军队留驻俄国领土上。在这一点上，协约国同德国甚至还取得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德国代表说：“德国的破坏与毁灭，直接影响到有权要求从优赔款的国家，并将使欧洲整个经济生活沦为不可想象的混乱。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应共同预防这种可怕的危机，以及不可计算的后果。”正是在这种思想共识下，掩盖了战争所带来的许多问题，从而也就为未来的世界留下了一条新的战争隐患。它怂恿德国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至于日后德国法西斯分子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在复仇主义的旗帜下打了一场更令人心惊胆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同时，条约中对德国军国主义战争魁首只字未提，而且任由威廉二世、兴登堡之流逍遥法外，兴登堡不仅保住了借战争之机得到的权位，

而且于1925年当选为魏玛共和国总统，德国的军政大权落到了最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手中。正是在他的保护伞下，各种如“钢盔团”一类准军事组织开始迅速发展。1932年再次当选的兴登堡以年迈力衰、心力不济为由提议由巴本组织“贵族内阁”。巴本与德国法西斯分子关系密切。早在兴登堡竞选连任的时候，德国共产党就提出“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谁选举希特勒就是选举战争”。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1934年兴登堡病死，希特勒作为直接继承人总揽国家政府和军队的权力，开始了恐怖的法西斯专政，并一手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然，巨大的战争赔款实际上都转嫁到了德国人民身上，真正饱尝战败之苦的是普通人民群众，是那些在战争中抛却生命和财物，忍受战时生活之困苦的群众，从而激起了原本存在的民族仇恨，尤其是与法国的积怨。巴黎和会刚一结束，德国复仇主义者就打出了“打倒凡尔赛”的旗帜。这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这社会基础也是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得势的肥沃土壤。

不过，对于那些在战争狂人指挥下，将军队开入别人的国度，野蛮屠杀异族，疯狂抢掠财物，造成他人物质、精神、肉体巨大损毁的民族，国家不提旧事，不算积帐，“相逢一笑泯恩仇”就是正确的吗？就是表现了文明的力量、胜利者的大度吗？就不需要索取适当的赔款吗？

如果说到对德条款，协约国还可以找到一些自圆其说的理由的话，那么凡尔赛和约中有关中国的条文则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狐狸尾巴，表明和约的不公正性。

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的牺牲品，尤其是对远东有野心的美国和日本的矛盾和勾结的主要目的物。在日本的要挟和怂恿下，中国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宣战，卷入一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战。在战争中，中国不仅为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的粮食，而且把大量青壮年送到欧洲战场充当炮灰，还有一些为交战国做了劳工。早在1915年，欧洲战事正酣，协约国集团各国都感到缺乏劳力，于是，要求北洋政府给他们以自由招募劳工的权力。在列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对德宣战以后，劳工更是源源不断地外运。这些劳工从事掘土、伐木、采煤、筑路、凿

石、开矿、挖战壕、搞运输、抬担架等各种苦役。据当时一些材料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运往俄国的中国劳工就有20万人。俄国在中国东北农村“招工”人员一手拿着蒸笼，一手拿着厚实的棉衣和毛皮靴，对农民们说：你们到那里，将吃到这种蒸笼蒸的白馒头，穿这样的衣服和靴子，还可以拿到工资。于是，正为生活所苦的农民就跟着奸诈的工头涌向俄国。当发现这些只不过是骗人的圈套时，他们已经沦为了商品和奴隶，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中许多人就这样死在了异国他乡，看不到故乡的太阳和亲人。一部分劳工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中为英国修建军事工程，据当时人反映，“就是最能吃苦耐劳的人也受不了”那里的艰苦生活。战争结束后，中国是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巴黎和会的，并且成为国际联盟的正式会员国，但它的合理要求和基本权益都未受到应有的尊重，领土完整和神圣主权也遭到了破坏。

侵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已久的阴谋。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就借机开始了侵华的步骤。1914年9月2日，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在胶州湾登陆，并且打败了在青岛的德

军，占领了山东省大部分地区。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要求归还德国在中国侵占的领土，但这一符合和约精神的合理要求，遭到与中国同处战胜国同等地位的日本拒绝，日本宣称：山东是日本从德国人手中夺过来的，以日本人为它付出了“代价”为由，坚持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权益的公然侵犯。

日本这一无理要求却得到了美国的同意。英国惧怕美国在远东势力的增长，而日本则是它对抗这种增长的最好伙伴。威尔逊早就对英日这种勾结同盟恨之入骨，因此他一开始就对日本的要求坚决反对。1919年4月22日，当排除中国代表在外的英、美、法、意四国外长讨论山东问题时，美国国务卿提议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暂时移交协约国。这实际上暴露了美国反对日本占领山东，根本上不是为了把山东归还中国，而是要求“利益均沾”，使山东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巴黎和会上所谓对山东问题的争论，究其实质是对中国赤裸裸的掠夺，是把中国作为没有主权和尊严的附属国来对待的。

最后在日本代表的压力下，凡尔赛和约做了这样的规定：根据1898年的中德条约及关于山东省的其它一切协定，德国所获得的胶洲地区铁路、矿山、工厂、海底电缆和一切附属之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关于德国在胶州领土之内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档案以及牵涉到山东主权的“各种文件”，均“移交日本”。

中国北洋政府代表团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当和会正在讨论山东问题时，他却被拒之门外，无权参与讨论有关自己国家主权的问题。和会象对待德国等战败国一样，等条款拟好才通知中国代表，此时陆征祥已回天乏术，抗议终告无效，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国内，民怨沸腾，几天之间，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的电报达千余封，警告他不许签字。群众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与日商谈“二十一条”时任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陆宗輿身上，北京爱国青年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国的民族意识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无产阶级的自觉能动性第一次

发挥了巨大威力。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欺凌下，民族意识空前觉醒，这也是战后世界各地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普遍现象。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协约国还同奥、匈、土、保四国分别签订了条约。在这些条约中，这些国家领土被分割，军备上受到限制，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战争赔款。这些条约同凡尔赛和约如出一辙，合称凡尔赛体系。凡尔赛体系就是英、法、美等国关于战后的新秩序。但是这个新秩序并没有解决战前所遗留的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复杂，同时又埋下新的隐患，因此它不过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建立霸权，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一种暂时妥协的结果。

经历了1914到1919年这些可怕的岁月的亿万群众曾真诚地希望：这次战争会结束人类的战争。但是，没有载运人类到新的净土的诺亚方舟，人们不仅这一次，而且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

何处觅方舟

据《圣经》说，人类“始祖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该隐诛弟，揭开了人类互相残杀的序幕。人世间充满着强暴、仇恨和嫉妒，深深陷在罪恶之中。上帝见此情景大为愤怒，要将这败坏家门的世界一举毁灭，唯有诺亚是个义人，尚可让他留下有限的生灵。于是耶和华对诺亚说：“看哪，世界败坏到如此地步，这些有血气的生物全都陷在罪恶之中，这完全违背了我当初造物的本意。我现在后悔了，我要将这世界一举毁灭，你要用哥斐木造一只方舟……我要与你立约，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都要进入方舟。凡是有血有肉的活物，鸟兽虫鱼，各从其类，每样一公一母，你要带进你的方舟，好在方舟里保全性命。”从而，一个破败的世界毁灭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诞生了。

那史诗般的故事，神奇梦幻般的诺亚方舟曾令后人怎样的心驰神往。今天，陷在灾难性怪圈里，积重难返的人类该怎样寻找自己的诺亚方舟，和平鸽何时才能衔回那翠绿的橄榄枝，导

引人类达到理想的彼岸？

其实，我们不必向往那神话中的胜境，也不必为了人类已经犯过的错误而长嘘短叹。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更广阔的前景：人们有能力绕过战争的暗礁，谋求一种不战而胜的途径，以经济实力代替传统的军事竞争。当铁幕被历史无情地摧毁，人们心灵上的铁幕也随之冰解。思想上的偏见、传统的分歧，将被人们渴望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所代替，理解溶化了敌视。如今，欧洲，这个历史上战争的漩涡已在尝试实现政治、经济上的协调统一，天下认同、世界归一的曙光离我们并不遥远。

对失败和遭遇太多的敏感，人类懂得了珍惜自己，把我们引入这纷繁复杂的世界的智慧 and 文明，必将引导我们踏上那神奇的方舟，回归那理想中的伊甸园。